

世界名人傳記叢刊

吳人成功傳

胡山源譯 林漢達



世界書局印行

林漢源
胡山譯

黑人成功錄

世界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版

黑人成功傳 (全一册)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原著者

B. Washington

譯者

林漢源

發行人

李煜瀛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原序

本書的前身，是繼續登在曠觀雜誌（*Outlook*）上，講着我一生事跡的零碎片段。牠們在該雜誌上登出來時，我時常驚奇着，居然全國各地寫信給我的人會那樣的多，都要求將牠們用單行本來出版。爲了答應這些請求，我最感激曠觀雜誌。

我的原意是講述着簡單而坦直的故事，毫無文飾的企圖。我要想這樣做，卻做得那樣的不完備，這是我的抱歉。我的時間和精力，大部分都用在塔斯歧基（*Tuskegee*）師範實業學院的行政工作上，並且要籌款來維持該校。本書大部分的文字，都是我在臥車上，或旅館中，或待車時的車站上，或在塔斯歧基能夠暫時離開我的工作時寫的。要是沒有色拉射爾（*Max Bennett Thrasher*）先生的辛苦和盡量的幫助，我是不會達到滿意的地步的。

目錄

第一章	一個奴隸中的奴隸	一
第二章	兒童時代	一三
第三章	爲受教育而奮鬥	二四
第四章	幫助他人	三六
第五章	改造時代	四六
第六章	黑種和紅種	五三
第七章	在塔斯岐基的初期	六一
第八章	授課於馬房雞棚中	六八
第九章	焦急的晝間和失眠的夜間	七七
第十章	比無薪造磚更困難的工作	六六
第十一章	在睡上牀鋪之前製好牀鋪	九四
第十二章	募捐	一〇三

第十三章	二千哩路作五分鐘演講.....	一一五
第十四章	阿特蘭塔博覽會演講.....	一二八
第十五章	公衆演講的成功祕訣.....	一四二
第十六章	歐洲.....	一六三
第十七章	最後的話.....	一八〇

第一章 一個奴隸中的奴隸

我生在弗基尼阿 (Virginia) 州法蘭克林 (Franklin) 的一個農場上，一生下來便是個奴隸。到底生在那一個地方，生於那一天，我自己也不大清楚；但我想，總有一個地方是我的生身之處；總有一個日子是我的生辰。後來，照我所知，我是生在鄰近一個十字街口的郵政局的地方，這郵政局叫做黑爾斯福 (Hale's Ford)。大約是在一八五八年或一八五九年，那一月那一天我卻不知道了。我現在所能記起的最早的印象，只是農場和奴隸區，奴隸區是農場的一部分，那裏有奴隸住的小木屋。

我的生活，一開始便在極悲哀、極悽慘、極沮喪的環境中。這並不是說，我的主人來得特別殘酷，因為比起許多別人來，我的主人並不怎麼兇。我生在一間典型的小木屋中，長十六呎，闊十四呎。我在這小木屋內和我的母親，一個哥哥，一個妹妹同住，一直住到南北戰爭之後，那時據說我們都被釋放了。

至於我的祖先，我簡直一點也不知道。後來我在奴隸區中，聽到黑人們交頭接耳說到當初的奴隸，從非洲載到美洲，在中途所受的痛苦。自然，我的外祖父一家也是受到的。我一心想得到一些關於我的母親以外的家譜，但是不成功。我記得我的母親有一個半血屬的兄弟，和一個半血屬的姊妹。在奴隸制度時代，黑奴的家系是不注意的。我的母親引起了一個購買奴隸者的注意，後來這位主人又買了我。他買了我的

母親正如一個人多買了一隻新的馬或牝牛一樣。母親的歷史我不十分明瞭，父親的歷史則更不知道了。甚至連他的名字也不知道。我只聽說他是一個住在鄰近農場上的白種人。不管他是誰，總之，他絕不以我爲念，也從未顧到我的養育。但我並不因此怪他。那時候國家不幸，產生了不幸的制度，他也不過是在不幸的制度中一個不幸的犧牲者。

那間小木屋不單是我們的住家，也是農場的廚房。我的母親便是農場上的廚子。小木屋自然沒有玻璃窗；只在邊旁開幾個洞，以通日光，但是冬天凜冽刺膚的風，也吹進來了。小木屋也有一扇門——這是說有一種像門的東西，總算也叫做門——門上的鉸鏈既不穩固，門板上又有許多大的裂縫，門框太小那是更不必說了，因此這間木屋極不使人舒服。除窗洞和大的裂縫之外，右角下端還開了一個貓洞——這一種設備在戰前的弗基尼阿是家家戶戶都有的。貓洞是七吋闊，八吋高的一個方洞，以便貓兒在晚上可以自由進出。但是我們的小木屋，至少有六個破洞，是使貓兒進出，現在居然也像煞有介事地開個貓洞，真使我莫名其妙。室內沒有地板，精光的泥地，便是地板。泥地中央有個大而且深的坑，上面蓋着木板，這地坑是預備冬季藏番薯的。這番薯坑的印象深深的留在我的記憶中，因爲我記得每逢我們安藏或取出番薯的時候，我常可得到一兩個，我便烘將起來，大大的享受一番。在我們的農場上，廚灶是沒有的。我母親爲白種人和奴隸們所做的一切烹飪工作，不得不在露天的火灶上幹，食物大都是用鍋子和長柄鍋煮的。這破陋

的小木屋，使我們在冬天受寒冷；這露天火灶的蒸熱，又使我們在夏天受到同樣的磨難。

我的早年生活是在小木屋內過的，生活的狀況和其他幾千萬別的奴隸沒有什麼不同。我的母親在日裏自然沒有工夫顧到她的孩子們。只是在清晨未上工之前，和晚上工作已完畢之後，偷工夫來照顧我們一下。在我最早的記憶中，我記得有一次我母親在深夜裏煮了一隻雞，推醒她的兒女們，給他們吃。我不知道她怎能得到這隻雞，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得來；想來總是從我們主人的園子裏拿來的。有人會說這是偷竊。倘使現在發生這種事情，我自己也會反對。但是倘使我們能設身處地想一想，在那個時候，爲那種原因而做這件事，我決不相信我母親是犯了什麼偷竊的罪。她不過是奴隸制度下的一個犧牲者。在未宣布釋放奴隸令，我們一家未曾得到自由之前，我們沒有在床上睡過。一家三個孩子——我的哥哥約翰（John），妹妹阿曼達（Amanda），和我——只有一張棗薦鋪在齷齪的泥地上，說得更正確一些，我們只睡在齷齪泥地上一團污穢的破布當中或上面。

不久之前，有人請我講一些關於我少年時的運動和遊戲的事。一問到這個問題，我方始想起，我是終身沒有享過遊戲的幸福。從我能够記憶的時候起，我幾乎每天都做零星的苦工；我想，當初若能有些運動的工夫，我現在或許能夠成爲一個更有用的人。我小時做奴隸的時候，因爲年紀太小，沒有多大的用處。但是大半的時候不是收拾場子，拿水給田裏的人，便是到磨坊裏去，這磨坊離農場約有三哩路，我每星期總

得去一次，拿玉蜀黍去磨。我常常怕這個工作。重重的一袋玉蜀黍放在馬背上，本來兩邊的重均；可是不知怎麼一來，玉蜀黍老是要移動，幾乎沒有一次例外的，玉蜀黍偏於一邊，失了平衡，貨一齊從馬上掉下來。我的氣力不夠，不能再把玉蜀黍裝上去，只能在道旁等着等着，有時要等幾點，才有行人過來，請他幫我脫離難關。有時等幾個鐘點，便哭幾個鐘點。這樣一來，時候多費了，到了然遲了，再等玉蜀黍磨好，一路載回來，到家裏有時要到夜深。這條路又是冷靜不過的，而且要穿過森林。我真要嚇死了。聽說森林中常有逃兵埋伏着，人家對我說，逃兵看見單身的小黑奴，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把他的耳朵割下來。再說，而且回家遲了，還免不了頓責罵，或一頓痛打。

我做奴隸的時候，什麼教育都沒有受過。有幾次我陪小女主人去讀書，代她拿書包，總算到過校門口。我看見幾十個男女小學生在教室裏讀書，這景象使我感覺到，一個人能這樣子到學校裏去讀書，正和進入天堂一樣。

照我所能記得的，我第一次知道我們是奴隸，解放奴隸的問題已在討論了；是在一個天還未亮的早晨，那時我被母親驚醒了。她跪在她兒女的前面，虔敬的祈禱着，祝林肯（Lincoln）和他的軍隊能得勝利。她和她的兒女有一日能得到自由。這一點，我始終不明白，南方的奴隸都是完全不知書報爲何物的羣衆，但是對於騷動全國的民族問題，卻能知道得這麼正確，這麼完全。加利松（Garrison）、拉夫加（Lovejoy）

和其他的人一開始自由運動，南方的奴隸們便極關切着時事的進行。雖然在南北戰爭的前夕，及戰爭之際，我還不過是一個孩子，我現在尚能記得，每在夜深的時候，聽到母親和其他農場上的奴隸交頭接耳的討論時局。這種討論，顯示着他們是明瞭時局，利用所謂「口頭」電報來得到消息的。

在那次選舉總統運動中，林肯還是個候補者，我們遠處在農場上的奴隸，雖然離開最近的鐵路，最近的大城，最近的報館，至少有好幾哩路，卻都知道那問題的焦點。南北戰爭一開始，農場上每一個奴隸都覺得而且知道，雖則別種事件也牽涉到，而重要的卻是奴隸問題。即使住在最遠的農場上，一個最愚笨的黑奴，心裏也毫無疑惑的覺得，只要北軍勝利，那戰爭結果便是奴隸的解放。每一次聯邦軍的勝利，每一場同盟軍的敗北，都是極敏銳極緊張的關切着。大戰的勝負，奴隸們常常比白人先得到消息。這消息老是從被差到郵局去取郵件的黑人中得來。因為郵局離農場沒有三哩路，郵件呢一星期只到一兩次。被差去取信的人常常逗遛在郵局門口，白人們拿到了郵件，都聚在那邊談論最近的時事，所以都聽得明明白白。那去拿郵件的黑人一回來，便將所聽到的消息一五一十報告出來，所以黑奴們常比在大屋子裏的主人先得到消息。

我不能記得在孩提或幼童時代，有否一次全家同桌坐着，像文明人一樣，做了禱告進食。在弗基尼阿的農場上孩子們喫飯，簡直和啞口牲畜差不多，即到後來，還是如此。這裏一片麪包，那邊半塊殘肉。一會兒

一杯牛奶，一會兒一些番薯。有時候我們家裏一部分人便從鍋罐裏拿着吃，一部分人把洋鉛盆擱在膝上吃。食具自然是沒有的，好在我們都有兩隻手，可以抓來吃。後來我長得相當的高大，便被差到大屋子裏去侍奉就食時的主人，那便是去拉紙風扇趕去食桌上的蒼蠅。吃飯的白人有時談及自由問題，談及戰爭，從中我聽到了許多。記得有一次，我看見我的兩個年青的女主人和幾個女客，在院子裏吃薑餅。那時，這種薑餅，在我看來，是最引口最可羨的東西；當時我便私心決定，一旦我得了自由，能得也像今天那些貴婦一樣有薑餅可吃，我的最高的慾望就可算達到了。

當然，戰爭延長下去，白人往往要感到自己不容易得到食物。我想，倒是黑奴們所受的痛苦，沒有像白人那麼尖銳；因為黑奴的糧食僅是玉蜀黍做的麪包和猪肉，農場上都可出產；但是白人吃慣了的咖啡、茶、糖等等，都不是農場上的出品；戰爭一發生，這些東西都不能得到。因此白人處入了窘逼的境遇，沒法兒，只好拿炒焦的玉蜀黍當做咖啡，一種黑色的糖漿當做糖。所謂茶和咖啡，也時常沒有甜味。

我記得我第一雙的鞋子是木屐。那摺厚的木底，上面釘一條粗皮。走起路來的，督的督發出可怕的聲音。因為木屐對於足部的壓力毫無彈性，所以極不舒服。穿起來也極其難看。但是我做小黑奴的時候，最難堪的磨煉，要算穿粗麻衫的一件事了。在弗基尼阿我所住的地方，通常都用粗麻給奴隸做衣服穿。給我們做衣服的粗麻，原是預備丟棄的廢料，自然是麻布中最粗硬，最便宜的一部分。這第一次穿新麻衫所受的

痛苦呀，我簡直想不出再有別的痛苦可以比擬，或許和拔牙有些相像罷。穿在身上好像有一打多的毛栗子，或一百多隻小別針刺在你的皮肉上。直到現在，我還能清清楚楚的感覺到當時穿新麻衫的痛苦。再加那時我的年紀輕，皮肉柔嫩，所以更是了不得。但我沒有辦法：要穿便穿，不要穿便沒有。要是可以隨我選擇，我情願一絲不掛。說起粗麻衫，我聯想到我的哥哥約翰來了，他比我不過大了幾歲，爲我做了一件慷慨仗義的好事，在黑奴的親族中，我從未聽到過有人肯替別人這樣做過。每次我須得穿新麻衫的時候，他便慷慨的代我先穿了幾天，直到芒刺擦輓了再給我穿。當時我所穿的惟一的衣服，直到我長成青年，還是一件事。

或許有人聽了我上面所說的，要想我們一族的人對於白人一定是有惡感的，因爲大多數白人都出去打仗了，若是南軍得勝，結果黑人仍須爲奴。但是這種假說，在我們一區的人看來，是不正確的。便是在南方任何一區的奴隸，只要待遇稍合情理，在他們看來，也是不正確的。戰爭的時候，我的小人之中，一個打死了，兩個受了重傷。我記得黑奴們一聽到「小主人俾利 (Billy)」的死訊，個個都感到悲哀。這悲哀決不是假裝的，完全是真實的。因爲「小主人俾利」小的時候，我們之中有人曾經領過他，有人曾經和他玩過。工頭或主人責打奴隸的時候，「小主人俾利」常爲他們討情。所以俾利之死，加於奴隸區的悲哀不亞於大屋子裏的人。兩個小主人受了傷送回家來，黑奴們處處表顯同情。他們急急的要想看護，傷人正如親

人一般。也有黑奴要求主人給他們有全夜服侍傷人的特權。在受束縛者而有這種溫存和同情，全出於他們仁慈的和仗義的天性。當白人們出去打仗，把他們的妻子和兒女留在農場上時，黑奴們真的不惜生命的來保護他們。白人男子不在的時候，黑奴被選而睡在大屋子裏，便視爲莫大的榮幸。在晚上如有人想來傷害小女主人或老女主人，先得跨過那管守的奴隸的屍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到這一點，但我敢說，我們種族裏，無論其爲奴隸或自由人，從未聽到其中有受人之託而不效忠的。

在戰爭以前，及在戰爭之際，我們種族裏的人不但對於白人毫無惡感，而且戰爭之後，男主人或女主人因種種原因，有陷於貧困的，還是由他們從前的黑奴小心看顧他們。這種例子很多，簡直可說成了慣例。我眼見許多黑人，多年的以金錢來救濟他們從前的主人。我也知道從前的黑奴中，頗有人來幫助他老主人的後裔得受教育。我還可舉一個例子：南方大農場上有一個青年白人，原是大地主的兒子，因爲性喜喝酒，弄得阮囊羞澀，自制力薄弱，簡直流落爲可憐蟲；那農場上的黑人，自己雖也窮困不堪，卻年年供給這位青年白人的生活必需品。有的給他一些咖啡或一些糖，有的給他一些肉，有的給他這樣，有的給他那樣。只要黑人有，他們決不吝嗇，因爲他是「老主人托姆（Tom）」的兒子，只要這農場的黑人，還有人直接的或間接的知道老托姆，他的兒子是決不致受苦的。

我上面說過，我們種族裏的人，是不失信於人的，我舉一個我自己知道的事作個最好的例子。不久之

前，我在俄海俄（Ohio）州的一個小城市裏，遇見了從前在弗基尼阿爲奴的一個黑人。我知道這是在奴令之前兩三年，和他的主人訂過契約，每年付錢若干，作爲贖身之費，那時他便可隨意到什麼地方，到任何人家去找工作。他以爲在俄海俄可以多得些工資，便到了那邊。後來放奴令發表，他得了自由，他還欠他的主人大約三百元錢。放奴令雖已免除了他的義務，這位黑人還是跑了很多的路，走到弗基尼阿前主人那裏，連本帶利的付清了他最後的一元錢。他對我說，他也知道這錢可以不付，但是他既已和他的主人說定了，決不願失信用。他覺得若不履行他的契約，他的心裏不能享受自由的幸福。

或許有人聽了我所說的，會發生一種觀念，以爲有些奴隸是不要自由的。這是不真實的。我從未見過一個不要自由的，也從未見過一個得了自由再要回復到奴隸地位去的人。

從我的心坎裏，我深深的可憐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不幸而遭羅奴隸制度的羅網。南方的白人奴隸我們的種族，我早已不因此而懷惡感。奴隸制度的發生決不能由一國中的某一區域專任其咎；而且中央政府已多年承認了，保護了這種制度。奴隸制度的觸鬚，一旦絆住了國中經濟的和社會的生活，便是國家要想掙扎，脫卸自己，也不容易。我們如果拋棄成見，拋棄種族情感，實事求是的來看，我便不得不承認說，奴隸制度雖然殘酷，不道德，但是住在這國家裏一千萬個黑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祖先，經受了美洲奴隸制度的教訓，在物質上、智力上、道德上、宗教上所處的地位，比之全球上任何一處一千萬個黑人更來得優勝，更

有希望。我的話從下面的一件事看來，更可證明並不過分；這裏的黑人，他們自己或他們的祖先，經受了奴隸制度的教訓，不絕的回到非洲，像宣教師一樣，去啓發留在祖國的同胞。我說這話，並不是贊同奴隸制度。——反之，我排斥這種制度，我們都知道，美洲之組成這種制度，只爲自私自利和財政上的緣故，並非出於宣教的動機。——我只使人們注意一樁事實，並顯示上帝如何時常利用人和制度來完成他的意旨。有時有人問我，在目前我們的地位，有時看來非常失望，非常沮喪，而我怎麼對於這國裏族人的前途，竟能存着這種信心，我便把良善的上帝已領導我們出了曠野這一件事，來提醒他們。

我長到一有知識，便就存着一種觀念，就是說，雖然我們備受虐待，我們黑人從奴隸制度中所得的教訓，幾乎和白人一樣多。這制度的惡影響決不僅限於黑人。這從我們自己農場的生活中，就可完全表顯出來。奴隸制度的全機構，組織得使人把勞工看作墮落的下賤的表記。因之，在奴隸的農場上，不論白人、黑人，都把勞工當作應該設法逃避的一會事。我們地方的奴隸制度，竟把白人原有的自立自助的精神剝削殆盡。我的老主人有許多兒女，但就我所知，竟沒有一個有出息的，沒有一個有一技之長，沒有一個在生產的工業方面有些專門的用處的。女兒們也不教以烹飪、女紅、家務。這些都是奴隸做的。奴隸呢，對於農場生活，自然毫無個人的興趣，他們又愚笨，做事不求進步，不能學好。因此這制度的結果，弄得籬笆失修，大門脫了鉸鏈，只掛了一半，小門軋軋發響，窗格散了檣，牆上的泥灰落下來也不再粉刷，院子裏長滿了蔓草。通常白

人和黑人都是有食物的，但是在家庭中，在食桌上，足稱得起精美文雅的神氣，使家庭成爲世上最適意最舒服最動人的所在，卻是沒有。同時，食物和其他物質的浪費，說來實在可嘆。後來得到了自由，奴隸們除不能讀書，沒有財產外，和主人們一樣適合地來開始着新生活。蓄奴的主人和他的兒子們並未學過專門的職業。他們不知不覺地存着勞工非他們分內之事的念頭。反而奴隸們大多總學過一些手藝，而且沒有人以勞工爲可恥，很少有願作工的。

最後，戰爭結束，自由之日臨到。對於我們的農場上，這是一個極重大極當紀念的日子。我們已盼望很久了。自由飄在空中，而且飄了好幾個月。天天看見逃兵回家。其他被遣散的或軍團已解散的兵士，不絕地在我們的近處經過。「口頭電報」日夜忙碌。大事的消息和談論，迅速地傳遍各農場。白人怕「揚基」(Yankee) 指美國北部人，有輕蔑之意——譯者) 的侵入，將銀器和其他值錢的東西，從「大屋子」裏搬出來，埋在樹林中，叫靠得住的奴隸看守。無論何人要想來動一動這埋藏的寶物，這人便有禍了。北軍一到，奴隸們會給他們食物、飲料、衣服——什麼東西都可以給他們，但是特別信託他們看管的，這是於名譽有關，他們決不肯給人知道的。這偉大的日子，日近一日，奴隸區裏的歌聲比前更多了。他們的膽子也更大了，人羣也更多了，時常唱到夜深。大多數農場上詩歌的字句，本來也有提及自由的。真的，他們從前也唱過同樣的歌，但是他們很小心地解說歌中所提及的「自由」是指來世的，和今世的現生活無關。現在他們

逐漸揭去了假面具，毫不畏懼地聲明，歌中所提及的「自由」便是今世身體的自由。到了這偉大的日子的前夜，奴隸區中得到消息說，次日早晨，「大屋子」裏將發生非常的事情。那天晚上簡直沒有人睡，要睡也睡不着。興奮期待佔領了一切。次日大清早晨，老老少少的奴隸都被喚去，聚集在大屋子裏。我跟着母親、哥哥、姊姊，和許多別的奴隸到了主人家裏。我們主人的全家都聚在廊下，也有站着的，也有坐着的，都來看所要舉行的事，來聽所要說的話。他們的面部都顯出極深切的情感，或許是愁悶，但不是惡恨。照我現在所記得的，那時他們所給我的印象，並不是因失了財產而愁悶，卻是因他們所養大的，以及平日處處極接近的人，一旦分離，不得不傷心。我現在還記得當場最令人注目的事，是有一個外人（我猜他是個美國官吏）說了短短的一篇演說，接着宣讀了一篇長長的文件，我想那便是放奴宣言書了。宣讀以後，又宣告說，我們全都自由了，可以在隨便什麼時候，到隨便什麼地方去。我的母親那時站在我的身旁，便俯身吻着她的兒女們，快樂的眼淚從頰間流下來。她對我們說明這一切的意義，她說這便是她祝福了好久，還怕生前不能親見的日子。

大家喜樂、感謝、狂歡，盛極一時。但毫無惡感。其實，奴隸之中倒很有代我們的前主人憐惜的。被解放的黑人，這樣狂歡的時間極短，因為我看他們回到小木屋的時候，感情便改變了。他們須得負起極大的責任：得了自由的責任，自立的責任，為自己為兒女計劃將來的責任。這正像一個十歲或十二歲的兒童，忽然進

入社會自謀生活一樣。那盎格羅·薩克森(Anglo-Saxon)人種幾百年來所掙扎着而不能解決的大問題，忽然幾小時內，放在我們身上來求解決了。家庭生活、養兒育女、教育、公民資格、教會的建設和維持等等，都成了問題。這樣一來，奴隸區中幾小時的狂歡，即變為深切的愁悶，這豈可算作怪事呢？在有些人看來，現在確確實實地得到了自由，這自由卻比他們所盼望的更為嚴重。有許多奴隸已經七八十歲了，他們最有用、最勤勞的時代早已過去。即使找到了一個新的住處，他們也沒有能力可以在生疎的地方生疎的人中去謀生活。對於這一批人，問題似乎特別難解決。而且在他們內心的深處，對於舊主人、女主人，以及小主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特殊的親熱，那裏割捨得去。有的和主人們相處四五十年之久，即想離開，也不是容易的事。年老的奴隸漸漸兒，一個個，起初偷偷地，都從奴隸區中踱到「大屋子」裏去，和他們的前主人密切地商量着他們的將來。

第二章 兒童時代

我們被解放了之後，我們地方的人實際上都同意兩件事，便是全南方的黑人都如此：第一，他們須改換姓名，第二，他們須離開舊農場至少幾天或幾個星期，藉以感覺到是否確已自由了。

黑人中都存了一種念頭，以為現在沿用前主人的姓氏是大不適宜的，許多人便取別的姓。這是得了

自由的第一表記。做奴隸的時候，黑人只有一個單名，如約翰，或蘇散（*Seah*）；難得再用第二個名字。倘若約翰或蘇散是屬於白人哈赤（*Hatcher*）的，那末，他有時便叫做約翰·哈赤，或常叫做哈赤的約翰。但是現在都覺得不論是約翰·哈赤，或者哈赤的約翰，決不是用以表示一個自由人的正當的稱號；所以約翰·哈赤便改為約翰·愛斯·林肯，或約翰·愛斯·射曼（*Sherman*），這S一字並不是名字，不過是名字的一部分，黑人很誇耀地當作一個銜頭罷了。

我已說過，大多數的黑人，都離開了舊農場，便是短時期也好，似乎他們可以離開舊地，來嘗嘗自由的滋味。到底是怎麼樣的。等到他們離開了不多時，許多黑奴，尤其是老黑奴，又回到老地方，和前主人訂一種契約，住在他們的地方。

我母親的丈夫，就是我哥哥約翰和我自己的後父，不是和我母親同屬一個主人的。事實上，他難得到我們的農場上來。我記得一年之中或許只來一次，那是在聖誕節的時候。當戰爭的時候，他大概設法逃到北方，加入了聯邦軍，因此他便佳在西弗基尼亞州。等到自由宣布了，他便立刻差人來接我母親到西弗基尼亞的卡那瓦谷（*Kanawha Valley*）去。在那時，從西弗基尼亞翻過山嶺，到西弗基尼亞的路程，實在可厭得很，而且有時非常困苦。我們所有的一些衣服以及家用什物，都放在貨車上，但是孩子們大部分的路程都是步行的，這路程總有幾百哩之遙。

我想我們之中沒有一個人遠離過農場，所以長途跋涉到另一州去，確是一件大事情。離開前主人和農場上同種族的人，也是一樁嚴肅的事。從我們離開前主人起，直到他們死為止，我們和他們一直通信。後來我們和前主人的下代還常常接近。我們旅行了幾個星期，晚上睡在露天，食物也在室外架着木頭燒煮。我記得，有一夜，我們在一所荒棄的小木屋的旁邊停留，預備過夜，母親想在裏面引火造飯，然後再想在地上鋪張葉子給我們睡。火剛剛生着，一條足有一碼半長的大蛇從烟囪上掉下來，在地上爬行，嚇得我們趕快拋棄那所小木屋。末了我們到了目的地——一個叫做毛爾頓 (Malden) 的小城市，離本州的首城查爾茲吞 (Charleston) 約有五哩路。

那時開採鹽礦是西弗基尼亞那一處的大工業，毛爾頓小城正在鹽灶的中心。我的後父已在鹽灶裏得到一個地位，他也爲我們預備了一所小木屋。我們的新屋，比之在弗基尼亞的農場上我們所離開的小木屋，並不好些。其實有一點，只有壞些。從前農場的小木屋雖然不好，但空氣是長年新鮮的；我們的新屋卻是擁在密如蜂窠的小木屋之中，衛生的設備是沒有的，小木屋四周的污物，往往使人難受。我們的鄰居，有的是黑人，有的是極貧困、極愚笨、極下等的白人。簡直是一個極雜亂的淵藪。醉酒、賭博、口爭、打架，以及種種駭人聽聞的不道德的行爲，是司空見慣的。凡住在這小城裏的人，多少總和鹽礦業有些關係。雖然我還是個孩子，後父就把我和哥哥薦到一個鹽灶裏工作。時常在早晨四時我便開始工作。

我第一次得到近乎書本知識的東西，是在鹽灶裏作工的時候。每個馱鹽的人有好幾個桶，他的桶都編着某個號碼。後父的桶是十八號。一天工作完畢，工頭過來巡視，在我們的每個桶上打上十八號字樣。不久，我隨便在什麼地方看見那個號碼，便認識了，後來我甚至也能寫那個號碼，其他的號碼或字母，我卻一些也不知道。

從我有思想起，我記得，我便有一種極熱烈的想讀書的願望。我還在小孩子的時候，我便決定志向，倘使此生毫無成就，我總得設法得到相當的教育，可使我看普通的書報。我們總算在西弗基尼亞的新小木屋住下，我便立即要求母親給我找一本書。我不知道她怎樣，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得到了一本舊的韋布斯忒（Webster）畫面的拼音書，第一面是全批字母，後面印着一些毫無意義的字，如：ab ba ca da 等等。我立刻便把這本書吞吃一樣地讀下去，這是我生平所得到的第一本書。我曾聽人說，讀英文先得讀熟字母，所以我想盡方法拚命學習——自然沒有教師，我也找不到教我的人。在那時，無論在什麼近着我們的地方，我們種族裏能夠讀書的人，連一個也找不到，我膽小得很，不敢向白人請教。不上幾個星期，我總算把大部分的字母都讀熟了。一面我努力學習，一面我的母親也存着同樣的志向，極表同情，盡她所能的幫助我。雖然她對於書本知識，完全不知道，但對於她的兒女卻抱極大的野心，那些用以應付環境的種種良善的，艱深的常識，卻極其豐富。假使我的一生有些值得注意的成就，我實在覺得這一些是從母親那裏得來的。

根性。

我正在努力掙扎企仰求學的時候，有一個在俄海俄州讀過書的少年黑人到毛爾頓來了。黑人們一知道他是識字的，便立刻弄到一分舊報紙，幾乎每日工作完畢的時候，便有一大批男女圍着他急切地聽他讀報上的消息。我真多麼羨慕他啊！在我看來，他有這樣學問，在全世界上，應是一個很得意的青年了。

那時，我們種族裏的人開始討論，想在村上開辦一種專爲黑人子弟的學校。在弗基尼亞這一部分地方開辦一個教育黑人子弟的學校，事屬創舉，自然當作一件大事，因此討論極其興奮。最難的問題是那裏去找教師。那位從俄海俄州來的能夠讀報紙的少年，曾被提及，但是他的年齡不配做個教師。正在討論教師問題的當兒，又有一個從俄海俄州來的少年黑人，他曾當過兵，不知怎的，到了我們地方。人家當即知道他是受過上等教育的，於是黑人們便請他在他們第一個學校裏教書。因爲那地方黑人的義務學校尙未開辦，因之每家同意每月付費若干，大家說定教師請吃「輪衆飯」——就是每家輪流吃一天。這辦法於教師也不壞，因爲每家隨着教師來的那天，總盡力供給最好的東西。我記得那時巴望教師到我們小木屋的日子會輪到，可以開開胃口。

全民族開始第一次到學校裏去，這種經驗對於研究任何民族的發展，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不是親身在場的人，決難明瞭我們種族裏的人竟會這樣迫切地追求教育的。我已說過，這是全個民族想入學校。不

管年紀太輕，更不嫌太老，個個都想求學。只要我得到任何教師，日校、夜校都擠滿了人。老年人求學的最大目的，是想在未死之前，可以讀聖經。存着這種念頭，便有年老五十或七十五歲的男女，在夜校裏往往可以看到。在宣布自由不久，主日學校也開辦起來了，但是主日學校中最主要的書卻是拼音書。日校、夜校、主日學校，都擠滿了人，往往有許多人爲了沒有空額而退回了。

可是卡那瓦谷開了學校，卻使我覺到了終身未受過的莫大失望。我在鹽灶裏已做了幾個月的工，我的後父見我可以賺一些錢，所以學校雖然開了，他卻決不許我拋棄工作。這種決意，好似黑雲遮蔽了我一切野心。我作工的場所剛剛又能使我早早晚晚看見快樂的兒童上學放學，這使我的失望更加難受。然而我也不願失望，仍舊決定志向，無論如何，我總得學習一些。我比從前更用心地來熟讀那本藍面拼音書中的功課。

母親見我失望，極表同情，用種種方法來安慰我，幫助我設法可以讀書。過了不久，居然和教師商量成功了，在我日工之後，晚上教我一些功課。這夜課真使我高興，我知道我在晚上所讀的，比別的兒童在日裏所讀的更來得多。我自己身受的夜校經驗，使我對於夜校極有信心，後來我乘着這種信心，便在哈姆普吞 (Hampton) 和塔斯岐基 (Tuckeegee) 開辦夜校。但是我少年的雄心仍舊念念不忘那日校，我決不使我上進的機會失掉。到底我勝利了，我得到允許，可以進日校讀幾個月，說定早晨起得早，在鹽灶裏作工到

九點鐘，下午一放學，便須立刻回來，至少再作二小時的工。

校舍離鹽灶頗有一些路，我必須作工到九點鐘，而學校上課卻又正在九點鐘，這真使我爲難了。我未到校已上課了，有時我的一班已散課過了。爲要解決這個難題，我竟入了試探，我想一定有許多人要責罵我。但是事實如此，我也可以說出來。我深信事實的力量和影響掩飾事實，並不能永久地得到什麼好處。鹽灶的小辦公室裏有二隻大鐘。一百多工人的上工下工，自然都是由這隻鐘來規定的。我一想，若要按時到校，除非把八點半撥到九點鐘。我每日早晨便這樣做。後來工頭發現這鐘出了毛病，便把鐘鎖了起來。我做這事，並非有意妨礙別人，我只想自己能準時到校罷了。

我第一次到校，便遇見了兩件難事。第一件，別的兒童都戴帽子或便帽，我卻一頂也沒有。其實，我從小到上學從未戴過帽子，不但是我，便是別人也從未想到頭上有戴東西的必要。但是一見別的兒童都這樣戴着，我自然覺得偏促不安。我照例將這情形告訴母親，她說明沒有錢到帽店裏去買帽子，那時帽店在我們種族裏是一種新商店，帽子是老老少少的時髦品。但是母親說她會設法解決這件難事。於是她找了兩塊粗布，縫起來，我便很自傲地有了第一頂帽子。

在這件事上母親所給我的教訓，常常印在我的腦中，我也盡力將這教訓教導別人。我每想起這件事，便頗覺自傲，就是我的母親品格高尚，力量足以不入引誘，不充闊綽——她沒有錢買帽子，決不冒充有錢，

強使我的同學和別人知道她可買帽子。我常覺自傲，她自己無力買東西，決不肯向人借錢。此後，我也有過許多帽子，但沒有一頂比得上我母親用兩塊布縫起來的那一頂來得寶貝。又有一事使我不忍言，就是有几个兒童，他們一開始便戴着店裏買來的帽子，他們都是我的同學，卻聯合起來嘲笑我，因為我只有一頂粗布做的帽子；他們到後來，有的入了感化院，有的直到現在，還不能買一頂任何帽子。

第二件難事是關於我的名字，或說一個姓。從我能夠記憶什麼起，我就叫做濮各爾（Booker）。未入校以前，我從未想到再要有一個名字是必要的或適當的。我一聽人家報名，便注意到每個兒童至少要有兩個名字；有的在我看來，真太闊綽了，竟有三個名字。我深深地感到不安，因為我知道教師至少要我報出兩個名字，而我卻只有一個。到了我報名入冊的時候，我便有了主意，可以對付這個情景。教師問我全個名字的時候，我便不慌不忙地告訴他，我叫濮各爾·華盛頓（Washington），好像我一向就用這名字一樣，以後我便叫做這個名字。到後來，我才知道我一出娘胎母親便為我取名為濮各爾·塔利阿斐羅（Taliferro）的。但是不知怎的，那一部分的名字不用了，後來也就忘了。到了再知道那個名字時，我便恢復起來，使我的名字成為濮各爾·塔利阿斐羅·華盛頓。我想在我們國中，像我這樣取名字的人恐怕不多罷。

我好幾次想追溯數百年前的祖先，自己比擬為世家子弟，不但門第顯赫，而且家道豐富；然而有時仔細一想，倘使我真的承繼了先人的洪福，做了優秀民族的人民，我不免入了試探，自己不肯努力，專以顯赫

的門第，優秀的民族是賴了。數年前我曾存個念頭，我正因沒有燦爛的家聲，我將留個新紀錄，使我的子孫可以自傲，並且藉以鼓勵他們更加努力。

世人對於黑人，尤其是青年黑人，不應太粗率太苛刻地下批評。黑色孩子有各種的阻力、沮喪、試探，須得奮鬥，這種困難，非身處其境的人，是不會了解的。白色孩子做一件事，都以為可以成功。反之，黑色孩子即使不失敗，人們便要驚奇了。總之，青年黑人一開始便有種種於他不利的阻礙。

然而只要倚賴心不太重，則門第的影響對於個人或民族的前途頗有幫助。有些人常注意青年黑人道德上的弱點，以他的進步去和青年白人相比，這些人根本沒有考慮到他們間門第的不同。我在別的地方已說過，我不知道祖母是誰。我雖曾有過諸如伯叔堂表兄弟，但是他們在什麼地方我大多都不知道。我的情形可以代表全國的千萬黑人。白人孩子自己明白，倘若終身失足，他將辱沒他祖宗三代的家聲。這種觀念對於他的拒絕誘惑，有着極大的幫助。在他奮鬥的時候，他的左右前後都有誇耀的家聲，以及種種家庭關係包圍他，作為一種刺激，幫助他勝過困難。

我得進入日校的時間頗短，還得常常缺課。不久，竟不得不完全停學，將全部的光陰都放在工作上。於是我又進了夜校。實際上，我在少年時候所得的大部分教育，都是在日工以後從夜校裏得到的。我又時常找不到一個滿意的教師。有時我請到了教夜書的人，但是所請的教師自己並不比我高明，這又使我大失

所望。我往往爲了要上夜課，在晚上跑好幾哩路。在我的少年時代，從來沒有一次自己缺過課，真是風雨無阻地下個決心，不論代價如何，我總得受教育。

我們搬到西弗基尼亞不久，我的母親自己雖然貧窮，卻養了一個孤兒，後來我們給他取個名字，叫做詹姆斯·皮·華盛頓 (James B. Washington)。以後他一直便作爲我們家裏的人。

我在鹽灶裏做了些時，又被送到煤礦裏去作工。那煤礦大部分是爲供給鹽灶的燃料而開辦的。煤礦裏的工作常使我恐懼。第一，煤礦工人至少在工作時候，老是顛簸不堪的，便是做完了一天工作，要洗淨身體，也是極困難的事。第二，從入口到採煤的地方，足足有一哩路，這一條路自然是漆黑非凡的。我相信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決經歷不到煤礦工人所經歷的黑暗。煤礦分成許多不同的礦穴，這許許多多礦穴的地位，我又不能一一認識，所以往往在煤礦裏要迷路。迷了路已夠恐慌了，有時禍不單行，燈也熄了，湊巧又未帶火柴，那我只得在黑暗中摸索，直到遇見別人再點亮了燈。工作呢，不但艱苦而且危險。火藥不及時而爆炸，便要把人炸得粉碎；巖石坍下來，便要壓成蓋漿；這些危險都是常有的。種種原因可使不測之禍隨時發生，那得不使人終日提心吊膽呢？許多嫩芽似的兒童，被迫到這種煤礦裏來消磨他們的青春，毫無受教育的機會，這情形不但在那時如此，恐怕即在今日在大多數的煤礦區中，還是如此罷。還有更可憐的，我常注意到，那些一開始便在煤礦裏作工的年輕兒童，往往發育不全，智力受挫。到後來，不但青春消磨，連志氣也

消磨了，除了老是做個煤礦工人外，別的事情也不想幹了。

在那時候我常常想着，後來我長成青年了，還是想着，想到一個白色孩子，他可自由發展他的欲望和活動，外界絕無阻礙，這種孩子的情感和野心不知是怎樣的。我常羨慕白色孩子，他偶然投生在顯赫的門第中，或優秀的民族中，一經長大，可以直上青雲，要做議員，要做省長，要做主教，甚至要做總統都可以，他的前途毫無阻礙。我常想像，倘使我生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將怎樣從最低層做起，怎樣步步高陞，以至怎樣登峯造極。

後來我自己覺得，我也不必像從前那樣去羨慕白色孩子。我深知成功的大小，並不在乎一生所達到的地位，乃在乎奮鬥的過程中所勝過的困難。從這個觀點看來，我幾乎可以斷定說，只要不以成敗論人，則黑色孩子出身的微賤，以及他在被藐視的民族中環境的惡劣，倒是於他有利的。因為除了少數的例外，黑色青年要想成名，須得比白色孩子更加努力，成就更大更好的事業。他須得勝過難關，力求出路，在他奮鬥的過程中，他便得了一種力量和自信力。通力量 and 自信力在出身望族前途平坦的人，卻是沒有的。

無論如何，我情願安於我之爲我，一個厄革羅（Negro）人，不願想做最優秀的民族的人民。我一聽到任何民族的人民，不估量自己的價值，自己的造詣，動輒以某某大國民自傲，要求這樣特權，那樣特權，或什麼什麼卓異的徽章，這真使人可嘆。我對於這種人只覺得悲傷，因爲我深知，除非自己個人有價值，單靠

幸而屬於所謂優秀民族，決不會永遠抬高他的地位；反之，只要自己本身真有價值，雖不幸而屬於被人所輕視的劣等民族，也不會因此而降低。須知真有價值的人，不論他的皮色如何，歸根到底，終會被認識而得到酬報的，這是永久不變四海皆準的人類大法律。被壓迫的個人或民族，在這條定律之下，也可得些安慰。我在這裏說這話，不但鼓勵我個人自己，也鼓勵我自詡所屬的民族。

第三章 爲受教育而奮鬥

有一天，我正在煤礦中工作的時候，偶然聽到兩個礦工說到弗基尼亞某地有一個專爲黑人而設，規模偉大的學校。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了。比我們小城市裏黑人小學更大的學校或學院。

在煤礦的黑暗中，我靜悄悄地爬過去，爬近正在談天的兩個人。我聽到有一個對另一個說：這學校不但專爲我們種族裏的人而設，而且還使窮苦有志的學生有工讀的機會，工讀生的膳費可以全免，或免去一部分，同時還教你一些商業或工業的技能。

他們這樣談下去，我幾乎聽得失神，似乎這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地方。那時在我看來，天堂的引誘力，也及不來這兩個人所說的弗基尼亞的哈姆普吞師範農業學院。雖然我不知道這學校在什麼地方，有多少路，怎樣去法；我卻立刻決定要去；我只記得要到哈姆普吞去的野心，像火一樣地燒着。日日夜夜只存着這

個念頭。

從我聽到哈姆普吞學院以後，又在煤礦裏做了幾個月。那時聽說鹽灶和煤礦的老闆，琉伊斯·勒夫納 (Lewis Ruffner)，將軍家裏有個空缺。勒夫納將軍的夫人，淮俄拉·勒夫納 (Viola Ruffner) 是從弗蒙特 (Vermont) 要來的「揚基」女人。這位勒夫納夫人嚴厲的名聲，是四鄰皆知的；她對於僕人，尤其對於想去服侍她的小廝們極其嚴厲。在她的家裏能繼續兩三星期以上的僕人，簡直很少。他們出來的理由都是一樣：「她太嚴厲了。」然而我卻以為與其老在煤礦裏，不如到勒夫納夫人家裏去試試看，於是母親便爲我去討這個空缺，我便被雇爲傭僕，每月工資五圓金洋。

關於勒夫納夫人嚴厲的話，我已聽了不少，所以我真有些怕見她，等到走近她的面前，我竟發起抖來。可是我同她相處幾個星期，我便明白她的性格。第一，她極要清潔；第二，做事要快，要有頭緒。第三，最最要緊的，她喜歡絕對的誠實和坦白。什麼東西都不可馬虎，零亂；每一扇門，每一處籬笆，都要整整齊齊的。

我現在也記不起，不知同她相處多少時候，才到哈姆普吞去。想來至少總有一年半光景罷。無論如何，我在勒夫納夫人家裏所得的教訓，其價值並不亞於我以後在任何地方所受的教育，這是我屢次所說，現在還是要重說的。直到今日，我從沒有看見屋內或街上散着碎紙，而不立刻去拾起來的。我從沒有看見污穢的院子而不去掃清的，一排歪倒的籬笆而不去豎起來的，一所未油漆或未粉刷的房子而不去把牠油

漆好或粉刷好的，一顆衣鈕落脫了，衣服上或地板上着了油漬而不注意到的。

我起初懼怕勒夫納夫人，不久，我便當她是一個好朋友了。她覺得我靠得住，便毫不懷疑地信託我。在她那裏過了一兩個冬天，在冬季裏她每天給我一個小時到日校裏去讀書的機會，但是我大部分學習的時間卻在晚上，有時一個人自修，有時我請一個人教我。勒夫納夫人時常鼓勵我，同情我的努力求學。我第一個圖書館便是在和她同住的時候集成的。我尋到了一隻布疋箱，敲去一面，裏面加了幾層夾板，就將手頭所有的書都放進去，這就算是我的「圖書館」。

我在勒夫納夫人家裏雖然很得意，但並不放棄到哈姆普吞學院去的念頭。到了一八七二年秋季，我雖然還沒有正確地知道哈姆普吞的方向，也不知道要用多少費用，我卻決定努力要到那邊去。我知道我這個要到哈姆普吞去的野心，任何人也不敢完全表同情的；有的只是我的母親，但她也惴惴不安，深怕我這樣出發，只是「想吃天鵝肉」罷了。總算我得到了可以去的允許，但是她的允許是半信半疑的。我所賺來的一些金錢都給後父和其他家人用去了，所剩的只有幾塊金洋，這一些錢要買衣服，要付路費，真是太少了。哥哥約翰總算盡力幫助我，所出的自然不多，因為他也在煤礦裏作工，工資不多，所賺得的大部分都作了家用。

我動身到哈姆普吞去時，最使我感動，使我安慰的，恐怕要算許多年老的黑人們關切的態度了。他們

有用的青年時期已消磨於奴隸生活中，想不到在生前還能眼見他們種裏竟有一個人離了家庭，到寄宿學校裏去讀書，這些年老人有的給我一個鎊幣，有的給我一個二角五分的銀幣，也有給我一條手帕的。

末了，這偉大的日子一到，我便要動身到哈姆普吞去了。我只有一隻價廉的小袋，裏面放着我所能得到的一些衣服。這時我的母親身體頗弱，精力大衰。我心想以後恐怕不能再見到她了，這更使我們的分離痛苦一層。可是她很勇敢地忍住了。那時從西弗基尼亞的這部到弗基尼亞的東部還沒有通車。只有一段路可通火車，其餘的路程是用驛車的。

從毛爾頓到哈姆普吞約有五百哩路程。我離家不到數小時，便發覺極痛苦的困難，到哈姆普吞去的途費不夠呀。有一件事情，我是始終不會忘記的。當日下午，我坐着舊式驛車，翻過幾個山頭，到了晚上，驛車停在一所和普通民房一樣的，不加油漆的房屋，叫做旅館的門口，預備過夜。除我以外，旅客都是白人。在我不知情形的人想來，以為這一所小旅館是專招待乘驛車的旅客的。我料不到一個人皮色的不同，竟會受到不同的待遇。別的旅客都一個個被迎入臥室，預備吃夜飯了，我只得自慚形穢地走到帳房面前。實際上我的確是沒有錢可付食宿，但我總想設法懇求旅館的主人，特別賜恩許我過夜，因為當那個季節，在弗基尼亞山中，天氣是極冷的，我自然須得在室內過夜。萬不料那位帳房也不問我有錢無錢，便堅決地回絕了我，供應食宿的事，甚至連考慮一下也不肯。這是我第一次發現我的皮色是含着什麼意義。沒法兒，我便東

跑西跑，藉以取暖，這樣過了一夜。那時我的全心全意都專放在到哈姆普吞去，沒有其他心思去怨恨那旅館的主人。

有時步行，有時求搭貨車或小車，過了不少日子，總算到了利赤蒙德 (Richmond) 城，離哈姆普吞尚有八十二哩。我到了那邊，又疲乏，又飢餓，又污穢，又是在夜深。再加我從未到過大城，這更使我困苦不堪。到利赤蒙德的時候，錢是一個也沒有了。這裏沒有一個熟人，街道又是生疎，不知向那裏走是好。我走了好幾處想借宿一夜，他們都是要錢的，而錢正是我所沒有的東西。自己知道無法可想，我只得賤馬路。這樣賤着，又經過許多吃食店，油煎雞，對開的蘋果餡糕，堆得高高的，引得垂涎欲滴。那時我簡直情願將我以後所能得到的財產，來換一隻雞腿或一塊餡糕。但是雞腿餡糕都得不到，便是別的東西也沒有吃。

我大約總走到半夜以後，竟至精疲力竭，不能再走了。我是疲乏了，我是飢餓了，我是吃盡一切的苦了，但我決不灰心。正在體力極度困頓的時候，我走到了一處，那裏木板搭的人行道升得很高。我立了一會，確知路人不會見到，便爬到人行道底下，用盛衣服的布袋當作枕頭，在地上睡了一夜。我幾乎全夜聽到腳步聲從我的頭上走過。第二天早晨，覺得精神恢復了一些，但是餓已餓到極點，因為我好久沒有吃飽了。天一亮，當我的四週約略可看的時候，我才注意到我睡在一隻大船的附近處，那隻大船正在卸貨，卸的是鐵塊。我立刻跑到船上，見了船主，請他允許我幫助卸貨，可以賺幾個錢買食物吃。船主是個白人，看來存心慈善。

便允許了。我做了許多工夫，才賺到了一頓早餐錢。我現在想起來，那早餐好像是我一生最有味的一頓。我的工作得了船主的歡心，他對我說，若是我願意，每日可以做一些。這我自然是樂於接受的。我繼續在船上做了好幾天。可是所得的工資極其微薄，除去飯錢，剩下來的仍不夠作爲到哈姆普吞去的途費。我又要準時到校，於是不得不盡量節省，晚上仍舊睡在那第一夜到利赤蒙德過夜的人行道下。此後隔了多年，利赤蒙德的黑人們，爲我開了一個盛大的歡迎會，到會的人總有二千多。這歡迎會的地點，離我第一夜到那城裏所住的人行道不遠。老實說，這歡迎會雖然親熱慰勸，我的心中卻想念着那第一次給我過夜的人行道，而爲之感慨不已。

我算算積蓄的錢，大約可以到哈姆普吞去了，便向船主道了謝，再動身上路。從此一路平安，到哈姆普吞時，剛剛還剩五角錢，作爲我開始學業的一切費用。我這次長途跋涉，備嘗辛苦，總算來到了這裏；但一見這三層樓磚砌的巍大校舍，我好像已經得到了酬報。要是那些捐助校舍的人，能體會我個人以及其他幾千別的青年，一見了這校舍而引起的影響，他們更將樂爲捐助罷。在我看來，這校舍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富麗的建築了。牠的景象似乎給我一個新生命。我覺得一種新生活現已開始——生活現在有了新的意義。我覺得我已進了福地，我便決定不怕任何磨難，盡力奮鬥，以自求適合於達到世間上的至善之境。

我一到了哈姆普吞學院，便立刻跑到主任教師面前，請求插班。那時我已好久沒有充分的食物，好久

不洗浴，好久不換衣服，自然不能給她良好的印象，所以我立刻看出她的心中對於取捨這種學生存着疑慮。我自知倘使她看我是個毫無價值的游手好閒者或流浪者，我也不能怪她。她既不回絕我，也不收留我，這樣過了好久工夫，我只得在她的旁邊逗遛着，一面用盡心思，使她相信我是可以造就的。同時我眼見她一個個收了別的學生，這更使我大爲不安，因爲我自己明明知道我可以和他們一樣努力，一樣做得好，只要給我一個表顯自己的機會。

過了好幾個鐘點，那位主任教員才對我說：「隔壁課室要打掃打掃，拿把掃帚去打掃罷。」我立刻想到，這是我的機會了。我從來沒有這樣高興地接受命令過。我知道打掃是我的拿手傑作，我和勒夫納夫人同住的時候，她已教得我很詳細。

那間課室我掃了三次，又拿了一塊抹布，抹了四次。所以四壁木裝的部分，每一條凳，每一張桌，每一張寫字檯，我都抹了四次。而且，每一個器具都搬動過，室內每一座壁櫥，每一個牆角，都抹得清清爽爽。我深知我的前途，全靠這次打掃課室所給與教師的印象。一切收拾停當了，我便報告主任教師。她是「揚基」婦人，她知道什麼地方去找污點。她進了課室，先把地板和壁櫥檢查一下；再拿出手帕，在牆壁木裝的部分，桌上，凳上統統措過。地板上找不到一點污垢，所有的器具上也找不到一些灰塵，她便溫和地說：「我想你可以進這個學院。」

啊，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了！打掃課室是我的入學考試，任何投進哈佛（Harvard）大學或耶魯（Yale）大學的青年決不會比我更純真滿意的。此後我也經過幾次考試，但只覺得這次最得意了。

我已把投入哈姆普吞學院的親身經歷敘述完了。受過同我一樣經歷的人恐怕很少罷。但是，同時總有幾百個青年也經過類似我的困難，而進入哈姆普吞或其他學校。青年男女決心求學是不問代價的。

我這樣打掃課室，好像是鋪了一條通過哈姆普吞的大道。馬基（Mary F. Mackie）小姐，就是那位主任教師，給了我一個管屋的職司，我自然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因為有了這個職司，幾乎全部膳費都可免了。這工作是辛苦煩重的，但我只專心致志地幹着。許多房間須得管理，晚上做得很遲，而且早晨四時便要起來，才來得及生火，並且才有一些預備功課的時間。我在哈姆普吞求學的時候，以及以後在社會上辦事的時候，我覺得馬基小姐，就是我所說過的主任教師，是我最得力最有幫助的一個朋友。我在最苦悶的時候，她的教訓和鼓勵常常於我有益，增加我的力量。

哈姆普吞學院的建築和外觀所給我的印象，我已說過，但我還未提及那最偉大最永久的印象呢，那便是一位大人物——在我平生有幸所逢到的大人物之中，他是最高尚，最稀有的人物。我所說的是指已故的阿姆斯特朗（Samuel C. Armstrong）將軍。

我自覺有幸，親身遇見過歐美兩洲的許多所謂大人物，但我毫無猶豫地說，照我看來，沒有一個比得

上阿姆斯特隆將軍的。我剛從奴隸區及煤礦的下等社會出來，便得直接和德高望重的阿姆斯特隆將軍接觸，這不能不算是我莫大的榮幸。我永不忘記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印象，他是一個完人。我不禁感覺到有一種超人的丰度。我頗榮幸，從我進入哈姆普吞直到將軍歸天，得以和他個人接近，我多見他一次，我的敬仰心便更進一層。即使哈姆普吞沒有校舍，沒有課室，沒有教師，沒有一切的作業，只要男女學生天天有和阿姆斯特隆將軍接觸的機會，只是這一點，也可算是偉大的教育了。後來我年紀越大，越覺得書本上的教育和貴重的儀器上所得的知識，都不及和男女大人們相接觸而得的那麼大。我想我們學校和大學的學生，與其死讀書本，何如活讀人事呢！

阿姆斯特隆將軍在最後的六個月中，在我的塔斯岐基家中住了兩個月。那時，他患着癱瘓病很厲害，他的身體和喉音，都不能自己作主。雖然有病，他還是日夜不息地爲他的終身事業工作着。我從未見過一個人，像他這樣的不顧自己。我相信他決無自私自利的念頭。他很樂意地在南方幫助別的學院，正像幫助哈姆普吞一樣。南北戰爭時，他也打過南方的白人，但以後我從未聽到他對於南方的白人出過一句惡言；反之，他常常想盡方法來服務南方的白人。

哈姆普吞學生對於他的擁護和信仰，簡直不容易描寫。實際上，學生都崇拜他。我深知無論什麼事，給阿姆斯特隆辦起來，是決不會失敗的。他要人家做的事，幾乎用不着他開口，人家都樂爲他效勞。他在我的

阿拉巴馬 (Alabama) 家中作客的時候，患癱瘓頗厲害，只能坐在有輪的病椅裏推着行動，我記得有一個將軍的從前學生給他推病椅，推上一座路長而嶄絕的山，推得精疲力竭。到了山頂，這位老學生樂得光輝滿面，說道：「我真快樂，能在將軍未歸天之前，被許作一件實在煩難的事。」當我在哈姆普吞做學生的時候，所有的宿所都擁擠得沒有餘地給再要進來的人。將軍想了個法子，來補救這個缺憾，教人搭造帳篷作爲臥室。若有老學生情願住在帳篷裏過冬，阿爾斯頓將軍是很欣慰的。這個消息一被學生們知道，幾乎校中每個學生都願意去住。

我也是一個願意住帳篷的。住在帳篷裏的那一年冬季湊巧特別冷，我們真凍得要命——到底有多少冷，恐怕阿爾斯頓將軍也不知道，因爲我們沒有出過一句怨言。我們只要能使阿爾斯頓將軍歡喜，使額外的學生能受教育，已夠滿意了。好幾次，夜已夠冷了，再來了一陣狂風，把帳篷全部吹起，我們只得在露天裏過夜。每日清晨，將軍親自來巡閱帳篷，我們聽了他慇懃愉快鼓勵的話，任何沮喪的情緒就都化爲烏有了。

戰爭以後，幾百個存着基督教世之心的男女，到黑人學校裏來服務，以提高我們的民族，我這裏所說的可敬仰的阿爾斯頓將軍，不過一個例子罷了。要比這些到黑人學校裏來服務的男女，更高尚更純潔更爲大公無私的人物，全部世界史上也舉不出來。

在哈姆普吞的生活繼續不斷地給我新啓示，繼續不斷地領我進入新世界。吃飯有定時，用檯布，而食巾、浴盆、牙刷等，也都應用起來，床上鋪起被單來，這些於我都是新鮮的。

有時我想，我在哈姆普吞學院裏所得的教訓，最可貴的恐怕是養成沐浴的習慣了。我到了這裏才第一次知道沐浴的價值，不但使身體清潔，也可激勵自重心，促進道德。以後離開哈姆普吞，我在南方或別處旅行的時候，總得設法每日沐浴。有時我在同族家中作客，只有單間的小木屋，要找一個沐浴的地方頗不容易，我便溜到樹林中小溪裏去。我往往告訴我族中人，家庭中總得設備一個沐浴的場所。

我在哈姆普吞當學生的時候，多時只有一雙襪子，穿污了，便在晚上洗出，掛在火爐上烘乾，第二天才可再穿。

哈姆普吞膳費每月十元金洋。學校要我一部分付現，其餘以工作作抵。我已說過，我進學校時只有五角錢，怎夠付現呢。哥哥約翰不時寄我幾塊錢，我簡直沒有錢可付膳費。我開始便決定好好地管理房屋，使人家知道我的工作是不可少的。我的努力居然成功了，我得了通知，說我的工作可以全部抵作膳費。學費則每年七十元金洋。這自然又非我所能供給的。倘使供給膳費之外，不得不再付七十元金洋的學費，那我只得被迫而離開哈姆普吞學院了。幸而阿姆斯特隆將軍極熱心地請求馬薩諸塞(Massachusetts)州，紐·培德福(New Bedford)城的摩爾根(S. Griffiths Morgan)先生，代我付了我在哈姆普吞

求學的全部學費。後來我在哈姆普吞畢業以後，到了塔斯岐基從事我的終身事業，很榮幸地去拜望了摩爾根先生幾次。

我在哈姆普吞住了不久，因為沒有書籍和衣服，覺得困難非凡。書籍呢，往往向景況較佳的同學借用，尚可勉強過去。至於衣服，我到哈姆普吞時，可以說一無所有。我所有的一切，全在一隻小布袋裏。阿姆斯特隆將軍是要學生排了隊伍一個個檢查衣服的清潔的，這格外加緊了我的焦急。鞋子須得擦光，衣服不可脫紐，不可有污痕。每天老是穿着這一套衣服，工作的時候這一套，上課的時候仍是這一套，而且必須保持清潔，這對我實在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我還是想盡方法勉強過去，直到教師們都知道我是誠懇的想做好的，他們才很仁慈地給我一些一箱一箱從北方寄來的舊衣服。這一箱一箱的舊衣服，是窮苦有志的學生的恩物。倘使沒有這種舊衣服，那末我是否能夠在哈姆普吞修完學業，還是個問題。

我第一次到哈姆普吞的時候，我記得從未睡過鋪着兩條被單的牀。那時校舍不多，臥室極其寶貴。我同室的還有七個人；他們大都已在那裏多時了。我見了兩條被單，真是莫名其妙。第一夜我睡在兩條被單下面，第二夜我睡在上面；後來看了別人，才知道是睡在兩條之間的，再後來我也居然以此教導別人。

那時哈姆普吞學生中，我是最年輕的。大多數的學生是成年的男女——有的竟有四十歲了。我現在還記得第一年的情形，我相信別人在別的地方，不會有和這班專志於學的三四百個成人男女接觸的機

會，每一小時都忙着讀書或工作，他們差不多個個有過社會上實際的接觸，自己早已知道教育的需要。許多年紀大的自然很難完全熟習書本，看他們努力奮鬥的情形，往往使人生憐；但是他們不易熟習書本的缺點，在格外努力上，得到了不少補救。他們之中有許多是和我一樣的窮，非但和書本奮鬥，還要和不容許他們有生活資料的貧困奮鬥。有的家中尚有年老的雙親要他們供養，有的有了妻子，須仗他們設法去維持生活。

每個人都有這個偉大的普遍的觀念，就是造就自己以提高家人的地位。似乎沒有一個人是專顧自己的。便是職員們和教員們，是多麼難得的人物呀！他們日日夜夜歲歲月月為學生而服務，似乎只在設法幫助學生才有快樂。日後能有人把這許多揚基教師，在戰爭之後，立刻從事於黑人教育的事一一寫下來——我希望其能如此——這段事實必將為我國歷史上最動人的一章。全南方的人現在雖還不能重視這種服務，但是重視的日子也不遠了。

第四章 幫助他人

我在哈姆普吞第一學年終了的時候，又遇到了一個難關。學校放假，學生們都回去了。我沒有錢可以回家，但我總得出去。那時學校只允許極少數的學生，在假期中住在校內。眼見別的同學有的準備行裝，有

的動身回家，不但使我極其難過，而且引起了我的思家病。回家去的錢當然沒有，便是到別的地方去也沒有錢。

可是我會想法子得到了一件多餘的舊大衣，照我看來，牠也還值錢。我便決定把牠出賣，以充旅費。孩子們驕矜的習氣我還很重，盡力設法瞞着別的同学，不使他們知道我是沒有錢，沒有地方去。我只給哈姆普吞城裏少數人知道我要賣外衣的意思，有一個黑人，經過了我不少的勸說，答應我到臥室內先來看一看大衣，再決定買不買。這大大地激起了我那已經沮喪的精神。次日早晨，我所期望的顧客果然來了。他把大衣仔細看過，才問我要賣幾個錢。我告訴他說，我想三元金洋總值得的。他似乎對於這個價錢是同意了，但是很鄭重其事地說：「我對你說，這樣罷：我把衣服拿去，先付你五分錢，給你現錢，其餘的等我一有錢便給你。」那時我的心境如何，也不難想像了。

這次失望一來，把假期內想離開哈姆普吞城的希望完全拋棄了。我只想找找工作，至少可賺一些錢，買幾件決不可少的衣服，和其他的必需品。不到幾天，所有的教員和學生，可說都離校回家了，這更使我的精神萎頓下去。

我在哈姆普吞城裏以及附近的地方，找了幾天工作，最後居然在孟祿 (Monroe) 戲臺的一個喫食店裏得了一個位置。可是工資實在微薄，除了我的購宿費外，所餘無幾。不過在晚上及兩餐之間，尚有許多

工夫可以自修和閱讀；這樣，我在暑假內進步了不少。

我在第一學年終離校時，尚欠學校十六元金洋，在校的工作還不能抵償這筆欠款，我在暑假中，抱着極大的決心，要盡量地節省，來償清這筆欠款。我覺得這是信用借款，非得償清，我是沒有面目回校的。我想盡節省的方法——衣服自己洗，沒有必需的，衣服也得過去——可是假期一滿，我仍積不到十六元金洋。

有一天，是我在喫食店裏最後的一星期，我在桌子底下發現一張鈔票，是一張十元的新鈔票。我情不自禁，高興起來。後來我想這店又不是我開的，我理當將錢交給主人。我便這樣做。主人見了高興得和我一樣，可是他冷冷地對我解說道，這店是他開的，所以他有沒收這錢的權利，他便拿了去。老實說，這對我又是個重大的打擊。我可並不因此灰心，我現在回顧一生，我立志想要成功的事，無論如何，從未灰心。我着手做一件事，總抱定要使他成功的意志。許多人一遇失敗，早已預備好了一番不能成功的大道理，作爲藉口，這種人我最不能容忍。那肯告訴我如何成功的，才是我所最敬仰的人。於是我便決心去應付那目前的狀況。到那星期終了的一天，我去見哈姆普吞學院的會計，馬沙爾（J. E. B. Marshall）將軍，坦白地將我的狀況告訴他。我真感激，他竟允許我重新入學，並且信任我，這欠款等我有錢時再還。在這第二學年內，我仍繼續做管屋的工作。

我在哈姆普吞在書本上所得的教育，比了我在那裏別方面所學習的，真是微乎其微。第二年中，使我

感受最深刻的一件事，乃是教師們利他的精神。怎麼一個人竟能專爲他人服務而引爲至樂，以明白。那學年終了之前，我想我才學到一個教訓：爲他人服務最力的便是最快樂的人。從此之後，我盡力試行這個教訓。

我在哈姆普吞和優種的家畜家禽接觸，又得到了一個寶貴的教訓。我想，凡沒有機會和禽畜接觸的學生，而能出而應世與最貧困的階級來往，安然自得的，恐怕絕無僅有罷。

我在第二學年所得到的最寶貴的事，恐怕要算明白聖經的用處和價值了。從美恩 (Mine) 州，波特蘭 (Portland) 城來的羅德 (Nathalie Lord) 小姐，她也是教師中的一位，教我如何利用聖經，愛護 聖經。從前，我對聖經是不大注意的，現在我知道如何愛讀聖經，不但爲了牠能給與我們靈性上的資助，也爲了他有文學的價值。我在這方面所受的教訓，在我的習慣上佔着極大的勢力。直到現在，我每在家中，無論怎樣忙碌，每日早晨我總得按例先讀一章或幾節聖經，而後開始一日的工作。

若說我略有一些演說的才能，這大半也是羅德小姐所賜給我的。她見我頗喜歡這一路，便私下把關於呼吸、抑揚和音節的門徑教導我。單單爲演說而學演說，可在羣衆前演說，是一絲也不會引起我的興趣的。實際上，我以爲天下沒有比空洞的公衆演說更無聊更無謂的了；我卻從小便抱定改善世界的宏願，使想學習演說，俾能向世界發揮這個意思。

哈姆普吞的辯論會在我是個快樂的泉源。開會是在每星期六晚上；我記得當我在哈姆普吞的全時期中，從未缺席過一次。我不但參加每星期的辯論會，而且極出力地另外組織了一個小會。我注意到在晚飯之後，夜課之前，約有二十分鐘的餘閒，青年人大都閒談閒談，消磨過去。我們約有二十個人就組織了一個會，利用這時間，作為辯論或練習公衆演說。再要比我們這樣利用二十分鐘的光陰，而能得到更大的快樂和利益的，恐怕不多罷。

到了我在哈姆普吞的第二學年終了時，母親和哥哥約翰幫助我寄我一些錢，再加上哈姆普吞的一位教師少許的資助，這次我得能回到西弗基尼亞毛爾頓城的家裏去度暑假了。我一回到家鄉，才知道鹽灶停工了，煤礦因礦工罷工而不發掘了。工人有了兩三個月工資的積蓄，似乎常會發生這種事情。在罷工之際，當然將所積蓄的統統用完，於是負了債，接受同樣的工資復工，否則便受了相當的損失，轉到別的礦裏去作工。無論復工或調換工廠，在我看來，礦工在罷工之後，其處境只有更壞些。據我所知，在我們一區裏的工人，在罷工之前，在銀行裏都有相當的存款，但是一到專以鼓動工潮為職業者得了勢時，即使最節儉的工人，也把積蓄耗廢起來了。

我的母親和其他家人見我回來，又見我離家兩年，得了不少的進步，自然高興非凡。便是各等的黑人，尤其是年老的，見了我回來，他們的快樂幾乎是感傷的。我一家家都去拜謁，每家都請我吃一餐飯，我每次

把我在哈姆普吞的經過都告訴他們。此外，我還得在禮拜堂裏，主日學校裏，以及許多別的地方，演說幾次。可是我急須要，找的工作卻找不到。爲了罷工，更沒有地方去找工作。我原想在假期內工作，賺些錢作爲回到哈姆普吞去的路費，再積蓄些作爲到校後的費用，但是第一個月幾乎過去了，還是白努力。

第一個月終了的時候，我跑到離家較遠的地方去找工作。可是又不成功，到我動身回家，天已夜了。一路走來，離家尚有一哩光景，我已極其疲乏，再也走不動了，我便進入一所破舊無人居住的屋子裏，預備過夜。不料早晨三時，哥哥約翰找到我睡在這屋子裏，便極溫柔地將悲哀的消息對我洩露了出來，說我們慈愛的母親已於昨夜歸天了。

這似乎是我一生最悲痛最失神的一刹那。母親幾年來，原是不大健康，但決想不到前一日離開她，便永不再見了。而且我素來切望着，萬一到了她死別的時候，我須親自送終。我在哈姆普吞的時候，有一個最大的志願，鼓勵我上進，那便是我想得到一個地位，可使母親得到安逸和快樂。她也常常希望能在生前看見她的兒女受了教育，服務社會。

母親死後不久，我們小小的家庭便混亂起來。我的妹妹阿曼達雖然盡其所能，究因年紀太輕，不能管理家務，後父又無力雇用管家的人。有時我們自己煮飯吃，有時便不煮。我記得我們往往只有一罐番茄，幾塊餅乾，便算一餐。衣服也沒有人照顧，家中的一切立即陷於混亂的狀況。在我看來，這是我一生最淒涼的

時期。

我在上面已說過的，我的好友勒夫納夫人，在這時期中，常常歡迎我到她家去，處處幫助我。假期將完的時候，她給我一些工作，我在離家較遠的煤礦裏也做些工，總算這樣賺了一些錢。

有一時，好像我不得不把回到哈姆普吞去的念頭打消，但是我的心堅決非常，不經過一番掙扎，我是決不肯放棄回校的念頭的。我急需幾件過冬的衣服，除了哥哥約翰代我得到的一些衣服外，其他只得失望了。金錢和衣服雖然不夠，但是回到哈姆普吞去的路費是有了，我還是非常快樂的。

我知道我一到那邊，仍可得到管屋的職司，只要自己努力，總可設法完畢學年。

哈姆普吞秋季開學之前三星期，我極驚喜地接到了我的好友女校長馬基小姐的信，要我在開學前兩星期到校，去幫助她收拾校舍，布置一切開學的事情。這是我求之不得的機會，藉此可在會計部掛一筆帳了。我便立刻動身到哈姆普吞去。

在這兩星期中，我得到了一個永不能忘的教訓。馬基小姐出身北方最舊最高貴的家庭，尙且在這兩星期中親自和我一同抹窗子，掃房間，布置臥牀，那一樣不做到。她以爲若不將每一窗框完全洗清，開學的布置不得算爲就緒，於是她親自洗滌，樂而不倦。我所敘述的她的這種工作，照我在哈姆普吞時所知，她年年如此做的。

這時我簡直不易明白，像她這樣有教育有地位的婦女，竟肯很快樂地幹這種工作，來幫助提高一個不幸的民族。從此之後，我對於不把勞工神聖的教訓灌輸學生的南方任何黑人學校，都不能容忍了。

我在哈姆普吞最後的一年內，每一分鐘的光陰，若不用在管屋的職務上，便專心致志地努力於學問。我決志盡可能的在我的一級中創造記錄，使我得以列入畢業演說者的榮譽錄中。這個決志居然成功了。一八七五年六月，我在哈姆普吞修完了正式的課程。我在哈姆普吞學院的生活上所得到的最大的利益，可以分爲兩項：

第一，是和一位大人物阿姆斯特隆將軍接觸，就我的意見說來，他是在我幸遇的人物中最難得，最堅強，最可愛的人物。

第二，我在哈姆普吞第一次知道教育對於個人所期望的是什麼。我未入哈姆普吞之前，我的見解是和流傳於我們的民族中的思想一樣，以爲得到了學問，便可享清福，不必再幹勞苦的工作了。到了哈姆普吞，我不但知道勞動並不是卑賤的，而且也知道喜歡勞動並不單爲幾個金錢而勞動，也爲勞動的本身而勞動，爲養成獨立自重的品性而勞動，養成了這種品性才可做一番社會所需要的事業。我在學院裏第一次體會到過利他生活的意義，我第一次知道最使他人有用有快樂的，便是最快樂的人。

當我畢業時，錢一個也沒有。我和哈姆普吞別的同学結了伴，在科內提卡特 (Connecticut) 州一個

夏令旅館內，得了個食堂侍者的地位，再借了些路費到了那邊。我進了旅館不久，自己便覺得毫無食堂侍者的經驗。可是侍者的頭目，以為我是一個老練的侍者。他叫我去侍候一張坐着四五個富麗的貴族的食桌。我很明顯地露出不知如何侍候他們的樣子，他們罵得很兇，兇得我嚇跑了，任憑他們坐着空桌，連食物都沒有。這樣一來，我從侍者的地位，便降為搬碟子的小使。

但是我決定要學會侍者的職務，後來過了幾個星期，我又恢復了原來的地位。我在那裏做侍者之後，曾有幾次到這旅館裏做客人，這使我非常滿意。

夏令一過旅館收歇，我便回到毛爾頓的老家，被選為那地黑人學校的教師。這是我一生最快樂時期的開始。現在我覺得有機會可以幫助本地的人民，提高他們的生活了。我一開始便覺得單靠書本上的教育，不能供應這裏青年們全部的需要。每日早晨八時開始工作，往往直到晚上十時才得完畢。日常功課以外，我又教學生們怎樣梳髮，怎樣洗手洗面，怎樣保持衣服的整潔，尤其注意到牙刷的用法和沐浴的習慣。我所教導的一切中，我仔細留意牙刷的影響，覺得沒有其他單獨的文明動作，比這更有勢力的。

這裏有許許多多年長的男女兒童，以及成年的男女，日裏不得不作工，但還想找一個受教育的機會，於是我便立即開了一個夜校。夜校和我日裏所教的學校差不多大，一開始，每夜擠滿了人。有幾個男女總有五十多歲了，他們努力的情形，簡直是怪可憐的。

日校和夜校的工作，還不能包括我全部所幹的事情。我還設立了一個小小的閱讀室和一個辯論會。在星期日我領兩個主日學校，一個在毛爾頓，是在下午領的，一個在離毛爾頓三哩的地方，是在早晨領的。此外，我又單獨教幾個青年，預備補習了，送他們到哈姆普吞學院去。我不要酬報，根本並不想起這一點，只要有人肯學習，我便樂意教導。我有機會可以幫助他人，已夠快樂了。然而公立學校微薄的薪水我是拿的。

當我在哈姆普吞讀書的時候，我的哥哥約翰盡力幫助我，自己一直在煤礦中作工，以維持一家的生計。他爲了幫助我，情願放棄了自己的教育。因此我極其願意幫助他補習起來，預備去進哈姆普吞，同時盡最節省金錢，以幫助他求學的費用。這兩個志願居然都成功了。我的哥哥在三年之內修完了哈姆普吞的學業，現在他在塔斯岐基充任工業監督的要職。當他從哈姆普吞回來以後，我們兩兄弟便共同努力，拿出所積蓄的錢，送義弟哲姆斯到哈姆普吞學院去求學，以至畢業。這個志願也達到了，他現在在塔斯岐基學院做郵務長。一八七七年是我在毛爾頓教書的第二年，我的工作第一年差不多。

我家住在毛爾頓的時候，正是「三K黨」(Ku Klux Klan) 氣燄萬丈的當兒。三K黨專以排斥黑人爲宗旨，尤其注重於阻止黑人參加政治活動。這和我在小時所常聽到的「巡邏團」相似。奴隸時代的巡邏團是白人——通常是青年白人——所組織的，以監視晚上奴隸的行動爲宗旨，例如一個奴隸若沒有通行證，便不得在鄰近的農場上來往；不得白人的許可，不得集會，即使得了允許，開會時至少須有一

個白人列席。

三K黨和巡邏團相彷彿，幾乎全夜活動着。所不同的是，他們比巡邏團更爲殘酷。他們主要的宗旨雖是壓制黑人的政治活動，但並不止此，甚至連學校教堂也給他們焚燒，許多無辜的人民也得受害。在這個時代，黑人中喪失生命的，着實不少。

那時我正是個血氣方剛的青年，這些不法的暴徒，在我的心上留下了極大的印象。有一次，我在毛爾頓見到黑人白人，公然鬪爭。雙方各有近乎一百人；雙方受重傷的也頗多，我的朋友勒夫納夫人的丈夫，疏伊斯·勒夫納將軍，也受了重傷。勒夫納將軍爲了想保護黑人，而被擊倒，他以後竟至不能完全恢復。我看着兩個民族的鬪爭，就覺得我們一族的人民在這個國家裏是沒有希望的。照我想來，「三K黨」時代是改造時代中最黑暗的一個階段。

我這樣敘述南方歷史中不幸的一個階段，是爲了要引起注意那「三K黨」以後的大改變。到了今日，南方已沒有這種組織了，而且兩個民族的人民，幾乎都忘了曾經有過這麼一會事。到了現在，南方的民意也不會容許這種組織的存在了。

第五章 改造時代

我以為從一八六七年到一八七八年可稱為改造時代。我在哈姆普吞做學生，以及在西弗基尼亞做教員的時期，都包括在內。在這全部的改造時代，有兩種觀念時常在黑人的心中鼓動着，至少大部分黑人的心中是如此的。一種是學習希臘文和拉丁文的狂熱，一種是做官的慾望。

一個歷代為奴的民族，素來過着極黑暗的未開化的生活，一旦受了教育，便要他們明瞭教育的真諦，這是一種奢望。在改造時代，南方各地的日校夜校都擠滿了老老少少形形色色的人，有的竟是六七十歲的老頭兒。這種求學的雄心真是值得讚美，極堪激勵他人的。可是大家都存着一種念頭，以為一經有了一些教育，莫名其妙地一來，便可免除世上大部分的苦難，無論如何，總可不做手工的勞役而能生活了。更有一種觀念，以為只要懂得一些希臘文和拉丁文，便可成爲最上等的人物，簡直可稱爲超人了。我記得我第一次見到一個略懂外國文的黑人，那時他給我一種印象，以為像他這樣的人，才足爲他人所羨慕的。

很自然地，我們一族裏受了一些教育的人大多數都做了教師或傳道先生。這兩種人物之中，自然有許多是有才幹的，熱心的，敬畏上帝的男女，但是大部分人卻把教書或傳道作爲解決生活的捷徑。有的簡直只能寫寫自己的名字，便也做教員了。我記得在我們的鄰近，也來了一個這一類的人，他來尋找可以給他教書的學校，當他講到關於地球的形狀，以及他將怎樣把這事去教學生時，問題便發生了。他發表對於這件事的意見說，他是什麼都會教的，不過總要看大多數主人的意見，要他教扁的，便教扁的，要他教圓的

便教團的。

傳教的職業弄得最糟了，——直到現在，雖然改良了不少，但還是糟得可憐——因為那些自稱爲「被召傳道」的人，不但愚昧無知，而且往往是行爲不端的。初得自由的時候，幾乎每個剛學讀書的黑人，讀書沒有幾天都要被神召去傳道。在西弗基尼亞我的家鄉裏，這被召的情形，說來很是有趣的。往往一個人好端端坐在教堂裏，忽然被召去了。這被召的人，事前並未得到警告，忽然跌在地上，好像被鎗彈擊中似的，仆在那裏好幾個鐘頭，一聲不響，一動不動。於是這消息閃動了四近，都知道某人是被召了。倘使他不願意接受這個神召，他會兩次三次地跌下來。到後來他總於順從了神的使喚。當我正努力追求學問的時候，老實說，青年的我也有幾分恐懼，單怕我剛能讀書寫字的時候，一旦被召了去；但是不知怎的，我終於沒有被召了去。

毫無知識的人也傳道了或勸化人了，再加上略受教育的人，所以一望而知，傳道的人數是太多了。在事實上，不久之前，我知道有一個教堂，一共只有二百個教友，其中倒有十八個是傳道先生。但我還要說一遍，在許多南方的教會中，傳道團的程度是進步了，我相信再過了二三十年，大部分的不肖分子必將被淘汰。我快樂地說，現在「被召傳道」的事情也不像從前那麼多，從事於實業的卻一天多似一天了。教師資格的提高，比之傳道先生的進步，更爲顯著。

在整個改造時代，我們全南方的黑人，一切都仰望著中央聯邦政府，正如一個孩子仰望他的母親一樣。這也不足為奇。因為給我們自由的是中央政府，兩百年來使全國得以富裕的，是黑人的勞工。我在少年時代，以及後來在中年時代，我老想着，中央政府不在我們初得自由的時候，除各州政府所能做的之外，再實施黑人的民衆教育，好好地來培植他們的公民資格，這不能不說是殘酷的錯誤。

雖則吹毛求疵，批評什麼什麼當辦而不辦，是容易的，或許卒因種種環境的關係，當時身負政事之責的，也只能如此做。但我現在回顧當時我們得到自由的全時代，不得不想，倘若當時能實行一種政策，以受有若干教育，或置有若干財產，或又受教育又有財產，作為參政權的標準，再規定辦法，使這種標準，不論對於白人黑人都忠忠實實公公平平地實施，豈不更為得計。

我在改造時代，雖則還是個青年，但我已覺得錯誤已經鑄成，覺得當時這種狀態，不能久長地因循下去。我覺得這改造政策，就我們一族而言，是大錯特錯的，矯揉操作的，勉強的。在我看來，有許多地方，白人利用了我們的愚昧，作為幫助他們執政的工具，北方的白人中又有一班人為要懲罰南方的白人，硬把黑人的地位抬得比南方的白人更高。這樣一來，吃虧的到底還是黑人。而且大家為了政治的騷動，都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不去造就自己以謀得近在目前的職業，以取得財產。

想進入政治生活的試探，是很有誘惑力，有一時，我也幾乎想進去了；後來一想，我還不如做些基本的

工作來提倡手工教育、智育和德育，更有幫助，於是不便入政途了。我見過黑人做了州郡的立法機關的大員及地方的官吏，往往不能讀書寫字，而且他們的道德和他們的教育一樣的薄弱。不久之前，當我在南方某城經過街道的時候，我聽到幾個泥水匠從他們正在工作的二層樓的屋頂上喊着：「州長，快再送些磚頭上來。」我好幾次聽到這樣的命令：「快些呀，州長！」「快些呀，州長！」我聽得好奇心動，便去問誰是「州長」，才知其中有一個黑人曾在他的本州，做過一時的副州長。

但我並不是說，凡是在改造時代做官吏的黑人，都是不配執政的。其中如最近逝世的布盧斯（Bruce）議員，平赤塔克（Pinchback）州長，以及許多其他的人都是道德高尚，正直無私的有用人物。我也並不說各種的人都是希圖僥倖的卑鄙之流。其中如佐基亞（Georgia）前總督部羅克（Bulllock）輩都是品格高尚的有用人物。

黑人們這樣的沒有學問，毫無政治經驗，居然執起政來，自然錯誤百出了，正和任何同等地位的民族，也會發生同等的情形一樣。許多南方的白人們都有一種念頭，以為若是現在再讓黑人施行政權至任何程度，那末改造時代的錯誤又將重演。我卻不以為然，因為今日的黑人已比三十五年前的黑人高尚得多，聰明得多，他在很迅速地學習着一種教訓，就是他的行動再不會使南方的白人不信任他。我越來越相信，要解決我們民族的政治問題，必先使各州修改參政的法律，務使參政的法律極端公正，援用起來，兩民族

間能一律平等，沒有口是心非的或可巧避的弊病。否則，據我在南方天天所觀察的面論，任何別的途徑，但對於黑人是不公道的，即對於白人也未必是公道的，而且對聯邦的各州都是不公道的，將來的結果，正如奴隸制度一樣，是一種罪惡，這種罪惡我們總會有付出代價的一日。

一八七八年秋季，我已在毛爾頓教了兩年書，已使我的兩個兄弟及其他幾個青年男女去入哈姆普吞學院，我便決定到華盛頓去讀幾個月書，我在那裏讀了八個月。我這樣繼續求學，又得了許多利益，並且和幾個道德高尚的男女接近。這裏的學生並沒有做工的訓練，我因此有機會，將一個沒有工作訓練的學校和一個注重工作訓練的學校，如哈姆普吞學院，兩者的影響作個比較。在這裏，我看到學生們大多是有錢的，衣冠楚楚的，服裝是最時式的，思想方面，也往往是很漂亮的。在哈姆普吞呢，照常例，學生的學費由學院方面負責去徵求個人代付，男女學生的膳費、書籍、衣服，以及宿費等由他們自己供給，例如完全工作，或一部分作工，一部分付現錢。在現在我繼續求學的學院裏，我知道大部分的學生連個人的零用也由他們的家長代他們支付。在哈姆普吞，學生是始終努力，作工自助的，這種努力於人格的建設，有着極大的價值。在別的學校裏，學生似乎缺少依靠自己的能力。他們似乎多注重外表。總之，在我看來，他們不像哈姆普吞的學生，從真實的堅固的基礎上做起。他們一旦離了學校，拉丁文和希臘文是多知道了一點，但是對於他們不能避免的家庭生活和狀況，卻少知道了一點。他們在舒服的環境中過了幾年，自然不能像哈姆普

吞的學生，願意到無福可享的南方的鄉村去爲我們的民族服務，他們寧可被誘爲旅館的侍者和臥車的役人，作爲他們的事業。

我在華盛頓讀書的時候，城中充滿了黑人，其中許多是新從南方來的。這些黑人大多數以爲到了華盛頓可以得到安逸的生活，於是都被吸了進來。有的已在政府裏得了一點小地位，大部分還在等着希望在聯邦政府裏得到地位。許多黑人——其中有幾個是極其高尚，光明磊落的——在那時爲衆議院的議員，還有一個布盧斯先生，則是參議院的議員。因此華盛頓在黑人看來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城市。而且他們知道同時在哥倫比亞（Columbia）有法律保護他們。那時在華盛頓爲黑人而設的公立學校也比別的地方好。我那時便極高興地乘機仔細研究這裏的黑人生活。我覺得其中有許多是務實的有價值的國民。但是也有許多人的生活只尙虛浮，使我大大地吃了驚。我看見青年黑人每星期賺不到四元錢，但在星期日乘着馬車在賓夕法尼亞（Pennsylvania）大街兜圈子，卻要化上二三元錢，大出風頭，使人家當他是

有千萬家私的。我又見別的青年，從政府裏每月得到七十五元或一百元的薪水，但是到了每個月月底總要負債。我也見到幾個人，僅僅幾個月以前，還是國會裏的辦事人員，忽然失業，就過着窮困的生活。有一批人以爲只要倚靠政府，便可如心像意地得到一切。這一類人自己毫無志向去創造地位，只希望聯邦政府的官員代他們去創造地位。我從那時起，以後一直多次地想着，最好能用一種魔術，把這一大批的人民移到

鄉村裏，一個個植在泥土上，植在堅固的永不欺騙的大自然的基礎上，那就好了。一切成功的國家，一切成功的民族，都是從這個基礎上出發的。——這個出發點起初或許迂緩艱苦，然而只有這個是腳踏實地的。

在華盛頓我見到許多女子，她們的母親代人家洗衣過活。在家裏時她們只受母親的教導，自然是粗劣的，教的是洗衣服的方法。後來，這些女子進了公立學校，或許讀了六年或八年的書。等到公立學校畢業了，他們便要身穿好衣，頭戴好帽，足著好鞋了。總之，她們的慾望增大，而她們賺錢的本領卻不能和慾望同樣地增高。她們六年或八年的書本教育，反使她們不願再幹母親的職業。這種使女子變壞的惡果，真是不勝枚舉。我常常想，假使我們以同樣的學力給與這班女子——我也贊成各種增進智力的課程，無論是語文、是算學，——但同時再教她們洗衣或其他類似職業的最新和最好的方法，豈不更好。

第六章 黑種和紅種

當我在華盛頓讀書的時候和再前一些時，西弗基尼亞州發生了轟動一時的遷都問題，要把本州的首邑從惠令（Wheeling）遷到別個中心地點去。結果，議院指定了三個城市，讓本州的人民投票決定一個永久的首邑。這三個城市之中，一個是查爾茲吞，離我家毛爾頓城只有五哩路。我在華盛頓學年終的時候，我大大驚喜地收到了一封查爾茲吞的白人委員會的請書，要我為那個城市的利益去遊說全州。我

接受了請書，費了幾乎三個月的工夫，到本州的各處演說。查爾茲吞城居然得了勝利，現在還是本州的首邑。

因這運動，我竟博得了演說家的令譽，以致許多人竭力慫恿我投身政治生活，但我拒絕了，我仍相信別種服務對於我的民族將有更永久的價值。就在那時，我深深地覺得我們的民族所最需要的，是要得到教育上工業上和財產上的基礎，努力建築這種基礎，自然比專想升官要緊得多。就我的個性而論，我如投身政治，似乎有相當的把握可以成功，但一想這種成功是利己的成功——是一種付着不能盡我責任爲大衆建築基礎的代價的私人成功。

在這個我們民族前進的時代，許許多多進着學校或大學的青年，都表白他們的決心，要預備做大律師或國會議員，也有許多婦女想做音樂教師；我卻抱着一種合理的堅決的觀念，卽在我的早年已這樣想，先下一番工夫，開一條給成功的律師，成功的國會議員，成功的音樂教師可走的大道。

我覺得那時的情形，頗像奴隸時代的一個年老黑人想學六絃琴。他一心想學六絃琴，便請一個青年主人教他，但這位青年不相信這樣年老的奴隸還有學六絃琴的能力，便想打斷他的興致，對他說：「哲克 (Take) 叔，我可以教你六絃琴，但是哲克，第一課我要三元錢的學費，第二課二元，第三課一元。最後一課只要二角五分好了。」

哲克叔回答說：「好的，先生，我依你這樣的條件。但是先生，請你先教我那最後的一課。」

我的遷都運動的工作完畢以後，便收到了一封請書，使我快樂非凡，同時也極其驚喜，這封信是阿姆斯特隆將軍寄來的，請我在下次行畢業典禮時，回到哈姆普吞去演說，算是「老同學的演說辭。」這是我夢想不到的榮幸。我盡力預備了一篇最好的演說，選定的題目爲「得勝的力量。」

爲了要去發表這篇演說，我回到哈姆普吞去時，所走的路是我在近乎六年前，第一次進哈姆普吞學院爲學生時所走過的——現在卻完全鋪了鐵軌了。現在我可以全路程坐着火車去。我常將這次的旅行和我第一次到哈姆普吞的跋涉相比。我覺得這五年工夫，居然使一個個人的生活和志向，起了變化，這是很難得的。我說這話，大概不致說我有利己主義的狂妄罷。

到了哈姆普吞，我受到了教師們和同學們熱烈的歡迎。我看到當我離開哈姆普吞的幾年中，母校對於我們民族的實際需要和現實狀況，一年接近一年；職業教育和學理教育都大有進步。母校的計劃並不摹仿當時的其他學校，但是一切的改革，在阿姆斯特隆將軍偉大的領導之下，完全以適應和幫助我們民族的目前需要爲目標。我常見人們在未開化的民族中，做着傳教的和教育的工作，犯着墨守百年前成法的弊病，或抄襲千哩外別的社會的辦法。不管目前的情形，不管急需的目標，只知把每個個人放入某一種的教育模型中。哈姆普吞學院卻不是這樣的。

我在行畢業禮那天講的演說，似乎使每個人都聽得很高興，我又聽到許多關於這篇演說的好評和鼓勵的言語。後來我回到西弗基尼亞的家中，想在那裏繼續教書，忽又收到阿姆斯特隆將軍的信，不覺又驚喜起來，他要我再回到哈姆普吞去，一半當教員，一半攻讀高深的功課。這是在一八七九年夏季。當初我在西弗基尼亞開始教書的時候，除了我上面已提及過的兩個兄弟之外，我又選了四個最聰明最有希望的學生，特別教導他們，心想送他們去投考哈姆普吞。後來他們居然都去了，教員們都說我所送去的學生，個個都預備得很好，就給他們升了班。這恐怕是他們叫我到哈姆普吞去做教員的原因。我所送去的青年之中，有一個便是現在波士頓（Boston）很著名的醫生，科特尼（Samuel E. Courtney）先生，他也是該城學校委員會的委員。

就在這時，阿姆斯特隆將軍創議要在哈姆普吞試教印第安人（Indians）。那時一般人都不相信 印第安人有受教育的能力，即使受了教育，也不相信有什麼益處。阿姆斯特隆將軍卻很熱心，他要大規模地有系統地試辦起來。他從西方各紅人區域內收來了一百多個野蠻的，大都是極其愚頑的印第安人，大多數是青年人。阿將軍要我做的特別工作，是去充當印第安青年的一種「家父」——就是叫我去和他們住在一起，照管他們的訓育、衣着、宿所等等。這裏差使很引動我的心，但是我已在西弗基尼亞專心着我的工作，有些怕放手。雖然如此，我終於忍心離去了。阿姆斯特隆將軍要我幹的任何服務，我怎敢拒絕呢。

我到了哈姆普吞，和約有七十五個印第安青年住在一起。在這所房子裏，只有我一個人不屬於他們一族的。起初我自己頗懷疑，恐怕不能勝任。我知道普通的印第安人自己以為在白人之上，那自然更在黑人之上了，其最大的原因，是爲了黑人曾降爲奴隸——這是印第安人決不肯做的事。當初在奴隸時代，在印第安人的區域裏，他們也曾蓄過大量的黑奴。這且不論，而一般人的意見，也都以為想在哈姆普吞教育和啓明紅種人，必是失敗的。這種種都使我加意小心，因我深深覺得這責任的重大。但我立志非成功不可。不多幾時，我完全得到了印第安人的信仰，不但如此，我簡直可擔保說，我已得到了他們的愛護和尊敬。我覺得他們和任何人類並無兩樣，總是以德報德，以怨報怨的。他們不息地設法想做些使我快樂和舒服的事情。照我看來，他們最不喜歡的是強逼他們剪去長髮，不准披裹毯子，停止吸烟；但是美洲的白人，總以為任何民族，若不穿白人的服裝，吃白人的食物，講白人的言語，信白人的宗教，是不能算爲完全開化的。

等到學習英文的困難除去了，則其他無論學手藝，無論研究高深的學問，我覺得黑色學生和紅色學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我又見到黑色學生極願盡力幫助紅色學生，這也是我的一種欣慰。雖然黑色學生也有以爲哈姆普吞不應招收印第安人，但這究竟是極少數。大多數的黑人，一請他們幫助，他們便高高興興地拉着印第安人去和他們同房住着，以便教他們說英語，教他們養成文明的習慣。

我常常想，若是本國的白人學校裏的白種學生，見了一百多個異族的學生進來，恐怕未必會像哈姆

普吞的黑種學生歡迎紅種學生那樣的友愛罷。我常想勸告白種學生幫助提高別人，便是提高自己，別的民族越是不幸，文化程度越是低劣，你能幫助他們，你便越提高了自己。

這使我想起從剛和達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先生的談話來了。有一次，達格拉斯先生在賓夕法尼亞州旅行，爲了他是黑人，雖然付了和別的旅客同樣的車費，卻不得不坐在行李車廂裏。當時有幾個白人旅客跑到行李車廂裏去安慰達格拉斯先生，有一個說：「達格拉斯先生，你這樣被人降低，我實在抱歉得很。」達格拉斯先生從他坐着的木箱上挺起身來，回答說：「他們不能降低腓特烈·達格拉斯，沒有人能夠降低我內心的靈魂。降低的不是我，而是這樣待遇我的人。」

我們國內有一部分地方，法律規定火車上的旅客中，黑人和白人須分別乘坐。有一次，我見到一個很可發笑的例子，這黑白的界限有時也不容易找出來。有一個人，在他的本地是出名的黑人，但是他的皮膚白得連專家也難以辨別他是黑人。這位黑人這次坐在派給黑人坐的車廂裏。查票員一見了他，便立刻顯出十分侷促的樣子。如果他是黑人，查票員自然不應把他送到白人的車廂裏去；如果他是白人，那末查票員要是問了他是否黑人，不是侮辱了他麼？那查票員仔細打量着，察看着他的頭髮、眼睛、鼻子和手，還是猶豫不決。最後，他要解決困難，便屈着身子去偷看那人的腳。我一見他注意那人的腳，便想：「這可解決了。」果然解決了，因爲查票員立刻決定這位旅客確是黑人，便讓他留在那裏。我很慶幸自己，我們的民族幸而

沒有失去一員。

我的經驗是這樣：要測驗某人是否真君子，只要看他對待弱小民族的人民的態度如何。一觀察南方白人對待他從前的奴隸和奴隸的後裔，便知道這是極好的例子。

我所說的意見，可用一個故事作例。據說有一次華盛頓總統在路上遇見一個黑人，那黑人極有禮貌地向他脫帽，華盛頓也脫帽還敬。有幾位白人朋友批評華盛頓不應如此。對於這個批評，華盛頓就回答說：「難道你想我肯容許一個可憐的愚笨的黑人比我更有禮貌麼？」

我在哈姆普吞教導印第安學生的時候，也有過一二次的經驗，顯示在美洲也有階級的怪事。有一次一個印第安學生患了病，我須負責帶他到華盛頓去，把他交給內務部，爲他領一張照會，以便送他回到西方的紅人區域去。那時我還不大知道人情世故。在駛往華盛頓去的輪船上，午膳鐘鳴了，我小心地等着不敢進去，直到大多數的旅客都喫完了，我才帶着那個印第安學生進入膳廳。那位管理員很客氣地告訴我，那個印第安人可以進來就食，而我卻不能。我真不明白，他怎能把皮色分得這樣清楚呢，因爲那個印第安學生的皮色和我差不多。然而這位管理員對於這件事似乎是個專家。我曾受哈姆普吞上級人員的指導，叫我到了華盛頓，帶着那個紅人去住某某旅館。可是我一到那個旅館，帳房便說，他很樂意招待印第安人，但他不能容納我。

後來我又遇到幾件事情，使我發生類似的感想。有一次，我在某處城裏，見到全城騷動和忿怒得極其厲害，似乎那時就要發生私刑的事情。這騷動的原因是爲了有一個黑皮膚的人，住在本城的旅館裏。一經調查，才知道這位黑皮膚的旅客，是個摩洛哥（Morocco）國的公民，他在美國旅行的時候，講的是英語。一知道他並不是美國的黑人，一切忿怒立刻便平靜下去。這位無辜的旅客，自己平白地做了騷動的起因，便知道以後還是不說英語爲妙。

我教導印第安人第一年的末了的時候，在哈姆普吞又來了一個機會，我回想一生，這個機會似乎是出乎天意，預備我後來在塔斯歧基做事的。阿姆斯特隆將軍見到許多黑種的青年男女，極迫切地要受教育，但是爲了太貧困，不但不能供給膳費的一部分，便是連買書的錢也沒有，因此無法進入哈姆普吞學院。他想了一個法子，開了一個和哈姆普吞有關係的夜校，限定學額，只收極有希望的青年男女，叫他們日間工作十小時，晚上讀書二小時。工資是有的，但只付給他們比膳費略多一些的錢。大部分的工資卻存在學校的會計處，預備他們在夜校裏讀完了一二年之後進日校時抵作膳費。這樣，他們也可開始得些書本知識，學些工商手藝，以及學校的其他遠大的利益。

阿姆斯特隆將軍叫我管理夜校，我自然遵命幹了。夜校初開時只有十二個強壯的熱心的男女進入初級。日間大部分的男生都在學校的鋸木廠裏工作，女生在洗衣作裏工作。這兩處的工作都不是輕易的，

但是我所教的學生之中，要像他們那樣給我十分滿意的，簡直沒有。他們都是好學生，對於他們的工作十分周到。他們讀書的時候極其勤奮，非到打睡鐘不歇，往往到了平常就睡的鐘點已過，還要求我再給他們繼續功課。

這班學生日間作苦工，既是這樣努力，晚上讀書又這樣誠懇，我便爲他們取個名字，叫做「勇敢班」——這個名字立刻全校皆知。

一個學生在夜校裏有了相當的學業，我便給他一張印就的證明書，內容大概如下：——

「哈姆普吞學院勇敢班學生哲姆斯·斯密斯 (James Smith) 功課頗好，特此證明。」

學生們極珍貴這種證明書，這種證明書也使夜校的名聲增大起來。不到幾個星期，夜校發展極速，居然有二十五個學生來上課。從那時起，我極關心這二十五個男女的進行，到了現在，他們幾乎在南方各地都擔任了重要而有用的職務。哈姆普吞夜校開辦時只有十二個學生，現在竟有三四百人了，可算是學院中有永久價值的極重要的設施之一了。

第七章 在塔斯岐基的初期

我在哈姆普吞夜校管理印第安人時，自己又在幾位教師指導之下，研究學問。教師之中有一位叫做

夫利塞(H. B. Friessell)博士，他是哈姆普吞學院的院長，也是阿姆斯特隆將軍的繼任者。

一八八一年五月，是我教夜校的第一年將完畢的時候，出我意料地來了一個開始我的終身事業的機會。有一天晚上，我在禮拜堂裏做好了禮拜，阿姆斯特隆將軍報告說，他接到了一封從阿拉巴馬朋友們寄來的信，要請他介紹一位教師，去管理該州塔斯岐基城黑人師範學校。他們自然知道能適合這個地位的黑人是找不到的，所以他們希望阿將軍薦一個白人去。第二天，阿將軍差人叫我到他的事務所去見他。他問我能否去就阿拉巴馬這個職位，我告訴他，我願意嘗試，於是他寫了一封回信說，他想不出適當的白人，倘使他們願意請一個黑人，他倒有一個可以保薦。在這信裏，他把我的名字告訴了他們。

過了好幾天，一無動靜。又過了幾天，正是禮拜日的晚上，做夜禮拜的時候，進來了一個信差，交給將軍一個電報。夜禮拜完了，他就向全體學生朗讀電報，其內容如下：「濮各爾·華盛頓適合。請他速來。」

學生們和教師們聽到這個消息，大為歡悅，熱烈地向我道賀。我立刻預備動身到塔斯岐基去。路過西弗基尼亞老家，逗遛了幾日，然後一直到了塔斯岐基。塔斯岐基在所謂南方的「黑帶」中，是個約有二千居民的市鎮，其中幾乎一半是黑人。塔斯岐基所屬的那一郡裏，黑人比白人更多，約佔三分之二，在鄰近的諸郡中比例更大，幾乎六個黑人中只有一個白人。

常有人叫我解說「黑帶」的意義。就我所知，最初是用這個名詞指那地的土色的。這裏的泥土厚而

黑天然肥沃，又是用黑奴最有利的南方的一部分，因此，把大量的黑奴都遷了過去。後來，尤其是南北戰爭之後，這名詞似乎完全作為政治上的意義了——指黑人多於白人的地帶。

我未到塔斯岐基之前，總想望那邊有一所房子，以及開始教書的一切應用設備。但是使我大大失望，這類東西竟一無所有。不過卻有着值錢的房子精美的設備所不能供給的東西——幾百個如飢如渴要求着知識的誠懇的靈魂。

塔斯岐基似乎是設立該校的理想地點，因為牠位於黑人密集區域的中心鬧中取靜，離鐵路幹線五哩，有一條短的支線接着。在奴隸時代和以後幾年中，這裏一向是白人教育的中心。還有一種額外的便利，因為我見到這裏白人的文化和教育程度，比之許多本地人，並不見得高了多少。黑人雖然愚昧，卻並不像大城裏的下等階級，通常都因種種罪惡而墮落，而敗壞身體。就大概而論，在這裏，兩個民族間的關係極其和協。例如，當時最大的，我想也是那地獨一無二的五金店，便是黑人和白人合夥辦的。這個合夥營業一向繼續着，直到白人股東死了為止。

我未到塔斯岐基一年以前，已有一班黑人聽到哈姆普魯所辦的教育工作，便派了代表向州議會要求撥一些公款，作為在塔斯岐基開辦師範學校之用。州議會答應了這個要求，每年撥款二千元。然而我立即知道，這一筆款子只可支付教員的薪水。其他買地皮、造校舍、辦校具等費，卻無着落。所以我的目前的工

作，並不怎樣樂觀。這似乎頗像叫人燒磚頭，卻不給他們燒磚頭的柴。黑人們簡直樂不可支，情願在各方面時時出力，來幫助開辦這個學校。

我的第一件工作是去找一個開學校的地點。仔細察看整個市鎮之後，覺得最適宜而又可辦得到的地方，是一所附近黑人監理會教堂的已將傾圮的小屋，還可以利用教堂作為集會的大廳。這教堂和小屋都是敗壞不堪。我記得在最初的幾個月中，我在這所修理不全的陋室中教書，每逢下雨的時候，便有一個老學生很難得地放了功課，代我撐傘，使我可以上課。我也記得有幾次我在吃早飯的時候，房東太太代我撐傘。

我到阿拉巴馬的時候，正是黑人們很關切政治的時候，他們極巴望我對於政治，處處都能和他們一致。在這方面，他們對於新來的人似乎有些懷疑。我記得有一個人，大概受了別人的指使，專門監視我的政治的態度，他好幾次跑來極熱烈地對我說：「我們希望你和我們一樣的投票。」他又說：「我們留意白人，一直留意到知道他將如何投票，那末，我們便投反對票，這樣，我們便不致錯誤。」

然而我很快樂地說，現在卻不同了，專因對方是白人而投反對票的事情，大致不會發現了，黑人也知道根據宗旨投票，投票者也顧到兩個民族的最大利益了。

我已說過，我到塔斯岐基是在一八八一年六月。第一個月專為尋找學校的設備，周遊阿拉巴馬全地，

觀察人民的實際生活，尤其在鄉村方面，以及在一班我希望他們入學的人民中，替學校宣傳。我周遊全地的時候，大都走着鄉間的小路，乘着一隻騾子和一部兩輪車，或一隻騾子和一部輕便的四輪車。我在他們的小木屋中，和他們同食同宿。我觀察他們的田園、學校、教堂。我每到一處，事前並不知道，他們也不知道有人來參觀，這是一種便利，可以看到人民的真實的日常生活。

我見到在農場上通常全家的人都睡在一間房中，而且有時除本家之外，還有親戚或非親戚也都睡在同一房中。我往往走到屋外，等他們預備牀鋪，或者等到他們都睡了，才進去睡。他們常爲我設法布置睡處，或在地上，或在別人的牀上再搭一些。任何小木屋中，都沒有洗面洗手的地方，通常洗面洗手的設備是在屋外的場地上。

他們通常吃的是肥豬肉和玉蜀黍做的麵包。有時我在小木屋用膳，他們只有玉蜀黍做的麵包和在清水裏煮的「黑眼豌豆」。他們似乎沒有別的思想，只知道吃着肥豬肉和玉蜀黍麵包——肉和麵包都從市鎮上食物鋪裏高價買來，卻不知道小木屋的四周很容易地可以種植國內別的地方所出產的各種蔬菜。可是他們惟一的目的，是種棉花；往往連小木屋的門前也種着棉花。

在這些小木屋中，我也常見到有幾家竟有價值六十元之譜的縫紉機，這是出現錢買來的，或分期付款買來的。有幾家買了華麗的自鳴鐘，其價錢大約是十二元或十四元。我記得有一次我到這樣的人家去

吃飯，我和他們家中的四個人一同就食，我見到同桌五個人卻只有一個食叉。自然我只得很侷促地等着。可是在這間小木屋的對角，卻放着一座風琴，他們說爲這座風琴要付六十元錢，是按月付費的。一個食叉，六十元錢的一座風琴！

縫紉機大都是不用的，自鳴鐘也毫無價值，因爲他們並不守時——即使有人守時，十家之中倒有九家說不出這鐘針指的是什麼時刻——風琴自然更少用了，因爲他們之中並沒有能彈琴的人。

我上面所說的這一家，爲了尊敬我這位客人，所以大家都坐在一桌，我很看得出這是不自然的非常吃法。通常卻不然，例如早晨全家起來，主婦便把一塊肉放在煎鍋裏，把一團麵粉放在他們所稱的「長柄鍋」裏，再把這兩隻鍋子放在火上，大約過了十分鐘或十五分鐘，早餐便算預備好了。丈夫呢往往手中拿着麵包和肉到田裏去，一面吃一面走。母親總是坐在屋角裏吃早餐，或許直接拿着長柄鍋或煎鍋撈着吃。孩子們則一邊吃着他們的分兒，一邊在門外的場上跑着。一年之中有時候肉食稀少，那末年輕的或身弱而不能到田裏去作工的孩子們，便難得有吃肉的福分了。

早餐一過，家中簡直沒有人照顧，照例全家都到棉花田裏去。小孩子拿得起鋤頭便要去做工，嬰孩呢——通常至少有一個嬰孩——便放在棉花田的畦頭，母親鋤完了一畦棉花，可以去照顧一下。中飯和夜飯的吃法，也和早飯差不多。

一星期之中，除星期六和星期日以外，全家都過着這種刻板的生活。到了星期六，全家的人至少有半日，往往是全日，在市鎮裏過着。我想他們到市鎮去的目的，是去買些東西，但是他們這幾個錢所要買的東西，只須一個人十分鐘便夠了。可是他們卻要全家到市鎮上費去整天的光陰，大半的時間，都在街上立立，婦女們則老是隨地坐着，吸吸煙，或聞聞鼻烟。到了星期日，常去大聚會。除少數的例外，我覺得我所走過的地方，人民的收穫物早已抵押了，大部分的黑人農夫都是負債的。州政府不能在鄉村建造校舍，照例，學校都是開在教堂裏或小木屋裏的。我在旅行的時候，好幾次見到那作為校舍的屋中，在冬天沒有禦寒的設備，往往在門外的場上生一些火，教師和學生們便因一冷一熱而跑進跑出。除了少數是例外的，我看見這些鄉村教師的程度，壞得不堪，道德墮落，實在不配充為人師。學校只開一季，大約三個月至五個月。教室裏簡直毫無應用的設備，要是有的，往往只是一塊粗劣的黑板。我記得有一次到了一個學校——一間破舊的小木屋充做的校舍——看見五個學生讀着一本書。兩個在前排，他們中間攤着一本書，兩個在後排，從前排二人的肩縫裏瞟着，第五個人在第三排，要從四個人的肩縫裏去看書。

我所說的校舍的情形和教師的品性的話，也可一絲不差地應用到教堂的情形和教士的品性。

我在旅行的時候，遇到幾個很有趣的人。我現在只說一個鄉人，可見他們的知識一斑。我記得我問過一個大約六十歲的黑人，請他告訴我他的經歷。他說他生在弗基尼亞，在一八四五年被賣到阿拉巴馬。

我問他同時有幾個人被賣。他說：「我們一共五個；一個是我，一個是兄弟，三隻是騾子。」

我這樣敘述我在塔斯歧基鄉村裏的一個月旅行，希望讀者不要忘記，除我所敘述的情形之外，還有許多令人興奮的特殊情形呢。我所以坦白地敘述，大半是爲了以後我要叫人注意在社會中使人可以興奮的改革。這些改革自然不僅靠塔斯歧基學院，其他機關也是要共同進行的。

第八章 授課於馬房雞棚中

老實說我的一個月的旅行和觀察，使我極爲苦悶。要提高這些人民，似乎是辦不到的工作。我只是一個人，我個人微薄的努力，即使有些成就，而離要想達到的目標不知還差多遠呢。一來我還不知能否成功，二來我還不知有否嘗試的價值。

我費了一個月的工夫，觀察黑人的實際生活之後，有一件事使我很堅決地相信，便是要提高他們的生活，決非單單模仿當時新英倫（New England）的教育，便可了事，我愈覺得阿姆斯特隆將軍在哈姆普吞所創辦的制度的識見遠大。倘使單把那些我在一個月中所見的孩子招了來，每天給他們幾小時的書本教育，我覺得那是枉費光陰罷了。

我和塔斯歧基的公民商議之後，便決定一八八一年七月四日爲開學之日，一間小屋和教堂，便是所

能得到的學校設備。白人和黑人對於開辦新校的事，一樣地大為興奮，極熱烈地討論着，等着開學的日子。可是也有不少鄰近塔斯歧基的白人，對於這個計劃表示不贊成。他們懷疑這於黑人有什麼價值呢，恐怕開辦學校的結果反要引起兩個民族的糾紛。有的甚至怕黑人受了教育越高，勢必使黑人對於本州的經濟價值越會減低。他們怕黑人受了教育，便要離開農場，再要他們在家庭內服役，恐怕難得辦到。

這些以開辦新校為失計的白人，在他們的心目中以為受了教育的黑人一定是這樣的：頭戴高帽，鼻架洋金眼鏡，手拿時髦的手杖，帶着羊皮手套，足著華麗的皮靴，那一樣不打扮到——總之，他一定是以知識為生的人。這些人那裏見得到教育可造就另一種的黑人呢。

在這小小的學校開辦之初，在這種種困難之中，以及以後十九年的經營中，在許多我常依為指導和顧問的塔斯歧基學校的朋友之中，有兩個人最出力，我們事業的成功，大半都靠着他們的力量。我和他們商量任何事情，是決不會使我失望的。我單提這兩位，不過舉個例罷了。一個是白人，從前也蓄過奴隸的卡姆培爾 (George W. Campbell) 先生；一個是黑人，從前做過奴隸的阿丹斯 (Lewis Adams) 先生。寫信給阿姆斯特隆將軍要請一個教員的，就是他們。

卡姆培爾先生是一位商人，也是銀行家，關於教育的事情，毫無經驗；阿丹斯先生是一位技師，在奴隸時代會學過鞋匠、馬具匠、鉛匠。他一生從未進過學校，但在為奴時也學習過讀書寫字，他們二人一開始便

明瞭我的教育計劃，極表同情，盡力幫助我。在學校的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卡姆培爾先生從未表示他不願盡他力之所及來幫助學校。我真不明白，這兩個人，一個是蓄過奴隸的，一個是做過奴隸的，他們的指導和判斷，我竟會樂意遵行，而且我覺得與其說遵行他們二人的指導和判斷，不如說遵行凡關於塔斯岐基學校的生命和發展的一切事情。

我常覺得阿丹斯先生的非常的智力，大部分是從奴隸時代學習那三種手藝而得來的。即在今日，倘使你跑到南方的市鎮裏，去尋一個在社會上可作領袖的最可靠的黑人，我相信十個之中倒有五個會指給你一個在奴隸時代學習過手藝的黑人。

開學的早晨，有三十個學生報到。我是惟一的教員。學生之中男女各佔一半。他們大多數是住在馬康（Macon）郡的塔斯岐基是在馬康郡，也是全郡首邑的所在地。還有許多學生要想進來，但經議決先收十五歲以上已受過教育的學生。這三十個學生之中，一大半是公立學校的教師，有幾個將近四十歲了。有的教師帶了他們從前的學生一同入學，一經考試，說來可笑，有幾個學生卻編入比他們的教師更高的年級。尤可笑的，有幾個以為讀過了好幾本大而厚的書籍，有幾個以為知道了名目高深的科目。他們以為書本越大，科目的名稱越長，他們的造就便越可誇傲。有的讀過拉丁文，有一二個讀過希臘文。他們以為這使他們享得了特殊的地位。

其實，我在一個月的旅行中所見到最可憐的一件事，是一個青年，他曾進過高級學校，坐在單房的小木屋中，衣服油膩，周圍污濁，門外的場上以及田園中都是蔓草，他卻只知學習一本法文文法。

初進來的學生似乎很喜歡死記文法和算學中冗長複雜的規則，卻一些沒有思想，一些沒有知識，將這些規則應用到他們日常的生活上。有一個科目是他們最愛講的，而且對我說他們已很熟練了，是算學中的「銀行算法和折扣算法」，但是我立刻就見到他們甚至他們的鄰居，從沒有一個人和銀行有過往來。在報名登記的時候，我見到幾乎每個人的姓名之間，都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字母。例如我問約翰·J·瓊斯 (Jones) 中間的「J」字是什麼意思，他便會說這是他的「銜頭」的一部分。大半的學生求學的目的，是想去教書的時候，多賺些錢。

雖然我在各方面說了這許多話，但是要像這些學生那樣熱烈那樣願意的青年，卻沒有見到過。他們一知道那種是對的，便願意向對的方面學習上去。即在書本方面我也決定要為他們先打定堅固的完美的根基。我立即看出他們以為研究過的名目高深的科目，只知道一些皮毛而已。他們雖然也能在地球儀上指出撒哈拉 (Sahara) 沙漠或中國的首都在什麼地方，可是女學生卻不能指出刀叉應該放在餐桌的那一個適當的部分，也不知道麵包和肉應該放在什麼地方。

我得鼓着極大的勇氣，招一個研究立方根和「銀行算法及折扣算法」的學生，對他說，最好先去讀

熟乘法表。

學生的人數每星期都有增加，到了一個月終了，幾乎有了五十個學生。可是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說，因為他們入學只能讀兩三個月的書，便得離校，所以最好請把他們編入高年級，倘使辦得到，最好第一年便給他們一張文憑。

最初的六個星期以後，我們學校裏來了一位新的難得的同事，得維德松 (Olivia A. Davidson) 小姐，她後來做了我的妻子。得維德松小姐生在俄海俄州，在那裏的公立學校裏受了初級教育。她還在做小姑娘的時候，便聽到南方需要教師人才。她到了密士失必 (Mississippi) 州，開始在那邊教書。後來她又到孟斐斯 (Memphis) 城教書。當她在密士失必教書的時候，有一個學生患天花。當地的人都嚇得不得了，沒有人肯看護這個病孩。得維德松小姐卻先把學校停了課，自己日日夜夜在病孩的牀邊陪着，直到孩子病愈。在假期的時候，她回到俄海俄家裏，那時田納西 (Tennessee) 州的孟斐斯城發生了最危險的黃熱病，恐怕是南方從未有過的疫病。她一聽到，便立刻打電報給孟斐斯市長，自願服務，為黃熱病的看護，雖則她自己並未患過此病。

得維德松小姐在南方的經驗，指示她人民所需要的不單是書本教育，她也聽到哈姆普吞的教育制度，便決定這便是她所要的教育，正可藉以預備她自己，到南方去做更有益的工作。她的難得的才能，引起

了波士頓城黑門章 (Mary Hemmaway) 夫人的注意。多承黑門章夫人的好意和慷慨，得維德松小姐在哈姆普吞畢業以後，得能有機會在夫藍明哈姆 (Franklinham) 的馬薩諸塞州立師範學校讀完兩年的師範學程。

得維德松小姐未到夫藍明哈姆去之前，有人向她提議，她的皮色既是這樣淡白，那末在馬薩諸塞學校裏，她可不說是黑人，可以得到不少的方便。她立刻回答說，無論如何，她決不願冒充民族來欺騙人。

在夫藍明哈姆學校畢業以後，得維德松小姐就到了塔斯岐基，她一來校，便帶來了不少關於教授法上有價值的新鮮的思想，以及不可多得之道德品性，和不自私自利的行爲；這種道德和行爲，我以為是難以匹敵的。得維德松小姐服務塔斯岐基學校，使牠得能穩定基礎，進行有效的工作，比任何個人都更努力。

得維德松小姐和我一開始便討論學校的將來問題。學生們學習書本是有進步了，知識也發展了；但是我們立刻便知道，我們若要使這些到我們這裏來求學的人，得有永久的印象，則我們除教授書本之外，還當注意其他事宜。這些學生住在家裏沒有機會，享受教他們照顧身體的家庭教育。除少數的例外，學生們在塔斯岐基所寄宿的家庭，比他們本鄉的家庭並不進步多少。我們得教他們如何沐浴，如何當心牙齒和衣服，我們得教他們應當吃什麼，應當如何吃法，應當如何整理房間。此外，我們還得教他們某種職業的實用常識，以及勤奮、節儉、經濟的精神，使他們離校以後能知道如何生活。我們得教他們不單學習書本，還

要研究實際生活。

我們覺得學生們大都來自鄉間，直接地或間接地都靠農業爲生。沿墨西哥灣諸州的黑人，百分之八十五都靠農業爲生。既然如此，我們得格外小心，不可把農務看爲太苦，以致學生們受了教育，便離開鄉村跑到城市裏，去受以知識爲生的誘惑。我們要給他們一種教育，使大多數的學生可當教員，同時能回到農場區域，指導那邊的人民，做新的努力新的思想應用到農業上，應用到道德的宗教的生活上。

這種種觀念和需要，很嚴重地匯集在我們的身上，我們真覺得有力不勝任之感。叫我們怎麼辦呢？我們只有一間破舊的小屋和一所廢棄的教堂作爲教室，還是塔斯岐基市鎮上的好黑人，樂意租給我們的。學生的人數日日增加。我們越見人數多，越在鄉間視察，越覺得我們的努力只是小部分地達到人民的實際需要，我們要教導一批學生，作爲媒介，出去可作領袖，來提高這些人民的生活。

我們越和本州各地來的學生談話，越看出他們大多數求學的主要目的，是想受了教育不必再做勞苦的工作。

我可舉一個阿拉巴馬的黑人的故事做個例。他在七月中炎熱的一天，正在棉花田裏作工的時候，忽然停了工作，望天喊道：「啊，上帝呀！棉花田裏的草這麼多，工作這麼苦，太陽這麼熱，我想我這個黑人還是去傳教罷！」

約在開學三個月後，我們的工作正在緊張的時候，恰巧有一所農場標價出賣，是一所約離塔斯歧基一哩路的廢棄的農場，其中在奴隸時代主人住的所謂大房子已遭焚燒。我們仔細看了以後，覺得要使我們的工作有效力有永久性，這便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塊地。

但是怎能買得到呢？所標的地價確是很便宜——只要五百元——但是我們沒有錢，而且我們是初到這裏的生客，又不能欠借。地主答應我們先付二百五十元，我們便可用那塊地。其餘二百五十元准在一年以內付清，這塊地只賣五百元雖然是便宜的，但是在沒有錢的人看來，還是一筆巨款。

在這困難之中，我鼓着極大的勇氣寫信給我的朋友，哈姆普吞學院的會計馬沙爾將軍，將這情形告訴他，由我個人負責向他借二百五十元。不到幾天，回信來了，他說他無權出借哈姆普吞學院的錢，但他願意個人借給我所需要的數目。

老實說，這樣來借到金錢，對於我是極大的驚奇，也是快樂的根源。直到那時，我從未有過一次一百元之多的錢經過手。這次向馬沙爾將軍借到的款子，在我是一筆巨款了。這樣大的巨款，要我個人負責償還，真是極重的擔子。

我立即預備把學校搬到新址裏去。我們所用的地方本來有一間從前作為廚房的小木屋，一間馬房，

一間關雞的小屋。不到幾個星期，我們把這些建築物都利用了。馬房修改為教室，雞房也改作同樣的用處。我記得有一天，我對一個住在鄰近的有時也幫助我的老黑人說，我們的學校擴充了，我們須得利用雞房作為教室，我要他幫忙。明天請他把雞房灑掃清潔，他極熱心地回答說：「先生，這是什麼意思？你要在日裏掃清雞房麼？」

搬新校舍的全部工作，幾乎都是學生們在下午放學以後做的。我一等到小木屋可以將就應用的時候，便決定墾闢場地，預備種些農產物。我將這個計劃講給青年們聽，他們似乎不大願意。他們不明瞭墾地和教育的什麼關係。而且他們之中有許多是當過教員的，他們甚至詢問墾地於他們的尊嚴有無妨礙。我為要解決這種偏促不安的態度，便於每日下午放學以後，我自己拿起斧頭領路到林中去作工。他們一見我不怕作工，也不以作工為可恥，便大家更其熱心地幫起忙來。我們每日下午，不斷地作工，直到我們墾闢了約有二十英畝的場地，種下了一些農產物。

同時得維德松小姐正在籌劃償還欠款的辦法。她先致力於開宴會或聚餐。她親自到塔斯岐基的白人和黑人的家庭中去遊說，請他們贊助，送一些蛋糕、雞肉、麵包或餡餅，可以在會場裏拍賣。黑人們自然很樂意地捐助他們所能省下來，便是白人，照我所記得的，沒有一家，經了得維德松小姐的請求，而不捐贈一些東西的；白人的家庭處處顯示他們對於學校的同情。

這種宴會開了好幾次，總算捐到不少的錢。後來又在黑人和白人中間募捐，請他們直接捐助現金，數目不在乎大。年老的黑人中，大都把他們的青春都在奴隸制度下消磨了，他們的禮物，看來真是可憐。有時他們捐助五分錢，有時二角五分錢。有時捐一條棉被，或一捆甘蔗。我記得有一個年老的黑婦人，年約七十歲，她在我爲付場地的欠款而募捐的時候，到我的地方來見我。她倚着拐杖，一跛一跛地到了我的辦事室。她穿着破衣，但還保持清潔。她說：「華盛頓先生，上帝知道，我的青春是在奴隸制度下消磨了。上帝知道我是愚笨的，貧困的，但是」她繼續說：「我知道你和得維德松小姐所做的是什麼。我知道你們要把黑人的民族造成更好的男人和女人，我是沒有錢的，但我希望你接受這六個蛋，這是我所積蓄的，我希望你把這六個蛋用在這些青年男女的教育上。」

從我在塔斯歧基開始辦事以來，也收到了不少增進學校福利的禮物。但我想來，從未有像這一次感動得深。

第九章 焦急的晝間和失眠的夜間

我們住在阿拉巴馬的第一年耶穌聖誕的來到，使我們有更深地觀察民衆實際生活的機會。第一件提醒我們聖誕節已到的，是前一日數十個兒童來敲我們的門，要求「聖誕禮物！聖誕禮物！」從早晨二時

至五時，照我想來，這樣來要求的總有半百人。這種風俗直到今日還在南方我們這一部分地方通行着。在奴隸時代，全南方各州都有一種風俗，每到聖誕節的時候，黑奴有一星期的聖誕假，甚至只要聖誕祝火不熄，假期還可繼續下去。我們族裏的男子都想乘此一醉，女子也往往如此。我們看到塔斯岐基和附近的黑人，一到聖誕節前一天便停了工，從停工起直到新年，在這全星期中任何人都不肯做任何工作。往常不醉酒的人，一到聖誕節的一星期，也以爲自由地狂飲一番是合理的。處處都是狂樂，而鎗、手鎗、火藥也得自由戲弄。聖誕節的神聖意義幾乎完全失去了。

我在這第一年的聖誕節，離開本地，跑了一些路，到一個大農場裏去參觀，他們又窮又愚，看來真是可憐，也想在這個全國奉爲神聖視爲可貴的節期中，娛樂一番。有一所小木屋裏，我見到有五個兒童，只有一卷爆竹，大家分放，算是紀念耶穌的降生。又有一所小木屋裏至少有六個人，前一日到店裏買了只值一角的薑餅，便算過了節。又有一家只有一些甘蔗。又有一家我找不到別的東西，只有一瓶不值錢的下等威士忌酒，夫妻倆狂飲了一下，雖則這位丈夫還是當地的傳教士，有的甚至拿着幾張彩色的廣告片，也盡量地利用起來。有的買了一枝手鎗。總之，他們大多數除不到田裏去作工，只在家裏懶散懶散外，在小木屋裏一些也看不出紀念救主降生的樣子。在聖誕節的一星期內，農場上有幾家常在晚上開着一種所謂「同樂會」。會裏舉行粗魯的跳舞，飲着大量的威士忌酒，有時或許發生鎗擊或用剃刀斬割等事情。

在這次聖誕節訪謁的時候，我遇到了一位年老的黑人，他是無數的當地的傳道人之一，他想拿亞當（Adam）在埃甸園（Garden of Eden）中的事來說服我；他以為上帝既咒詛勞工，故任何人作了工，便是犯罪。因此他總盡可能地少作工。在聖誕節中，他非常的快樂，因為這一星期他過着不犯罪的生活。

在學校裏，我們格外努力教導學生明瞭聖誕節的意義，教他們應當怎樣遵守這個節期。這一點我們有了相當的成功，我敢說，到了現在，不但鄰近的人懂得聖誕節的新意義，便是其他我們的畢業生所到的地方，也多少懂得些。

到了現在，在塔斯岐基每遇聖誕節和感恩節最使人滿意的表示，是我們的畢業生和學生們能不自私利地良好地遵守節期，他們利用節期使他人，尤其是不幸的人們，得到安慰，得到快樂。不久之前，有幾個我們的青年費了一天假日的工夫，去為一個七十五歲，無依靠的老黑婦，改造一所小木屋。我記得又有一次我在晚上，在禮拜堂裏報告，有一個很可憐的學生因為沒有大衣而受冷。第二天便有兩件大衣送到我的辦事室裏，叫我轉送。

我上面已說到在塔斯岐基和附近的白人，怎樣幫助學校。我一開始便想把學校作為當地社會的真實的一分子。我決定不使人家看我們的學校是一種忽然從天上掉下來，落在民間的外國機關，他們對於牠既無所謂責任，也無所謂關係。我覺得這次請他們捐錢買校地的事，已使他們大大的明白這學校是他

們的學校。我也注意到，我們若能使白人知道這學校是社會生命的一部分，又能和他們多有來往，例如我們要在波士頓結交朋友，也要在塔斯歧基結交白人朋友，我們要使這個學校對於一切的人民，都有真實的服務，我們越能如此，那末他們對於學校的態度也越會良好。我在這裏不妨略說幾句，我以後還想詳述的話，就我所知，現在塔斯歧基學校得到了塔斯歧基，全阿拉巴馬，以及全南方的白人的同情，再要比他們更熱心更誠懇的朋友，別的地方恐怕是沒有的了。我一開始便勸告我們南方的黑人，要和他們的鄰居，不論是黑人或白人，結為朋友，處處地方須要直率，須要大方。我也勸告他們，只要不危害着主義，無論關於當地的事宜或投票，須共同商議。

募捐償還地款的工作，繼續了幾個月。到了三個月終了，我們已有錢償還馬沙爾將軍二百五十元的欠款了，又在兩個月中，得到了全數的五百元，和一百英畝的地契。這真使我們大為欣慰。我們不但爲了得到一所永久的校址而欣慰，我們知道這筆付欠款的錢，大多數是塔斯歧基的白人和黑人所捐助的，這豈不使我們更爲欣慰。這筆錢大部分是靠開宴會和音樂會而捐到的，也有一部分是個人零星捐助的。

我們第二步的工作是努力於開墾土地，使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出產，同時也可使學生們有農事的訓練。一切在塔斯歧基所辦的事業，都是隨自然的合理的程序，適應當地的需要而着手的。這次我們從農事着手，因爲我們需要喫的東西。

學生之中有許多因為錢少，不能繳付全期的膳宿費，只能到學校裏暫讀幾個星期。我們要實施工讀制度，這又是一個原因，藉此可以幫助學生賺一些錢，得以在九個月的全學年中在校內讀書。

我們學校最初豢養的牲畜，是一個塔斯岐基的白人所送的一隻盲目的老馬。到了現在，我們的馬、駒、母牛、小牛、公牛已有二百餘頭，大豬小豬約七百隻，還有大量的蘇羊和山羊。

學校日見發達，人數日增，以致付了地價，開墾了土地，修理了校場內原有的舊木屋以後，我們便轉移目標，想造一所龐大的永久的房子。經過不少的討論，我們最後計劃建築大廈，算來須得六千金洋。這在我們看來是一筆極巨大的數目，但我們知道學校非進即退，我們若不能供給房子，使學生們享有家庭式的生活，則我們的努力算不得什麼。

正在這時，我遇到了一件使我非常快樂而又驚奇的事。有一個住在離塔斯岐基不遠，開鋸木廠的南方白人，聽到了我們要造一所新的大廈，便跑來對我說，他不要其他的擔保，只要我說一句話，到了有錢的時候付他，他便情願供給造房子所需要的一切木料。我坦白地對他說，我現在手頭連一元金洋也沒有。我雖這樣說，他卻仍堅持着情願送木料來。後來我們有了一部分的錢，我們便允許他照辦。

得維德松小姐又開始用各種方法，為新屋向住在塔斯岐基的和附近的白人和黑人捐一些錢。我從未見過地方上的人民對於新屋的前途，有像這些黑人那樣的快樂。有一天，我們正在開會討論為新屋募

捐的時候，一位年老的戰前的黑人，走了十二哩的遠路，帶着一輛牛車，裝着一隻大豬進來。大會正在舉行中，他在羣衆中立起來說，他沒有金錢可以捐助，但他養了兩隻很好的大豬，他帶來了一隻，捐作造新屋的費用。末了他說：「任何黑人，他若能愛他的民族，尊重自己，他在下次開會的時候，也會送一隻大豬來。」地方上也有許多人，在造新屋的時候，自動地來幫幾天忙。

我們在塔斯歧基已得到了一切的幫助，得維德松小姐便決定到北方去捐款。她費了好幾個星期的工夫，去拜訪個人，到教堂裏，主日學校裏，以及別的團體裏去演說。她覺得這個工作極其困難，往往是很難爲情的。我們的學校又不出名，可是不久她便得到了北方上等人士的信任。

北方人第一次的捐款，是一個紐約婦人給的，得維德松小姐坐船到北方去的時候，船上遇見了這位婦人。她們便談起天來，這位北方婦人聽了，很關心我們在塔斯歧基的努力，她在分別之前，便給得維德松小姐一張五十元金洋的支票。得維德松小姐在和我結婚之前，以及結婚之後，一直在北方和南方，用個人拜訪或通信的方法，引起人們的關心，以便募捐。同時她仍密切地兼管塔斯歧基校內的工作，擔任着女主任和教師的職務。此外，她還在塔斯歧基和附近的老年人中服務，教一班本地的主日學校。她的體格素來不大強健，但是若不拿出全力來幹她所愛幹的事，她是不會快樂的。往往在日裏一家一家地去拜訪，想引起民衆關心塔斯歧基的工作，到了晚上，弄得精疲力竭，連衣服也無力自己脫。有一個波士頓的婦人告訴

我說，有一次得維德松小姐投了名片去見她，她因爲有事，略遲片刻，等她到了會客室裏，已見得維德松小姐疲乏得睡熟了。

造第一幢房子時捐款最多的，是紐約州布盧克林（Brooklyn）的波爾忒（Porter）先生，這房子便名爲波爾忒堂。房子一造，金錢的需要更尖銳化了。有一次，我允許一個債主，某日可付他四百元金洋。到了那天早晨，連一元錢也沒有。到了十點鐘，郵件到校，內中卻有一張得維德松小姐寄來的支票，剛剛四百元金洋。類似這種性質的事，我還可舉出許多。這四百元金洋是兩位波士頓婦人所捐的。二年以後，正當塔斯歧基的事業蒸蒸日上，經費孔殷，前途渺茫的時候，這兩位波士頓婦人又寄來六千金洋。這捐款所給與我們的驚喜和鼓勵，簡直非言語所能形容。此後十四年來，這兩位朋友每年給我們六千元金洋的常捐。

建築新屋的計劃一決定，學生們便於下課之後親自掘地，預備安放基礎。起初他們的觀念還不大確定，深怕動手工作，於他們不大適宜，正如有一個學生說，他們是來受教育而不是來作工的。漸漸兒我注意到贊成工作的意見，佔了優勢，這使我頗爲欣慰。做了幾個星期苦工以後，基礎預備好了，便擇了一個安放基石的日子。

我們且來想一想：這放基石的地點，是在南方的中心，所謂「黑帶」是在我國最盛行奴隸制度的中心點；這放基石的時間，是在取消奴隸制度之後僅僅十六年的時候，在十六年以前，黑人是不能讀書的，教

黑人讀書的人是違反法律，違反公衆輿論的——我們一思量到這些情形，便覺得這年春天在塔斯岐所舉行的，確是極偉大的典禮。我相信世界上能這樣舉行典禮的地方，恐怕不多。

擔任典禮演說的，是本國的教育監督湯卜遜（Waddy Thompson）先生。教師們、學生們、家長們、朋友們、本郡的白人官長們、鄰近的白人領袖，以及前幾年被這些白人們佔爲財產的許多男女黑人們，都圍集在基石的四周。無論白人黑人，都熱心地要在基石下放一些紀念物。

房子還未完工，而我們已過了不少的困難的日子。好幾次我們真逼得心痛，票據一一到期，而我們卻無錢償還。一面要把新屋造好，一面還要爲學校新添設備，同時卻不知道錢在什麼地方。這幾個月來的我們所受的困苦，若不是親自經歷過的人，恐怕不能體會得出來。我記得我在塔斯岐基的第一年，爲了金錢沒有把握而焦急，往往在夜裏翻來覆去，不能成眠。我知道，我們大部分是在進行一種嘗試——嘗試黑人不能建設一個大規模的教育機關，不能管理這種事業。我知道，若是我們失敗了，勢將損害整個民族。我也知道一切的推測都於我們不利。我知道若是白人與辦這種事業，其成功是不必說的了，但是興辦的是我們，萬一成功了，必將使人驚異。這種種都是重擔，有時壓在身上，每一方吋總得有一千磅重。

可是我們在這種種困難和焦急之中，我每次到塔斯岐基的白人或黑人處去請他們幫助，他們沒有一次不盡他們力之所及地幫助我。幾百元的期票到了期，我便向塔斯岐基的白人零星貸借，五六個人合

計起來，便得償清期票，這種事情總有十餘次之多。有一件事我一開始便決定要辦到的，那便是維持學校的信用；這一點，我並不是誇口說，我們這幾年來都辦到了。

我常常記得卡姆培爾先生的教訓，他便是我前次提及過請阿姆斯特隆將軍叫我到塔斯歧基來的白人。我一開始工作，卡姆培爾先生便像父親似地對我說：「華盛頓常常記住，信用便是資本呀。」

有一次，我們感到經濟極度困難的時候，我將我們的情形坦白地告訴了阿姆斯特隆將軍。他竟毫無遲疑地拿出自己所積蓄的錢，開了一張我所需要的數目的支票。阿姆斯特隆將軍這樣子幫助塔斯歧基，並不僅僅這一次。這件事我還沒有公開地說明過。

一八八二年的夏季，就是我到校辦事的第一年終了的時候，我是和西弗基尼亞州毛爾頓的斯密斯（Fannie N. Smith）小姐結了婚。我們在初秋的時候，便在塔斯歧基開始成家。我們的教員，現在已增到四位了，因此也可以到我們的家庭裏來敲鼓。我的妻子也是哈姆普吞學院的畢業生。我的妻子熱心不倦地為學校服務，為家務盡職，不幸到了一八八四年五月便去世了。結婚後她生了一個女小孩，波爾喜阿·華盛頓（Portia M. Washington）。

我的妻子一開始便極熱心地將她的精神和時間用在學校的工作上。她的興味和志向完全和我一致。可是她還沒有機會看到學校的成功便去世了。

第十章 比無薪造磚更困難的工作

我在塔斯岐基一開始便決定教學生們不但做一些農務和家務，而且要教他們建造自己的房子。我的計劃是在他們作工的時候，教以最新式的最好的勞工方法，這樣不但學校可得到他們的努力的利益，也可教他們知道勞工的效用，勞工的美德，勞工的神聖，勞工不僅僅是苦工賤役；使他們設法提高勞工的意義，養成爲工作的本身而愛工作的精神。我的計劃是不教他們照舊法作工，要教他們利用自然力——空氣、水、蒸汽、電、馬力——來幫助他們的工作。

起初有許多反對這種利用學生們的勞工而建造房子的試驗，但我卻始終堅持這個主張。對於這班懷疑我的計劃爲不聰明的人，我解釋道，我們初造的房子比請外面熟手的工人所造的難免不合意，難免有缺點，但是在學生們工作的時候，他們所得到的文明、自助、自賴的教訓，已足夠補償這種不合意和缺點而有餘。

我又告訴那些懷疑我的計劃爲不聰明的人說，我們的學生大多數是窮苦的，他們離了南方種棉花的、出糖的、種稻的農場，來到我們這裏，一旦給他們住起建築精美的房子來，我知道這自然使他們很高興，但是我覺得先教他們如何建築自己的房子是更自然地依照了發展的順序。錯誤我也知道是難免的，但

這些錯誤將來會給與我們有價值的教訓。

塔斯岐基學校創辦至今已有一十九年的歷史，這其間，那憑學生的勞工而建造房子的計劃，是始終依照的。到了今日，大小房屋算起來不下四十所，其中除四所之外，幾乎完全是學生的勞工的出品。此外還有一個效果，那便是數百個學生在教他們如何建造房子的時候，得到了建築的知識，他們現在都布散在南方各地。這一批學生便照樣將他們的技巧和知識傳給下一批，到了現在，任何式樣，任何大小的房子，從打樣起到裝置電線止，完全可由我們的教員和學生做的，用不着出了校場去請一個工人來。

時或有一個新學生受了試探，想用鉛筆劃些記號，或用大號裁紙刀劃些缺口，來損傷房子的外觀，我便聽到老學生提醒他說：「不可如此。這是我們的房子，是我幫着造的呢。」

我以爲在學校的初期，我的最困難的經驗是造磚頭的事情了。我們一到田裏的工作有了相當的開始，第二步便把我們的努力專致於造磚的工業上。我們要造房子便需要磚頭；不過開辦這個工業還有一個原因。我們的市鎮裏本來沒有磚窯，我們要造房子，市上磚頭的需要更覺得逼切了。

我對於從前的以色列人「無薪造磚」的工作，常常表示同情，但是我們的，是沒有金錢，沒有經驗而要造磚頭的工作。

第一，這工作是辛苦的污穢的，是很難得到學生的幫助的。一到造磚的時候，學生們對於一面讀書一

面要作工的厭惡，更爲明顯了。誰高興在泥坑中，污泥及膝地立上數小時？有好幾個厭惡得離開了學校。

我們尋了好幾個地點，才開了一個坑，以供給磚泥。我起初常以爲造磚是極簡單的，但是受了困苦的經驗，便立即見到這是需要專門的技巧和知識的，尤其是燒磚的工作。費了許多氣力，我們做了二萬五千方磚頭，放在窯裏燒起來。這一窯是失敗了，因爲窯造得不好，燒也燒得不好。我們便立即開始造第二個窯。這次又爲了種種原因也失敗了。這一窯的失敗更難再叫學生來參加。然而有幾個在哈姆普吞受過工業訓練的教員，卻自動地來幹，於是煞費苦心，成功了第三個可以燒的窯。一窯磚大約須燒一個星期。到了最後的一天，似乎再過幾個小時，我們便可有千萬方的磚頭了，不料到了半夜，窯坍了。這第三次又失敗了。

這一次的失敗下來，我要再試辦，手中連一元金洋也沒有。許多教員也勸我將這造磚的努力放棄了罷。在困難之中，我便想起了幾年來帶着的一隻錶來了。我拿了錶跑到離我們的地方不遠的蒙特哥美利（Montgomery）城，當入了典當。我當了十五元金洋的現錢，再來開始造磚的嘗試。我回到塔斯歧基有了十五元金洋的幫助，將沮喪的失望的力量，重新振作起來，開始第四次造磚的嘗試。這一次，我很快樂地說，我們成功了。我的錢還未籌到，那隻錶的當票的期限已滿了，從此我永不再見那隻錶；但我永不懊喪那隻錶的失去。

到了現在，造磚是學校的重要工業了，上一季學生們造了一百二十萬方頭等的磚頭，其質料之優美，

可到任何市場去賣得此外，有幾十個青年人學會了造磚的工業——手做，機器做都會了——現在在廣方的各地從事於這種工業。

造磚一事也使我得到關於南方兩民族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教訓。許多白人本來與學校是沒有關係的，或許對於學校從未表過什麼同情，現在看了我們的磚頭好，也到我們這裏來買了。他們發現了我們在供給社會的真需要。造磚使許多鄰近的白人覺得黑人受了教育並不是無謂的，乃是增加社會的財富和福利。我們的鄰人來買磚頭，我們便與他們結識了；他們和我們交易，我們也和他們交易。我們營業的利益發生了相互的關係。我們有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他們有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這對於造成和洽的關係有着極大的幫助，這種和洽的關係在我們和那地的白人之間繼續存在着，而且現在擴大起來，及到南方各地。我們中能造磚頭的人無論那一個，跑到南方無論那一處，我們便見到他對於所到的社會都有貢獻。社會便覺得感激他，甚至在某方面覺得社會要倚靠他。兩個民族的和洽的關係，便這樣激發起來。

我的經驗以為，在人類的天性中有一種東西，常會使人承認功績報答功績，不管幹這功績的人的皮色是黑的或是白的。我也覺得只有明顯的着實的行爲，日久總可解除成見。這黑人所造的頭等的房屋是衆目昭彰的，這比寫幾篇空談黑人應該造房子，或者黑人恐亦能造房子等文章，其力量更大十倍。

工業教育的原理，再同樣發展起來，我們一開始便製造自己的四輪的，雙輪的運貨馬車，以及輕便的

小馬車。現在我們的農場上和學校內所用的車子，也有好幾打，沒有一輛不是學生親手所造的。而且我們造得多了，還可供給本地的市場。以我們的車輛供給當地的人民，其效果正如以磚頭供給他們一樣。在塔斯歧基學會了怎樣造車怎樣修車的人，每到一地都被當地的黑人和白人視爲恩人一樣。和他同住同作工的人即使要離開他，也得躊躇起來。

一個個人不論屬何種族，只要能做一些社會所需要他做的事情，到後來總有出頭的一日。一個能夠分析希臘文句子的人到了社會上，想把他的分析希臘文句子的才能，供給當地的人民。當地的人民在那時或者並不需要希臘文的分析，但是他們需要磚頭、房屋、車子。倘使他能夠供給這些需要，那末人家自然會要他建築，要他製造，需要一多，便更爲重視，更覺得他的工作是於社會有利了。

正在我們的磚窯燒成功的時候，我們遇見了很有力的反對。學生們不願學校教他們作工。其實那時全州都已知道，凡到塔斯歧基來的學生，不論他的經濟狀況怎樣，必須學習一種工業。有好多家長寫信來，不要叫他們的兒女在學校裏作工。也有家長們親身到學校裏來抗議。新來的學生們，大多數都帶着家長的信或口頭要求，只要兒女們念書，別的都請不要教。書越多，越厚越大，書名越長，學生和家長便越高興。

我對於這些抗議毫不介意，盡力乘機到本州各地去演說，使家長們知道工業教育的價值。我又和學生們時常討論這個題目。雖然人們以爲作工是不名譽的，而學生的人數卻越來越多，到了第二年的中期，

約有一百五十名，幾乎全是從阿拉巴馬州的各部來的，也有幾個是從其他諸州來的。

一八八二年的夏季，得維德松小姐和我到北方去募捐，以完成我們的新房子。在北上的途中，我到了紐約，想請一位我前幾年所認識的宣教會的職員，寫一封介紹信。這位先生不但不肯給我一封信，而且很熱忱地勸告我立刻回去，不必再想捐錢，因為他確實知道，我決不能捐到比作旅費更多的數目。我謝謝他的忠告，繼續進行。

我到北方，第一處所到的是馬薩諸塞州的諾坦普吞（Northampton），我費了半天工夫，想找一所黑人的家庭寄食，我做夢也想不到任何旅館會許我的。後來我一發現住旅館是沒有什麼困難的，這真使我驚奇不止。

我們的募捐是成功了，捐到了足夠的錢，所以得在那年的感恩節聚在波爾忒堂裏禮拜，雖然房子還未完工。

我正在物色一位領感恩禮拜的人，竟找到了一位我簡直是無法可知的難得的人物，他便是培德福（Robert C. Bedford）牧師，是從威斯康星（Wisconsin）來的白人，為當時阿拉巴馬州，蒙特哥美利城黑人公理會小教堂的牧師。我未到蒙特哥美利去邀請領這禮拜的人之前，還沒有聽到過培德福先生。他也沒有聽到過我。他很高興地答應了，到塔斯歧基來領感恩禮拜。這種禮拜在那邊的黑人還是第一次。

他們所表露的興趣是多麼濃厚呀！這新房子的景象，使這次的感恩節永不忘懷。

培德福先生允許做我們學校的董事，他盡董事的能力和學校發生了十八年的關係。這其間他為學校日夜擔心沒有別的事情比為學校做些工作，不論任何微些的事，使他這樣快樂的。他在每一件事上都不以自己為念，但希望服務着別人以為討厭的事。在我和他同事的關係中，我看沒有人像他那樣學到了救主的精神。

後來又有一位到學校裏來服務的人，那時他還年青，剛從哈姆普吞出來，倘使沒有他的服務，我們的學校決不能成為現在的狀況。他便是羅干（Warren Logan）先生，他十七年來做我們學校的會計，當我不在學校的時候兼任代理校長。他永不自私，有辦事的才幹，精明的判斷力，所以無論我離校有多少日子，總會把學校處理得井井有條。學校的經濟無論如何困難，他的忍耐心和信心決不動搖，他總相信我們有最後成功的一天。

在我們第一幢房子將要完工的時候，我們便將一部分用起來——這是在我們學校第二年的中期——我們開辦了一所寄宿舍。遠處的學生也有到我們這裏來的，學生的人數越增加起來，我們越覺得我們的能力不足，只能做一些表面的工作，不能深入學生們的家庭生活。

我們開辦寄宿舍，一無開辦的東西，只有學生和他們的胃口。新房子裏毫無廚房和食堂的設備，但是

我們想了一個方法，把房子下面的泥土掘起來，造了一間勉強有些亮光的地下室，作為廚房和食堂。我於是又叫學生自願地動手，開掘地下室。他們都幹了，幾星期後，我們有了一個烹飪和就食的地方，雖則這地方是粗陋的，不舒服的。任何人現在見了這個地方，決不會相信這就是從前的食堂。

當時最嚴重的問題是：既沒有設備，又沒有金錢，而要開辦一個寄宿舍，好好地進行着，豈非難事。市鎮上的商人都願意將我們所要的食物賒給我們。其實我早已覺得時常侷促不安，因為人們相信我，似乎比我相信自己更放心。可是烹飪，沒有爐灶，多少困難，進食沒有碗碟，多少難看。起初的烹飪是在室外做的，照原始的舊法，把鍋罐放在火上。把造房用的木匠的長凳權當食桌。碗碟是太少了，連費些工夫來詳述的價值也沒有。

寄宿的人似乎沒有一個會想到吃飯須有一定的時間，這也是一個煩擾的原因。一切事情都沒有次序，極不方便，老實說，起初兩個星期中，沒有一餐飯不出亂子。不是肉沒有煮熟，便是燒焦了，不是麵包沒有放鹽，便是茶忘記了。

有一天很早的早晨，我立在食堂的門旁，聽着學生的怨聲。那天早晨的怨聲是特別強烈，也特別多，因為早餐是完全不能吃的。有一個女學生因為一些也吃不到早餐，便跑到井邊，想吊一些水喝，權當早餐。不料到了井邊一看，吊水的繩子是斷了，水也沒法吊得。她便離開井邊，也不知道我在旁邊，就極灰心地說，

「在這個學校裏，我們連水也喝不到。」唉，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像這樣使我沮喪的話。

還有一次，那時培德福先生——我已經提起過，他是我們的董事之一，也是本校的熱心朋友——正到我們校裏來參觀，他的寢室正在食堂的上面。早晨很早的時候，他被底下食堂裏兩個男學生起勁的辯論所驚醒了。所辯論的問題是，那天早晨應該誰用那隻咖啡杯。一個男學生辯贏了，因為他證明他三個早晨完全沒有用過那隻杯子。

不過，漸漸地，並且由於忍耐和刻苦的工作，我們終於在混亂中有了秩序，正如我們對於任何問題，只要我們用忍耐、智慧和熱心來對付着，沒有不能解決的一樣。

我現在迴顧到我們奮鬥的那些事情，我喜歡我們有過這樣的奮鬥。我喜歡我們忍受了那一切的不舒服和不便。我喜歡我們的學生必須挖出地方來當作他們的廚房和食堂。我喜歡我們最初的食堂是在那淒慘、幽暗而潮濕的地下室中。如果我們是在一所美麗動人，而處處便利的室中開始的，我恐怕我們早已「得意忘形」，就此「揚揚自喜」了。我想，在自己所創立的基礎上開始起來，實在是大有意義的。

現在我們的老學生，按着他們的常例，回到塔斯岐基去看看，走進了那寬大、美麗、極其通風、光線充足的食堂，看見了烹調極佳，引人饑涎的食物——大都是學生所自己生產的——看見了桌子、潔淨的桌布和膝巾，桌上的花瓶，聽見了唱着歌的鳥，並且注意到，每餐都有定時，都有秩序，食堂中幾百個人就餐，誰也

不發一句怨言，這時，他們，我們的老學生，也時常要對我說，他們喜歡我們那樣的開始，由着逐漸而自然的發展過程，一年一年使我們自己得以成功。

第十一章 在睡上牀鋪之前製好牀鋪

在本校歷史上稍後的時期中，馬沙爾將軍來探訪我們，他是哈姆普吞學院的會計。很信任我們，曾首先貸給我們二百五十元，使我們買成那片田地。他住在我們地方一星期，將各種事物，仔細檢查了一下。他似乎很喜歡我們的進步，寫了有趣而足以鼓勵人的報告寄回哈姆普吞去。再稍爲過了些時，馬基女士也來探訪我們，她就是我初進哈姆普吞時給我「打掃」的入學試驗的，再後來，阿姆斯特隆將軍自己也來了。

在這些哈姆普吞朋友來看我們的時期中，塔斯岐基的教員數目，大大地增加着，新教員的大多數都是哈姆普吞學院的畢業生。我們給我們的哈姆普吞朋友，尤其是阿姆斯特隆將軍熱烈的歡迎。他們看見本校在短短的時期內，有這樣迅速的進步，都覺得驚奇而高興。數哩之內的黑人，早就聽見阿姆斯特隆將軍的許多事，所以都到本校來看他。歡迎這位將軍的，不但是我們自己種族中的人，南方的白種人也是一律歡迎他的。

阿姆斯特隆將軍這樣第一次到塔斯歧基來，給了我一個機會，可以看清楚他那為我以前所沒有看清楚的人格。我是指牠對於南方白人的注意而說的。在此以前，我總以為阿姆斯特隆將軍，既曾和南方白人打過仗，對南方白人總不免含些恨意，只會幫助南方的黑人。可是他這次來後，使我相信我自已還沒有知道這位大人物的偉大的寬宥。我由於他的各次探訪南方白人，和他與他們的各次談話，我不久才知道他很注意白人的繁榮和幸福，正和注意黑人一樣。他對於南方毫無恨意，一遇到可以發揮他同情心的機會，他就很快樂。在我和他作伴的全部時期內，我從來沒有聽見他在公衆或私人方面，說一句恨南方白人的話。我從他在這方面的榜樣，我學得了一種教訓，就是大人物施普愛，只有小人物才懷着仇恨的精神。我也學得幫助軟弱的人，會使作這幫助的人強壯；壓迫不幸的人，會使作這壓迫的人軟弱。

我由阿姆斯特隆將軍地方，學得這個教訓，是好久以前的事。那時以後，我便決意不許一個人，不管他是何種皮色的人來使我恨他，以致我的靈魂狹小而墮落。藉着上帝的幫助，我相信我對於那些南方白人，說不定是虐待過我們種族的，我已經完全不再含一些惡意。我為南方白人服務，正和我為我自己同胞服務一樣的覺得快樂。我從心底裏可憐那種人就是他很不幸，習慣上陷入了種族偏見的人。

對於這事，我愈加考慮，我便愈加相信，南方某區域的白人，一定要用盡方法，來破壞黑人的投票力。這事所造成的最壞的結果，並沒有完全妨害到黑人，卻永遠妨害了白人的道德。給黑人的害處是暫時的，

可是對於白人的道德，害處卻是永遠的。我時常注意到，誰存心偏私，想要破壞黑人的投票力的，他在其他的人生關係上，就習慣了欺詐，不但對於黑人如此，對於白人也無不如此。以欺騙黑人而開始的白人往往以欺騙白人而終了。開始以私刑加於黑人而犯法的白人，不久就會受到誘惑，想以私刑加於白人。在我看來，爲了這個原故，全國加以援手，使南方不會再有無知的舉動，實在是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件事，在南方教育的發展上，每年更顯得清楚的，就是阿姆斯特隆將軍的教育觀念的影響；這影響不但及到了黑人身上，也及到了白人身上。現在，南方各州，差不多已沒有一州不致力於白種學生的實業教育的，在許多事項上，很容易將這些努力的歷史，追溯到阿姆斯特隆將軍。

在我們開辦貧苦寄宿部不久之後，到我們地方來的學生，便更加多起來了。數星期來，我們不單爲了沒有錢，難於解決膳食，並且也難於解決宿舍。爲了這個原故，我們在近本校處，租了一些小屋。這些小屋都是破損的，一到冬天，住在裏面的學生，就必須吃到寒冷的苦頭。我們向學生收費每月八元——他們所能付的數目。其中除了膳食之外，還包括着住屋、燃料和洗濯。他們對於學校能作任何有價值的事情，我們都記在他們的帳上，作爲他們寄宿的存款。至於每一個學生每一年應交的學費五十元，則和現在一樣，我們只好隨時隨地另想辦法。

這一些現款，實在不夠我們開辦寄宿部。在我們工作的第二個冬季中，氣候很是寒冷。我們沒有力量

準備足量的被褥，來保護學生的溫暖。實際上，若干時以來，我們除了極少幾次以外，簡直供給不起任何牀架和薦墊。在最冷的夜裏，我一想到學生們的不舒服，心裏非常難過，我自己竟至不能安睡。我很記得，有好幾次，我在半夜裏，跑到那些少年人的小屋裏去，目的是在安慰他們。我時常看見他們裏面，有些人圍着火，擠緊了坐着，用一條僅有的毛毯共同裹着，以便藉此取暖。在全夜中，有些人甚至不敢躺下來。有一個上午，爲了隔夜尤其冷，我便在禮拜堂裏叫那些自己覺得凍傷的人，舉起手來。有三個人舉起了手。雖然有這些經驗，但他們差不多不發一句怨言。他們知道我們是在盡我們爲他們打算的力量。他們有權可以享受任何可以促進他們地位的機會，便很快樂。他們時常詢問，他們可以作些什麼事情，以減輕教員的負擔。

我在北方和南方，時常聽見人家說，黑人中有誰的地位高於他人，他們便不會互相聽從和尊敬。關於這種一般的信念和這些言論，我可以說，我在塔斯歧基的十九年經驗中，我從來沒有受到校中任何學生或職員不恭敬的言語或舉動。適得其反，我時常卻因許多有意味的敬意，而覺得心有所不安。學生們似乎不要看見我挾着一本大的書，或一隻皮包，或任何重大的東西，走過場地。要是有了這樣的事情，自動來爲我代勞的，往往總在一個人以上。天一下雨，假使我要出去，便一定有個學生帶了傘到我的身旁來，請求我應許他爲我撐着。

我寫到這一點時，我很願意說，在我和南方白人一切的接觸中，我從來沒有受到一些個人的侮辱。塔

斯岐基內外的白人似乎尤其以竭力向我表示尊敬爲他們的特權，而且時常表示到常例以外去。

不久以前，我在泰克薩斯 (Texas) 州的達拉斯 (Dallas) 和豪斯吞 (Houston) 之間，作着旅行。不知怎樣一來，大家早就知道我在火車上。每逢車子到了一站停下來時，差不多總有許多白人，時常還有各該地的官吏在內，走上車來，自己介紹，爲了我在南方所作的工作，熱誠地感謝我。

還有一次，我由佐基亞 (Georgia) 的奧古斯塔 (Augusta) 往阿特蘭塔 (Atlanta) 去，爲了旅行太多，覺得很倦乏，我就乘巴爾曼 (Pullman) 臥車。我走進車廂的時候，看見了兩個我很熟悉的波士頓太太。她們似乎完全不知道南方的風俗，她們用着一番美意，要我和她們同坐在一處。我遲疑了一下，就答應了。坐了不過幾分鐘，其中有一個，不給我曉得，就叫了我們三個人同吃的晚飯。這個使我更加爲難了。車中全是南方的白人，許多人都注視着我們。我我知道晚飯已經叫好，我就想用些託詞，讓我離開這裏，但是這兩位太太卻一定要我和她們一同吃飯。我只好嘆一口氣，在我的座位上坐了下來，並且對我自己說：「我現在居然這樣了。」

事情的爲難，還有一些增加呢。晚飯剛剛放在桌上，有一位太太卻記起她的皮包裹，還帶着一種特別的茶，她要拿出來喝，因爲她說她十分覺得車僮不會知道泡這茶的方法，她就立了起來，親自去動手泡了來給大家喝。後來晚飯總算吃完了，這似乎是我從來所沒有吃過的最長久的一餐。我們吃好後，我決定自

已離開這個困難的地位，就走到吸烟室去，這是那時大多數人觀看窗外風景的地方。但是這時車中不知怎樣一來，已經知道我是什麼人了。等到我一走進吸烟室，我從來沒有這樣驚奇過，原來在那處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是佐基亞的市民，都立了起來，向我介紹他自己，爲了我給全部的南方所作的事功，熱誠地感激我。這不是阿諛，因爲每一個人都知道，阿諛了我是毫無所得的。

一起首我就想使學生們感覺到塔斯岐基並不是我的或其他教職員的學校，只見他們的學校，他們在這裏面和其他任何董事或教職員，有同樣多的利益。我還想使他們更加覺得，我在學校裏是他們的朋友和顧問，並不是他們的監督。我的目的是要他們對於學校生活的任何事項，都肯直率坦白的說出來。每年我總有兩三次，要學生寫信給我，對於學校的任何事情，加以批評，發怨言，或提議。要是不這樣做，我就和他們在禮拜堂裏敍會，大家開誠佈公的談談學校裏的事情。和學生們的別種敍會，再也沒有比這些敍會使我高興的，也再也沒有比這些敍會在計劃將來時給我幫助的。這些敍會，在我看來，似乎使我獲得了關心本校者的全心。能幫助一個人的，最好就是將責任加到他的身上，並且使他知道你信託他。我看到僱主與僱工間發生困難時，我總要想，假使僱主肯和僱工商量討論，使他們覺得雙方的利益是相同的，一直如此辦理，養成和僱工漸漸接近的習慣，那末許多罷工和擾亂，就不會發生了。每一個人都願意給人看得起，黑人當然也是如此的。只要讓他們一次知道你是在無私地關心着他們，你就可以領他們到任何地步。

我在塔斯岐基一開首便有這個目的，便是不但要學生們自己建築校舍，還要他們盡着可能的力量製造他們自己的傢具。我現在對於學生的忍耐，真有些覺得驚奇，因為他們會睡在地板上，等候着做好某種的牀具，或不用任何薦墊就睡着，等候着做好某種似乎薦墊的東西。

在最初的時期，會運用木匠工具的學生很少，所以那時學生所製造的牀具，都很粗陋而不牢固。我早上走到他們的寢室裏去時，往往會至少看見兩張牀坍在地板上。供給薦墊的問題，很難解決。然而我到底有了辦法，就是先弄到一些便宜的布，將牠們縫攏來，作成大袋。這些袋裏裝上了松草——或者時常稱之為松針——都是我們在相近的樹林裏取來的。我可以高興的說，製造薦墊的工業，此後就有了確實的發展，並且大有進步，以至現在成了一部分重要的工作，有系統地教着我們的女學生，現在在塔斯岐基薦墊店裏賣出來的薦墊，就和一般店裏賣出來的一般好。在寄宿部開辦以後若干時期，學生的寢室或膳室裏還沒有椅子。我們所用來替代椅子的，是學生用三塊粗板釘攏來的凳子。因此，在本校早期，學生寢室處的傢具，大概是一張牀，幾張凳子，有時還有一張學生做的粗桌。叫學生製造傢具的計劃，到現在還是遵守着的，但是每一寢室裏的傢具數，卻已經增加了，而且做工也已經有了大進步，很難找得出一些小不到之處。我在塔斯岐基一直堅持着的一件事，就是各處地方，都應該絕對清潔。我在早數年中再三地對學生說——現在也對他們說——人家也許會爲了我們的貧苦，爲了我們的缺少舒適和便利，而原諒我們，但是

他們總不會爲了我們的污穢而原諒我們。

在本校還有一件事，我也一直堅持着，就是用牙刷。阿姆斯特隆將軍曾經稱呼過的「牙刷福音」是我們在塔斯岐基的信條的一部分。沒有或者不用牙刷的學生，就不許他住下去。在最近數年中，到我們地方來的學生，差不多除了一把牙刷以外，就不帶什麼別的東西。他們從老學生的口頭，已經知道我們堅持要用牙刷，所以他們想給我們一個好印象，身邊至少總帶着一把牙刷。不久以前，我記得有一天早上，我和女校長接着常例，一同去檢查女生宿舍。我們在某寢室處看見了三個剛剛到校的女生。我問她們有無牙刷，其中一個女生指着一把牙刷回答說：「有的，先生。那就是我們的牙刷。我們昨天合買的。」她們沒有多久，就學得了另外的教訓。

這是值得注意的，應用牙刷使學生達到了較高等的文明程度。除了少數例外，我曾注意過，假使我們能夠使一個學生，在他不見第一把或第二把牙刷的時候，他就會自動去另買一把，我對於那個人的將來，就不會失望。身上絕對潔淨，我們自始就堅持着。我們教學生要和進食一樣，按時洗澡。我們在有什麼樣的浴室以前，就已經開始教這個功課。大多數學生是從農場區域來的，因此我們時常必須教他們在夜間睡眠的方法；那就是說，究竟睡在兩層被單——在我們能夠供給他們兩層被單之後——的中間，還是睡在牠們的下面。當然，我們只能供給一層被單的時候，要教他們睡在兩層被單之間是困難的。應用寢衣的重

要，也用着同樣的注意。

好久以來，最困難的事情之一，是教導學生將衣上的紐子都要扣牢，不許脫落，衣上也必不可有破處和油跡。這種教訓，我可以很快樂的說，大家都學得很到家，並且一年一年由前一批的學生傳給後一批的學生；現在，學生在傍晚由禮拜堂裏出來的時候，去檢查他們的衣服，可以發見他們像每晚一樣，一粒紐子都不會遺失。

第十二章 募捐

我們開辦寄宿部的時候，是以我們第一座房子波爾忒堂的頂層作為女生的寢室的。可是此後男女學生繼續增加着。我們能夠在學校場地以外，找得許多房間，給男學生用，卻不能將女學生也如此辦理。很快的，為女學生準備房間的問題，和為一切學生準備較大的寄宿舍的問題，漸漸地嚴重起來了。結果，我們決定再建築一座更加大些的房子，可以住得下女生，並且可以給大家有寄宿設備的大房子。

我們將需要的房子，略加計劃之後，才知道要費到一萬元錢，才辦得成功。我們沒有一些錢來開始這個建築；但是我們決定給這個需要的房子一個名字。我們知道，雖然我們還不能確定我們有無能力，獲得建築這房子的需用，我們卻可以先為牠題名。我們決定題這理想中的房子為阿拉巴馬堂（Alabama）。

四三) 紀念我們現在工作所在的本州。得維德裕女士再開始努力，向塔斯岐基內外的黑人與白人宣傳，請他們幫忙。他們很願意的響應着，無不量力捐助。學生們也像在第一座房子波爾忒堂一樣，開始掘泥，以便埋下基石。

等到我們在集款這事上弄得似乎沒有辦法的時候，卻又發生了某種事，顯出了阿姆斯特隆將軍的偉大——就是證明他遠超出平常人的某種事。我們正陷在憂慮中，不曉得什麼地方，和用什麼方法，我們才可以獲得建造新屋子的款項，我卻接到了阿姆斯特隆將軍一個電報，請我和他在北方旅行一個月，並且如果可能，請我立刻就往哈姆普吞去。當然我接受他的邀請，並且立刻往哈姆普吞去。我到了那裏，才知道他要在北方帶着一個合唱隊同走，在各重要城市裏開一個月會，並由我和他兩人演講。他又告訴我，這些鼓會，不是爲了哈姆普吞的利益，而是爲了塔斯岐基的利益，而一切費用，則由哈姆普吞學院負責，我聽聞之下，如何的驚奇，也就可想而知了。

雖然阿姆斯特隆將軍沒有這樣多的話告訴我，我卻知道他是要用這個方法，將我介紹給北方人，並且也憑藉此獲得一些急款，以便建築阿拉巴馬堂之用。軟弱而淺薄的人，也許要想用這種方法而爲塔斯岐基捐得的錢，也許就可以算是由哈姆普吞學院裏取出來的；但是阿姆斯特隆將軍的胸中，卻就從來沒有這個自私而短視的念頭過。他是太偉大而太善良了，那裏會有這種渺小而卑鄙的念頭。他知道北方人

的出錢，是爲了要幫助黑人文化的全部事業而出的，並不是爲了任何學校的進步。他也知道，加增哈姆普吞的力量，就是使牠成爲大公無私的中心力量，以便解決全部的南方問題。

關於我在北方所作的演講，我還記得阿姆斯特隆將軍的某句勸告。他說：「每句話都給他們一個觀念。」我想，要照着這句話進行起來，並不容易；這句話也可以應用到一切公衆演說上去。從那時一直到現在，我總將他的話放在心裏。

在紐約，布盧克林、波士頓、菲列得爾菲亞（Philadelphia）和其他大城市，都會開會；在這些開會中，阿姆斯特隆將軍和我自己，都爲塔斯基基而不爲哈姆普吞呼求援助。在這些開會中，尤其努力請人幫忙建築阿拉巴馬堂，並且竭力介紹本校，以引起公衆的注意。歷次敍會，在這兩方面都獲得了成功。

自從這次給我作過介紹之後，我就獨自往北方去募款。最近十五年中，我時常被逼要離開學校，費去一大部分光陰，努力去募款，以便供給本校日在增加的需要。在我募款的努力中，我曾有過若干經驗，也許我的讀者是會感到興趣的。時時有些募款作慈善事業的人，要來問我，我遵守着什麼規條，就能獲得那些能夠捐錢給有價值事業者的注意和幫助。若說所謂求乞這種科學也可以作成規條的話，那我就可以說，我只有兩個規條。第一，時常盡我全部的責任，將我們的工作給個人或團體知道；第二，不懊惱其結果怎樣。這第二條是我最難遵守的一條。帳單如雪片一般的飛來，手裏卻一塊錢也付不出，雖然我想我每年在逐

漸多得教訓，知道一切懊惱徒然自苦，反將許多可用於別種有效工作的體力和心力，消耗於無用之地，我還難於不懊惱。等到我和那些富貴名流多加接觸之後，我才注意到那些事業最大的人，就是那些「控制自身」的人，也就是從來不會興奮過度或失卻自制，而只是時常安靜，自有主張、忍耐，而有禮貌的人。我想馬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是我所看見的這種人中最好的榜樣。

要想使任何事業都能夠成功，我以為一個人最要緊能夠辦到完全忘記自己，那就是說，在大事業中，將自己丟在腦後。一個人這樣將自己丟在腦後，那末按照正比例，在他的工作中，也便可以得到同等程度的最高幸福。

我那募款給塔斯岐基的經驗，教我對於某一種人失去了忍耐，他們只爲了富人是富足的，又爲了富人不肯多用錢於救濟事業，便將富人斥罵個不休。第一，他們只知道妄肆譏評，不知道假使富人將他們的財富，立刻分散一大部分，將極大的商業企業解散或使之不健全，就要有許多因人因而變窮苦，結果就要吃到許多苦。富人時常有許多人向他們告幫，平常人是不大會想得到的。據我所知，富人每天總有二十個人向他們告幫。有好幾次，我一走進到富人的辦公室，我就見到總有五六個人在等着見他們，大家來的目的都相同，就是要錢。這些都是親自來的，至於郵寄來的告幫信，也就不必說了。那些不肯給人家知道姓名的人所佈施的錢，究竟有多少，也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够想像得出。我時常聽見有些人爲了不肯佈施，被人斥

實，但是我所知他們每人卻總要佈施出去幾千元，不過很祕密，世人不知道就是了。

我可以舉這樣一個例出來：在紐約有兩位太太，她們的名字不大在報上看得到，但是她們卻悄悄地，在最近八年之內，給我們錢，使我們可以建築三座偉大而重要的房子。除了這些房子以外，她們還對本校作了其他慷慨的贈與。而且她們不但幫助塔斯歧基，並且時常在尋求機會，去幫助其他有價值的事工。

雖然我可以做一個中間人，將我所收到的許多萬元錢，用於塔斯歧基的事業，我卻總是避免着世人所說的「求乞」。我時常告訴人，我從來沒有「求乞」。過什麼錢，並且我不是一個「乞丐」。我的經驗和觀察，使我相信，向富人直捷地堅持着要錢，按之常例，並不會獲得援助。我平常的主張，總以為有着足夠的頭腦賺錢的人，總有着足夠的頭腦知道施用的方法，也以為只將關於塔斯歧基的各種事實，尤其是關於畢業生工作的事實，使人家知道，就比了直捷求乞要更加有效。我想在高尙的尊嚴的地位上，提供各種事實，就是最富的人所會留心到的一切求乞。

向一家一家，向一個辦公室一個辦公室去勸捐，雖然是困苦的，不合己意的，體力消費很大的，卻也有着若干補償。這樣的工作，可以給人一個研究人性的希有機會。並且也可以給人一個機會，去見到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物——說得更加準確些，我想我應該說世界上「最優秀的人物」，以為工作的補償。誰放眼將國內的情形看看，誰就可以知道，國內最有用而最有勢力的人，就是那些對於改進世界的事業，能夠致

其最深注意的人。

有一次，我在波士頓，我去訪問一個比較富有的太太，我被領進去，到了門室裏，送出了我的名片。我正在等候回答的時候，他的丈夫走進來了，用最鹵莽的態度，問我要些什麼。我正想解釋我來拜訪的目的，他在他的言語和態度上，愈加不像一個紳士起來；後來他非常感情衝動，我只好不待那位太太的答覆，離開了他家。我走過了不多幾家，另外去看一位紳士，他卻用最熱誠的態度接待我。他開給了我一筆大數目的支票，並且在我有機會謝他之前，他就說：「華盛頓君，我很感激你，因為你給我幫助善舉的機會。能夠參加這個善舉，正是特權。我們在波士頓的人，爲了你做着一我們的「工作，總時常是感激你的。」我的募款經驗，使我相信上述前一種人，一直在減少着，而後一種人則在增加着；那就是說，富人對於那些爲了有價值的事業而向他們求助的男人和女人，漸漸地不當作乞丐，而當作給他們做事的代理人了。

我在波士頓城裏去拜訪任何人，難得不爲了我的拜訪而感激我的，而且他們的感激，總在我謝他們捐錢之前。在這城裏，施主們大都總覺得請他們出錢，實在是看得起他們。雖然在波士頓以外，也有許多慷慨的人，但一般而論，在別的地方，我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優美而和基督一般的精神。我一再相信，世界是在施捨的方向發展着。我一再要說，我所藉以集款的主要規條，是盡我的完全責任，給有錢的人以幫助別人的機會。

在塔斯歧基學校的早數年中，我好多天在北方的街上走着，鄉間道上旅行着，弄不到一塊錢往往在一星期中，從那些我認爲最肯幫忙的人那裏，失望到連一個銅板都捐不到，弄得我灰心絕望，卻從那些我認爲只有些微希望肯捐助的人那裏，獲得極大的幫助。

我記得，有一次我聽到了一個消息，使我相信，有一個紳士，他住在離科內提卡特州斯塔姆福德城 (Stanford) 二哩的鄉間，只要將我們的狀況和需要說給他聽，他就會注意我們在塔斯歧基的努力。在一個非常寒冷而大風雨的日子，我就走那二哩路去看他。經過一些困難之後，我總算和他見了面。他帶着一些注意聽我所應說的話，但他並沒有給我什麼。我不免就要想，我費去了三小時來看他，是徒然的了。但是我到底遵守了我那盡職的常規。如果我不看見他，我一定會因我的失職而覺得不快的。

這次拜訪後兩年，這位先生寫了一封信到塔斯歧基來，信中這樣說：「奉上紐約匯票一紙，計一萬元，以便促進貴處事工。此款本留在鄙人遺囑中，以爲貴校之用，但鄙人現覺先前奉上，似較爲有智。兩年前曾駕過訪，鄙人迄今未忘。」

我簡直說不出，還有什麼別的事情，比了我接到這張匯票更爲滿意的。這是本校在那時第一次所收到的最大的單獨捐款。而且那時我們好久已經沒有接到什麼錢。爲了沒有錢，我們正在困難萬分，神經的緊張也非常厲害。開辦着這樣大的一個機關，要支付着許多錢，卻每月不曉得從什麼地方有錢來，因此神

經上所受的激刺，真叫我難於想像，還有什麼別的事情比這個更厲害的。

在我們這裏，我還覺得有雙重責任，因此我的憂慮更爲緊張。假使這機關是白人辦的，失敗了也不過損壞了黑人的教育事業；可是我知道，本校是黑人辦的，假使失敗了，不單是喪失一座學校，而且還要使大多數人，對於黑種人的能力，喪失信任。所以這次所接到的一萬元匯票，在這些情勢之下，總算將那天壓在我身上的重擔，解除了一部分。

從我們的事業開始，一直到現在，我時常有這種感覺，所以我一有機會，就對我們的教員們說，只要校內一直是清潔、純良而合乎衛生的，總一定會接受到相當的維持。

我第一次見到那位偉大的鐵道家罕丁頓 (Collis P. Huntington) 時，他交給我兩塊錢，捐給本校。最後一次，就是在他去世前幾個月見他時，他交給我五萬元，作爲我們的補助金。在這兩種捐款之間，罕丁頓先生和夫人，還有其他不少慷慨的捐輸。

有些人也許要說，這是塔斯歧基的好運氣，所以我們會有這筆五萬元的大禮物。不，這不是運氣。這是艱難的工作，除非你有艱難工作的效果，否則就不會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給你。罕丁頓先生給我兩塊錢的時候，我並不爲了他不多給我而怨怪他，我只打定主意，我要用確實的效果，給他相信，我們是值得送贈較大的禮物的。十多年來，我竭力要使罕丁頓先生相信我們工作的價值。我注意到，本校的用處發展多少，

他的捐贈便也增加多少。我從來沒有遇到一個人，比了罕丁頓先生對本校更爲注意與同情的。他不但給錢我們，並且對於本校的一般事情，還不惜諄諄教誨，有如父對子那樣。

我在北方募捐的時候，遇到困難也不止一次。下述的事實，以前除了一次以外，我從未向人談起過，因爲我怕人家不會相信牠。有一天上午，我到了羅德島州 (Rhode Island) 的普羅維頓斯城 (Providence)，身無分文去買早餐吃。我正要走過一條街，去探望一位太太，希望從她的地方獲得一些錢，我在電車軌道的中央，拾得了一張兩角五分錢的新鈔票。我不但有了這二角五分錢可以吃早餐，還在幾分鐘之內，從那位我本來要去拜望的太太那裏，獲得了一筆捐款。

在某一次的畢業式中，我大膽地去邀請了波士頓三一教堂 (Trinity Church) 的牧師同那爾德 (E. Winchester Donald) 博士，來作畢業式的講道。那時我們還沒有足夠的大房間，可以容納下來聽講的人，因此敝會的地方，是一個一半用樹枝一半用粗板搭成的涼棚之下。等到同那爾德博士演講後不久，大雨便直衝而下，雖然有人用傘去撐着他，他也只好停止。

我看見三一教堂的牧師，撐着一頂舊傘，在大羣聽衆之前立着，等雨停止了再繼續講下去，我才恍然大悟，我實在有些膽大妄爲。

雨不久就停止了，同那爾德博士完畢了他的講道；雖然天氣作怪，他的講道的確是非常好的。他到了

室內，溼衣服弄乾之後，他說，在塔斯岐基應該有一所大禮拜堂。明天，忽然有兩位那時在意大利旅行的太太，寫了一封信來，說她們已經決意給我們錢，造我們所需要的這樣一個禮拜堂。

不久以前，我們從卡內岐（Andrew Carnegie）先生地方，接到了二萬元，作為建築新圖書館之用。我們第一座圖書館和閱覽室是一所小屋的一隅，全部所佔的地位，大約闊五呎，長十二呎。在我能夠獲得卡內岐先生的注意和幫助以前，我已經工作了十年。十年以前，我第一次見他時，他似乎對本校只有些微的注意，但我就打定主意，要給他看，我們是值得他的幫助的。十年奮鬥之後，我寫給他下面的一封信：

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十五日。

紐約第五十一街五號卡內岐先生。

親愛的先生：數日之前，曾到府上拜訪，曾蒙垂詢一切，不勝感激，現在我想請求你給我們的學校，建造一座圖書館。

我們現有學生一千一百人，教職員連他們的家屬在內，共八十六人，相近本校之處，住有黑人約二百人，大家都要利用圖書館。

我們有書籍，定期刊物等一萬二千冊以上，都是朋友們送的禮物，但是我們沒有適當安放牠們的地方，也沒有適當閱覽的地方。

我們的畢業生在南方各地工作着，在圖書館裏所得到的任何知識，在提高黑人全族的事工上，都有幫助。

這樣一座我們所需要的房子，大約有二萬元，也就可以造得成了。一切建築工作，例如製磚、砌磚、木工、鐵工等，都可以由學生去作。你所給我們的錢，不單可以使房子完成，並且房子的建築，也可以使許多學生，有機會學習建築的法門，而學生也可以藉工作收入的錢，在學校裏自給。我不相信同樣多的錢，可以在成全一個種族上，有這許多成績。

如果你還要知道得詳細些，我很願意告訴你。

校長 濮各爾·華盛頓 謹啓。

回信來了，內容如下：

「圖書館的建築費，在二萬元之內，我很願意代爲付出，我也很喜歡有這個機會，來表示我在你們的高尙事業上所有的興趣。」

我已經知道，嚴格的生意經方法，在獲取富人的興趣時，很有用場。因此，在我們的財政和其他事務上，實行這種生意經方法，以求得任何紐約銀行的贊同，就成了我在塔斯岐基的常時目的。

我已講了幾筆捐給本校的大款項；但是使本校成功的大部分款項，都是沒有大財產的人所送來的。

小捐款。任何慈善事業，必須大大地倚賴這些小捐款，牠們代表着千百捐款人的熱忱。在我募款的努力中，我對於牧師們的忍耐和深切注意，時常要覺得驚奇，因為他們本來處處時要別人幫助的。假使沒有其他的事情可以使我相信基督徒生活的價值，那末美國各宗派的教會，在最近三十五年中，所作增高黑人地位的神聖工作，也就可以使我成爲一個基督徒。迅速地幫着增高黑人地位的錢，大部分是從主日學校、勉勵會和各宣教團體所捐來的銅板角子等小款。

講到小捐款，使我不能不說，塔斯岐基畢業生中，不將常年捐款送來的，是很少數的人。這些捐款，自二角五分起至十元止。

在我們第三年工作的開始後不久，我們出於意外地從三個特別地方，接到了錢，並且一直到現在，我們還繼續從他們地方得到幫助。第一，阿拉巴馬州之法院，將牠每年的補助費，由二千元增加到三千元；還有，稍爲過了些時，牠又將這個數目增加到每年四千五百元。所以能夠獲得這種增加的原故，是由塔斯岐基的州議員福斯忒 (M. F. Foster) 先生的力量。第二，我們從斯雷忒 (John F. Slater) 基金團方面，接到一千元。我們的工作，似乎能夠獲得該團董事的喜歡，所以他們不久就增加這個常年捐款。從此時常增加着，直到現在，每年我們由該團接到一萬一千元。另外我說的一種幫助，是從彼菩提 (Peabody) 基金團送來的。這款最初是五百元，從此一直增加，現在是一千五百元。

爲了要向斯雷忒和彼菩提兩基金團請求幫助，所以使我和兩個非常人發生了接觸——他們都是在辦理黑人教育的政策上，很有關係的人。我所指的是華盛頓州的卡利（J. L. M. Curry）議員，他是這兩個基金團的總代理人，還有是紐約州的哲塞普（Morris K. Jessup）先生。卡利博士是南方人，前南方聯邦的軍人。但是我不相信，國內還有任何人比了他更深切注意黑人的最高幸福，或比了他更沒有種族偏見。他天性上對於黑人和南方的白人，一視同仁。我永不會忘記我的第一次見他。地點是在他那時所住的弗基尼亞州的利赤蒙德城。我早已聽到過他的許多事。我第一次見到他時，爲了我年輕而沒有經驗，一直震顫着，他卻誠懇地握了我的手，說着很鼓勵的話，給了我很有用的指導，說明正當的進取途徑，那時並從此以後，我就知道他是時常無私地爲改良人類而工作的高尚人物。

斯雷忒基金團的會計哲塞普君，是一個富人，負着許多複雜的商業責任，他卻不但肯捐出錢來，並且肯將他的時間和思想，用於增高黑人地位的工作上，誰都及不上他。最近數年中，實業教育這一件事，所以會在現在的基礎上而獲得其重要的，大都就是他的努力與影響。

第十三章 二千哩路作五分鐘演講

在我們的寄宿部開辦後不久，就有許多學生來請求入學，他們顯然是有價值的人，但是卻又那樣的

窮，連校中一些小小費用，也沒有一些錢可以來應付。這一班是兼收男女學生的。要回絕這些請求入學的人，實在很困難，一八八四年，我們就開設了一個夜學校，以便容納他們中的少數人。

夜學校的組織計劃，是和我在哈姆普吞幫着創辦的一樣的。最初，學生約有十二人。所以答應入夜學校的原故，只是因為他們沒有一些錢，可以支付正規日校中的膳宿費。現在所要求他們的，是他們必須在白天在某種工商業上，作十小時的工，然後在晚上讀兩小時專門的學課。這是初進學校一二年中所必需的經過。他們所獲得的工資，比了他們的膳宿費要多些，雙方都知道，這些賺得的賺頭，除了極小的部分以外，都積在學校的帳上，等他們進了正式日校之後，作為日校的膳宿費。這種方式開辦起來的夜學校，一直發展着，以致現在的學生數，竟有四百五十七人之多。

要知道一個學生的價值，除了本校這部分的工作以外，簡直找不出更嚴格的試驗。就因為牠能夠供給一個好機會，來試驗一個學生的體力，所以我將極高的價值，放在我們的夜學校身上。誰願意一二年中，每天在燒磚場或洗衣作工作十小時，以便他或她獲得在晚上研讀專門學課兩小時的權利，誰就建下了穩固的根基，足可以承受更進一步的教育。

學生離開夜學校之後，就進入日學校，每星期讀書四天，作原來的行業兩天。除此以外，他還時常在三個月暑假中工作着。按之常例，一個學生通過了夜學校的試驗，他就可以完畢實業上和學課上的正常

功課。不論那一個學生，不論他能付多少錢，要是不肯作勞動的工作，就不許入校。實在的，現在實業工作已經和學課研究一樣的著名了。若干由本校畢業的最成功的男子和婦女，都是以夜學校爲他們的發祥地的。

一方面我們用着不少力量，注意着塔斯岐基實業方面的工作，我們一方面也沒有一些忘記或疏忽宗教與精神方面。本校是嚴格地不分宗派的，但又是全然屬於基督教的，學生的精神訓練，並沒有忽略過。我們的講道會、祈禱會、主日學、勉勵會、青年會和各種宣教工作，都可以作爲明證。

得維德松女士在本校早期歷史上，對於本校的成功，大有幫助，我早在上面講到過她，在一八八五年，我就和她結了婚。在我們的結婚生活中，她繼續將她的時間和力量，分用在家庭和學校工作之間。她不但繼續在塔斯岐基的學校裏工作，並且仍舊接着習慣，往北方去募款。一八八九年，她在快樂的四年結婚生活，和爲本校所作的八年艱難而快樂的工作之後，去世了。她是的確爲着她所十分愛好的工作，用着不息的努力，盡瘁而死的。在我們的結婚生活中，生了兩個聰明美麗的男孩，濮各爾·塔利阿斐羅（Booker Taliaferro）和挨內斯特·得維德松（Ernest Davidson）。長子濮各爾，已經學會塔斯岐基的碑業了。

常有人問我，我是怎樣開始我的公衆演講的。在我的回答中，我可以說，我從來沒有打算將我畢生任何一大部分光陰，用之於公衆演說。我時常有一種野心，要更加多「做」些事情，而不單單「講論」做事。

情。我似乎還記得，我和阿姆斯特隆將軍往北方去作許多公衆會演講的時候，全國教育會會長俾克內爾 (Thomas W. Bicknell) 先生是曾經到過一次會，聽過我的演講的。隔了幾天，他來信邀請我在下次教育會會時，作一回演講。該會開在威斯康星的馬提松 (Madison) 城。我接受了這邀請。這事就可以算是我公衆演講事業的開始。

我對教育會演講的那天晚上，到會的總有四千人。有許多人是從阿拉巴馬州，若干人是塔斯岐基來的，當時我並沒有知道。這些白人，後來老實告訴我，他們到這個會中來，是準備聽南方白人受結實的辱罵的，可是大出意料之外，在我的演辭中，一句也沒有辱罵的話。適得其反，卻爲着南方人所已做過的有價值的事情，受到了稱讚。有一位在塔斯岐基某大學當教員的白種太太，寫信給本地的報紙，她覺得很滿意，也是很驚奇，因爲我稱讚過塔斯岐基的白人，幫助我開辦本校。這次我在馬提松的演講，是我談到種族大問題的第一次。聽到的人，似乎對於我所說的，和我所取的立場，都很高興。

我初到塔斯岐基來的時候，我就決心要將這地方當作我的家鄉，也要和任何白人一樣，作正當的事情，自保尊嚴，同時更要和任何白人一樣，哀悼別人的錯誤行爲。我決意在北方的公衆演講中，不提一些我在南方所不願意說的事情。我早就知道，用辱罵的方法，使一個人變好是一件難事，要他變好的較可靠的方法，還是不要單單提起他所做的壞事，而只稱讚他所做的一切好事。

我雖然採用了這個政策，我卻沒有忘卻在適當的時候，用適當的態度和一定的說法，來叫人注意任何一部分南方人所做的壞事。我已經知道，南方人中，有許多人對於任何錯誤政策所作的率直誠實的批評，會很快的發出反響。按之常例，每逢需要批評的時候，批評南方人總是在南方批評，而不是在波士頓批評的。波士頓人到阿拉巴馬來批評波士頓，據我想來，總沒有就在波士頓說出他的批評來，更爲有效。

我在馬提松的演講中，所取的立場是說，關於種族問題所應取的政策，乃是用各種高尚的方法，將他們聯合攙來，鼓勵友誼的發展，切不可做什麼引起仇恨的事情。我更主張，關於黑人的選舉權，黑人應該更多考慮他所處的社會的利益，不可僅僅取悅一個離他自己和他的利益一千哩的某某人。

在這次演講中，我又說黑人的全部將來，大都要看他究竟能否藉着他的技巧、智力和人格，使他自己在他所處的社會中，有着使人難於否認的價值，以致他的社會便覺得少不了他。我又說，任何人會作一些比別人作得更好的事——會用不平常的態度作一件平常的事——不管他的皮色如何，就解決了他的問題，更說，黑人會產生別人所需要而必須有的若干事物，就會受到別人的若干尊敬。

我舉了一個例，說我們的畢業生中，有一個人用一英畝田地，產生了二百六十六蒲式耳 (Bushel) 的甜薯，而他所住的地方平常的產量，每一英畝只有四十九蒲式耳。他的所以能夠辦到這樣，就爲了他懂得土壤的化學，和懂得農業的改良方法。鄰近的白種農人，尊敬着他，走來向他請教種植甜薯的意見。這些

白種農人的尊敬他，是因為他藉着他的技巧和知識，使他所處的社會，在財富和舒適上都得到了增加。我又解釋，我對於黑人教育的理論，並不是說他一世只好過種田生活——只好產生最佳而最甜的馬鈴薯——乃是說，假使他在這類實業上獲得成功，他就可以立下基礎，由他的子孫在上面產生人生中更高尚更重要的事物。

簡括說來，這些就是我第一次演講中，講到兩個種族間廣大問題時，我所主張的若干意見，自從那時以後，我就沒有在任何要點上改變我的意見過。

在我年輕時，一聽見別人說黑人不好，或主張用方法壓迫黑人，或奪去黑人完全發展的機會，心中總不免懷恨。現在，我一聽見誰想阻礙別人的發展，我就可憐這位要這樣做的人。我知道，這種人所以會有這種錯誤，是因為他自己缺少着發展到最高地位的機會。我可憐他，因為他要想阻礙世界的進步，因為我知道人類的發展和不息的進境，終究要使他覺得他那軟弱而狹窄的地位為可恥。誰想將自己的身體，橫在軌道上，以阻止一部鐵道列車的進行的，誰就不妨去阻止世界的發展，世界發展的方向是在給人類更多的智力，更多的文化，更多的技巧，更多的自由，並且在擴大着更多的同情，和更多的友愛。

我在馬提松全國教育會所作的演講，將我在北方廣大地方介紹了一下，此後不久，便有許多機會到來，要我在那裏演講。

然而我切望着，我也可以有機會直接向代表的南方白人演講。一八九三年，一個機會，似乎一個從此發軔的機會，果然來了，那時有「基督教工作者」在佐基亞州阿特蘭塔城發會請帖來的時候，我正在波士頓有事，似乎一時不能往阿特蘭塔去演講。可是，我仔細研究過我的時地表以後，我覺得我可以在開講前約三十分鐘，由波士頓乘火車到阿特蘭塔，我也可以在另乘一部火車回波士頓之前，在那裏就攔約六十分鐘。邀我在阿特蘭塔作演講的請帖，規定我演講的時間是五分鐘。那末問題便成了這樣：究竟我如此奔波前往，只作五分鐘演講，能否使我盡量發揮，收到相當的價值。

我知道，聽衆大都是最有勢力的男女白人階級，因此這也許是難得的機會，使他們知道我正在塔斯歧基所做的事情，並且向他們談談種族間的關係，所以我就決意前往。我對二千個聽衆講了五分鐘，其中大多數是南方和北方的白人。我所講的，似乎得到了稱讚。明天的阿特蘭塔報紙上對我的講辭都有友誼的評語，國內多處，也有許多評論。我覺得我總算達到了一些目的，能夠給南方有勢力的階級聽到我的話。要我作公衆演講的請求繼續增加着，一半是由於我的同胞，一半是由於北方的白人。我除了塔斯歧基的緊要工作以外，我總盡量騰出我的時間來，應付這些演講。在北方的演講，大都有着直接的目的，向他們勸捐，以維持本校。至於對黑人同胞所講的，就是要他們知道，除了學課和宗教的訓練以外，還須注重實業與專門教育。

現在我要談談我一生中似乎引起最大興趣的一件事來了，這件事也許可以說，比了任何別件事，更能使我獲得「全國的」名譽。這是指我在阿特蘭塔棉業與國際展覽會開幕時的演講說的，該會開於一八九五年九月十八日，地點在佐基亞州阿特蘭塔城。

關於這件事，已經有人談過並寫過不少的話，關於這次的講辭，也已經有許多問題問過我，所以我想也許可以在此講得詳細些。我由波士頓趕往阿特蘭塔所作的五分鐘演講，就是給我機會，使我再作這第二次演講的主因。一八九五年春，我從阿特蘭塔的著名人物那裏，接得一個電報，要我陪同一個委員會，由那裏往華盛頓去，向國會中某委員會，請求政府幫助博覽會。國會中該委員會，是由佐基亞州最著名，最有勢力的二十五個白人組織成功的。我們的委員會委員，則除了格蘭特 (Grant) 主教，干斯 (Gaines) 主教，和我自己以外，都是白人。市長和若干其他州城的官吏，都在國會委員會面前發言。以後就是兩個黑人主教發言。我的名字在發言人名表的末尾。我從來沒有在這樣一個委員會面前出現過，也從來沒有在首都作過任何演講。我有許多不安，例如我應該說些什麼，我的說話將給人什麼印象。我現在已不記得我所說的詳情，我只記得我用我在語言上所能運用的誠懇與清楚，使該委員會發生印象，假使國會要想作一些事情，以便解決南方的種族問題，而使兩個種族互成好友的話，牠就應該用各種適當的方法，鼓勵兩個種族物質的和智力的增長。我又說，阿特蘭塔博覽會，可以給兩個種族一個機會，來表示牠們自從釋放

黑奴以後，有了什麼進步，同時也可以給牠們鼓勵，使牠們會更加進步。

我還竭力申說這樣的事實，就是既然不應該用不正當的方法，來剝奪黑人的選舉權，僅僅的政治鼓動，便也不能挽救他，他必須有財產、殷勤、技巧、經濟、智力和人格，作為投票的後盾，任何種族，沒有了這些東西，總是不能永久成功的。我又說，國會在撥出經費的時候，可以做一些對於兩個種族有真正永久價值的事情，而且這也就是內戰結束後，第一次的偉大機會。

我講了十五或二十分鐘，在講畢之後，出於意外地我受到了佐基亞委員會和在場其他議員的誠懇祝賀。該委員會一致同意，製成了有利的報告，在數天之內，議案通過了國會。議案通過，阿特蘭塔博覽會的成功就確定了。

華盛頓去後不久，博覽會的董事便議決，由黑人在會中建築一座大而動人的黑人館，全部用以表示黑人在解放後的進步。後來又議決，該館完全由黑人工程師打樣並建築。這個計劃後來果然實行了。在式樣、美麗和一般修整上，黑人館和其他各館都是同等的程度。

等到議決另辦黑人展覽會之後，又發生了誰來負責的問題。博覽會的職員們，都很希望我來負這個責任，但我不能答應，因為那時在塔斯岐基的工作，需要着我的時間和力量。大半爲了我的意見，後來就舉了弗基尼阿州林赤堡 (Lynchburg) 的彭 (T. Garland Penn) 先生，作了黑人部的主任。我盡了我

的力幫着他。黑人展覽會據全體看來，是偉大而可稱讚的。這一部中的兩次展覽會，最能吸引人注意的，是由哈姆普吞學院和塔斯岐基學校所辦的兩次。在黑人館中對於所看見的事物而表示其最驚奇而又最愉快的神情的，都是南方的白人。

博覽會開幕的日子近了，董事會就開始準備開幕禮的秩序。在每天討論這秩序의 各種事項中，發生了一個問題，就是在開幕演講中，似乎應該放一個黑人進去，因為在博覽會中，已經請黑人作了許多事。還有人主張，假使這樣做，就可以顯出兩種族間所盛行的好感。當然，反對承認黑人有這樣權利的，也不乏其人。但是董事會中人，本來是南方最優秀而最進步的分子，到底不為所動，表決在開幕日邀請一個黑人演講。第二件要解決的事情，便是誰可以代表黑人。董事們將這個問題討論了幾天之後，終於一致表決，請我作開幕演講的一員；又過了幾天，我接到了正式的請帖。

請帖的接到，使我發生了責任之感，沒有處在我地位的人，總不能知道這感覺。那末這請帖來時，我究竟有什麼感覺呢？我記得我曾作過奴隸；我的幼年曾在最窮苦最愚蠢的環境中過着，我很難有機會，可以準備我自己來適應這個責任。到現在還不過只有幾年，幾年之前，現在聽衆中任何白人，都可以將我當作他的奴隸；我從前的主人中，也許正有幾個人這次會來聽我演講。

我也知道，這是黑人歷史上的第一次，居然我們同胞中有一個人，會被邀請，在任何重要的國家大典

中和白人男女在同一個講臺演講，我現在被邀請，要在那南方白種名流富翁，我從前主人的代表者，這些聽衆面前演講。我也知道，一方面聽衆的大部分是南方人，而北方白人和我同胞中的男男女女，爲數也是不少。

我決意，若是我的心底裏覺不到真實的和正確的話，我就不說。請帖來的時候，對於我究竟應該說或不應該說的，一句提示也沒有。在這方面，我覺得董事會很看得起我。他們知道，只要用一句話，我就可以大大地破壞博覽會的成功。我也很痛苦地覺察到，我既然在我的言詞中，必須要對我的同胞忠實，那末說不定我就會發出什麼不合時宜的言論來，以至第二次，或以後多少年，再也不會有同樣的邀請，來加到黑人的身上。我也同樣決意，在我要說的話中，要對北方人忠實，並且對南方優秀白人忠實。

南方北方的新聞紙，都已在討論我未來的演講，等到時期愈近，討論便也愈普通。南方白人報紙中，對我的演講抱不友誼的態度的，亦不在少數。我從我的同胞方面，接到了許多意見，告訴我應該說些什麼。我自己盡力爲這次的演講準備着，可是九月十八日的時期愈近，我的心也愈覺其沈重，而且我也愈加怕怕我的努力只是失敗與失望。

請帖來的時候，正是本校學年開始的時候，我正非常忙着學校的工作。我預備好了我的演講詞以後，接着我對付一切我認爲特別重要的演講辦法，將牠給我的妻子看，她贊同了我所要說的話。九月十六日，

在我動身往阿特蘭塔去的前一日，有許多塔斯岐基的教員，都要聽我的演講，我就答應在一個團體中讀給他們聽。我這樣做了，又聽了他們的批評意見之後，我才有些寬心，因為他們似乎覺得我的演講還不差。

九月十七日早上，我連同我妻子和三個孩子，動身往阿特蘭塔去。我的感覺，很像一個人往斷頭臺去的感覺。穿過塔斯岐基城的時候，我遇到了一個住在離鄉間不遠的白種農人。這個人帶着取笑的態度說：「華盛頓，你已經對北方白人，南方黑人，和我們南方鄉下白人演講過；但是你明天在阿特蘭塔，要對北方白人，南方白人，和全體黑人演講了。我想你到了那時要吃不消罷。」這個農夫所形容的情形很對，但是他的老實話一些也不能加增我的安心。

在我們由塔斯岐基往阿特蘭塔去的道中，黑人和白人都到火車裏指出我來，任意在我聽得見的時候，談論明天要發生的事情。在阿特蘭塔有一個委員來迎接我們。我在這個城裏，差不多一下火車就聽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個相近的黑種老人所說的這樣的話：「那位就是明天要在博覽會裏演講的我們黑同胞。我也要去聽他演講。」

阿特蘭塔這時的確擠極了，有本國各地來的人，外國政府的代表，和軍政各機關的人員。晚報上用觸目的標題，預示着明天開幕的節目。這些情形，都只是加增着我的負擔。那夜，我沒有睡多少覺。明天上午，天亮之前，我又仔細溫習了一遍我的演講詞。我也跪下來，祈求上帝祝福我的努力。也許就在這裏，我應該說

明，我早就有此習慣，在任何時機上，在我出席演講以前，我一定先要祈求上帝祝福我的演講。

我時常也按着習慣，對於每一次演講，都作特別的預備。兩次的聽衆總不會恰正相同。我的目的是要達到每一個聽衆的心底裏，和他的心說話，盡力當他是我的知己。我在對一個聽衆演講的時候，我一些不管我說的話要在新聞紙上，或別一個人，發生什麼影響。那時，在我面前的聽衆，就此吸收了我全部的同情、思想和能力。

上午很早的時候，一個委員來陪我到我在遊行中的位置去。遊行是往博覽會會場去的。在這次遊行中，有許多坐着車子的著名黑人，和若干黑人軍隊。我注意到，博覽會的職員們，似乎一直留心着遊行中的全體黑人，是否處在適當的地位，受着適當的待遇。遊行大約三小時，方才走到博覽會會場，在這些時間內，太陽直射着我們，熱得很叫人難過。我們到會場時，熱力和我的神經不安，使我覺得我好像就要倒下來，樣子也覺得我的演講一定不會成功的了。我一走進到演講廳，我就看見裏面擠滿了上下各色人等，外面還有走不進來的幾千人。

該廳很大，很適於公衆演講。我走進該廳時，聽衆中的黑人發出了有力的歡呼，若干白人則發出了微弱的歡呼。我到阿特蘭塔以後，早就有人告訴我，雖然有許多白人要來聽我的演講，他們不過出於好奇心而已，此外其他要來聽的人，也許是對我表着完全的同情，而且更有不少人，他們來聽的目的，不過要看看我

當場出醜，或者至少來聽我講些笨事情，那末他們就可以對那些邀請我演講的職員說：「我早就對你說過了！」

塔斯岐基學校董事之一，我的知友包爾得文 (William H. Baldwin, Jr.) 君，那時是南方鐵道公司的總經理，這天也剛巧在阿特蘭塔。他看到我就要受到的待遇，和我的演講就要發生的影響，他的神經緊張得很，以致他不能叫自己走進房子裏來，只在外面的場地上前後的走着，直等到開幕禮完畢才停止。

第十四章 阿特蘭塔博覽會演講

前章已經說過，阿特蘭塔博覽會請我作黑人代表，前往演講。該會開幕時，第一個作短短演講的是州長部羅克 (Bullock)。接着便是許多有趣味的節目，其中有佐基亞州納爾遜 (Nelson) 主教的祈禱，豪埃爾 (Albert Howell) 的落成詩，該會會長和婦女部部長湯卜遜 (Joseph Thompson) 夫人的演講，此後便由部羅克州長介紹我說：「今天我們有一位黑人企業和黑人文明的代表。」

我立起來開口的時候，場中歡呼甚盛，尤其是黑人。據我現在所記得的，在我心裏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說出一些話來，將種族間的友誼膠合，並且使牠們間發生誠意的合作。關於我那時的環境，我現在惟一記

得清楚的事，是我立起來的時候，我看見幾千隻眼睛，都用力看着我的面孔。以下是我的演講詞——

會長先生，董事會各位先生，各位國民。

南方人口的三分之一是黑人。任何企業，要想使南方獲得物質的、文化的、或道德的幸福的，假使不注意我們人口中這一部分，就得不到最高的成功。會長先生和董事先生們，我不過要將我們黑人的心情告訴你們，我可以說，美國黑人的價值和人格，給人們認得更清楚，更博大的，在牠各時代的進步上，就是藉着這次偉大博覽會的諸位先生。這種承認，將比了我們釋放以來任何事情，更會膠合兩個種族間的友誼。不但這樣，而且此地所給予我們的機會，將喚起我們實業進步的新時代。我們本來是無知而無經驗的，所以在我們新生活的最初數年中，我們只從頂上而不從底下開始，也就不足為奇；我們只想在國會和州立法院中獲得一個位置，不高興注意真正的財產或實業的技巧；只以為政治的宣傳運動，比了開辦牛奶棚或運貨汽車場更為有味。

飄流在大海裏許多天的船，忽然看見了友愛的舟楫。在那不幸的船的桅杆上有着一個信號：「水，水；我們渴死了！」友愛的舟楫上就立刻有回答來說：「就在你們的地方放下你們的水桶來！」第二次的信號「水，水；送水給我們！」又從那遭難的船上發出來了；所得的回答是：「就在你們的地方放下你們的水

桶來。」第三次和第四次信號所得的回答，也是「就在你們的地方放下你們的水桶來。」難船的船長，終於聽懂了對方的說話，將他的水桶放下來，所取起來的是亞馬孫（Amazon）河口新鮮的清水。我們的同胞，有些人一定要在外國地方改良他們的地位，而他們卻看輕了和他們鄰居的南方白人發生友誼，我就要對這些人說：「就在你們的地方放下你們的水桶來」——那就是說，用各種正當的方法，將這水桶放下去，和環繞我們四週的各種人做朋友。

將這水桶放下到農業、機械、商業、家庭服務和各種事業中去。關於這方面，我們應該記得，凡是一談到純粹而簡單的營業，不論南方人曾犯過什麼罪，到底給黑人在商界上有巨大的機會的，還是南方人；本次博覽會，對於這個機會，尤其在再三致意着。我們最大的危險是我們由奴隸一躍而進入自由的過程中，我們忽視了一種事實，就是我們大都是藉着用手工生產而生活的，沒有想到，我們學着看重普通勞力，並將腦力和技巧，放入普通生活中，就可以獲得相當的繁榮；沒有想到，我們學着在虛浮與實際，在誇飾與有用之間，自爲決定，也就可以獲得相當的繁榮。不論那一個種族，要是牠沒有知道耕田和作詩一樣可貴，牠就不會繁榮。我們所必須從以開始的地方，是底下，不是頂上。我們也不可以由我們的困苦，來掩蔽了我們的機會。

白人中也有些人，爲了南方的繁榮起見，正在眼看着那些風俗習慣不同的外來者，假使可以的話，我

也要用對我自己同胞的話對他們說，「就在你們的地方，放下你們的水桶來。」就在八百萬的黑人中，放下水桶來，他們的習慣是你們知道的，他們的忠實和仁愛，也是你們在被證爲叛逆而將傾家蕩產時試驗過的。在這些人的裏面，放下你們的水桶，他們不罷工，不發生勞工戰爭，只耕種你們的田地，清理你們的森林，建築你們的鐵道與城市，從地下取出寶藏來，幫着使南方的進步，有極大的可能。你們在我們黑人中放下了你們的水桶，你們在這裏工作的時候就幫助着鼓勵着他們，並且教導他們的心手腦，你們就可以知道，他們會購買你們剩餘的土地，會在你們田地的廢墟中開出花來，會活動你們的工廠。你們這樣做，你們和你們的家庭，將來就會和從前一樣，有世界上最忍耐、忠心、守法，而不抱恨的人來環繞着。我們在從前撫育着你們的兒童，伺候着你們父母的疾病，時常還滿眼含着眼淚，送他們入墳墓，因此證明了我們對於你們的忠實，所以在將來，按着我們卑微的方法，我們還要用外國人所不會有的熱誠幫助你們，如果必要的话，也準備捨了我們的性命來保護你們，將我們實業的、商業的、文化的、宗教的生活，在混合兩個種族利益爲一的方法上，和你們的種種生活交織着。在純粹社會的事情上，我們可以像手指那樣的分開來，但在促進互相進步的各種主要事件上，我們便只是一隻手。

除了大家都有最高的智力和發展以外，我們中任何人便得不到保護和安定。假使什麼地方，有什麼力量，要想阻礙黑人的完全發達的，願這些力量會改變過來，會將黑人刺激、鼓勵，並且使他成爲最有用而

最聰慧的國民。這樣投資下去的力量或資財，一定可以獲得百分之一千的利息。這些力量將受到雙倍的祝福——「祝福施捨的人和受取的人。」

由人的或上帝的定律看來，總免不了不可抗的事實——

公道的定律，永不變動，

將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束在一起；

我們要像罪與困苦一樣，

並着肩走向運命而去。

差不多有一千六百萬隻手，要來幫助你們，將擔子拉起來，否則就要來反對你們，將擔子拉下去。我們將要占南方的罪惡和愚蠢，到三分之一以上，否則就要占南方的進步與智力到三分之一；我們將要對南方實業的和商業的繁榮，供獻三分之一，否則我們將要成爲死的機體，呆滯着、墮落着、阻礙着政治機體的各种進步。

博覽會的先生們，我們現在將我們的卑微努力，在展覽我們進步的會中呈給你們看，請你們不要期望過高。三十年之前開始時，只有（由各種來處採集的）一些花絮、南瓜和雞雛，現在是有種種發明，造出種種農具、馬車、汽機、新聞紙、書籍、雕像、雕刻、繪畫，並且會管理藥房和銀行了；可是記好，由前一時代而進入

後一時代的途徑，是筆路藍縷，經過一番開闢的苦工的。我們雖然以我們所展覽的當作我們獨立努力的結果，而覺得自傲，我們卻一刻也沒有忘記，我們在這展覽會中所作的事情，將大失你們的期望，還時常需要你們在我們的教育生活上作幫助，不但是需要南方諸州，尤其需要北方的慈善家，他們已將他們的禮物，作成了祝福的和鼓勵的不息長流。

我們同胞中最聰明的人，知道激起社會平等問題，是極端的愚笨，知道將來我們各種特權的享受，必須是嚴格而不息奮鬥的結果，不是人力強迫的成效。不論那一個種族，會對世界的市場作過任何供獻的，總不會被人逐出的。各種法律上的特權，我們都可以享受，當然是重要而正確的，但是尤其重要的，我們必須準備好，會運用這些特權。現在在工廠裏賺得一塊錢的機會，其價值之大，遠非將來在歌劇院中用去一塊錢的機會所能及。

總結起來，我可以再說一遍，三十年中，給我們更多的希望與鼓勵，使我們更接近你們白種人的，再沒有比得上這次博覽會所提供的機會的；你我兩個種族，都是在三十年之前赤手創始我們的事業的，我現在俯在祭壇上，這祭壇是代表着你我兩個種族奮鬥而獲得的結果的，我預諾着，你們努力將上帝放在南方人門前的錯綜大問題，與以實行，你們便時常可以獲得我們同胞那種忍耐的、同情的幫助；只有時常將這點記在心裏，那末，由於這些房子中所陳列着的田地、森林、礦藏、工廠、文學、藝術的種種產物，才會有許多

善事發生，才會有超乎物質利益的更高尚的善事發生，我們祈禱上帝能，在消滅地方意見與種族仇恨及猜疑上，在運用絕對公道的決意上，在各階級遵守法令的願意上，實現這種善事這個以及我們的物質繁榮，就會將我們所憂的南方，成爲一個新天地。

我記得我講畢之後的第一件事，是部羅克州長衝過講臺來和我握手，其他的人，也這樣做。我受到許多真誠的祝賀，甚至我走不出房子。但是我的演講究竟給人有多少印象，直到明天上午我走到本城商業區後才知道。我一被人認出來，我就出於意外地被一羣人指着包圍着，他們都要和我握手。這種情形，不論走到那一條街上都如此，以致我受累無窮，只好回到我的寄宿處。明天上午我回塔斯岐基。在阿特蘭塔車站，差不多在這裏往塔斯岐基去的火車要停的一切車站，我總看見一羣人，都要緊和我握手。

美國全國的新聞紙，都把我的演講完全登出來，以後幾個月，評論方面都時常會引證到牠。阿特蘭塔憲法報 (Constitution) 的主筆豪埃爾 (Clark Howell) 打電報給一家紐約報館，其中有這樣的話：「我一些不是言過其實，我要說，昨天華盛頓教授的演講，在性質和在爲人歡迎上講，是南方聽衆第一次聽見的最著名演講之一。該演講是一種啓示。全篇言詞是一個講臺，在這上面黑人和白人都可以用彼此完全的公道站立着。」

波士頓騰寫報 (Transcript) 的評論說：「本星期漢各爾·華頓盛在阿特蘭塔博覽會的演講詞，似乎使其他節目和博覽會本身，都落在牠的背後。牠在新聞界中所引起的趣味，是至上無比的。」

我不久就接到各種演講局、雜誌和新聞紙主筆的邀請，為他們演講和寫文章。有一個演講局，假使我願意在他們指定的時候作演講，肯給我五萬元，或者每晚二百元，外加雜費。我對這些來信的答覆，就是說我的終身工作是在塔斯歧基；不論什麼時候，我演講起來，總要為着塔斯歧基和我們黑人的利益，我不願意作什麼僅僅有關商業價值的服務。

演講後若干天，我送了一分演講詞給美國總統克利夫蘭德 (Grover Cleveland)。我接到了他寫給我的親筆信如下：——

一八九五年十月六日。

馬州，巴乍德灣，格累·加布爾斯 (Gray Gables, Buzzard's Bay, Mass.)

華盛頓先生：

親愛的先生謝謝你，送給我一分在阿特蘭塔博覽會你作的演講詞。

熱誠的謝謝你作了這次的演講。我已經用心讀過牠，我想該會會請你來作這個演講，實在是很好。你的說話，是可以使那些希望你們種族好起來的人，得到愉快和鼓勵；如果我們的黑種同胞，沒

有從你的言詞上，採獲新希望，造成新決心，利用他們的國民地位，來獲得各種有價值的利益，那才真正奇怪呢。

格羅夫·克利夫蘭德謹啓。

後來，克利夫蘭德總統來參觀阿特蘭塔博覽會的時候，我第一次見到了他。由於我和其他諸人的請求，他同意在黑人館中費上一小時，以便檢視黑人展覽會，並給在場的黑人，和他握手的機會。我一見到克利夫蘭德君，我就因他的簡樸、偉大和拙實，受到了印象。此後，在公衆地方和他普林斯吞（Princeton）的私宅裏，我又見過他許多次。我愈多見他，我便愈加崇拜他。他參觀阿特蘭塔黑人館的時候，在那一小時之內，他似乎對黑人用了他的全副精神。他很審慎地和若干襁褓不堪的古老的黑「嬉嬉」握手，並且握手也非常愉快，一切情形，就好像他是在對什麼百萬富翁致其問候。許多黑人更利用機會，請他在書上或紙片上簽名。他簽的時候，非常審慎而耐心，好像在將他的名字簽在什麼重大的國務文件上。

克利夫蘭德君不但在許多個人事務，對我表示他的友誼，並且時常肯爲了我們的學校，聽我的請求，作任何事。不論這是他自己的贈與，或用他的力量去獲得別人的贈與，他都這樣做過。由我和他私人的交往看來，我不相信他會存什麼種色偏見在心裏。他是太偉大了，所以決無此心。在我和別人的接觸中，我覺得只有眼孔狹小的人，才有此心，他們爲自己而生活，從來沒有讀過好的書，不出去旅行，從來沒有開放他

們的靈魂和其他的靈魂相接觸，和偉大的外面世界相接觸。一個人的眼光爲種色束縛了，就不會接觸到世界上最高尚，最佳美的事物。在許多地方，我會見他人的時候，總覺得最幸福的人是那些最幫助他人的人；最苦惱的人，是那些最少幫助他人的人。我也覺得，能夠使人眼光狹窄而成爲種族偏見的事情，假使有的話，爲數甚少。每星期日的晚上，我在禮拜堂裏和學生們談話的時候，我時常對他們說，我日子過得愈多，我的世事經驗便愈多，我也愈加相信，畢竟最值得爲了牠而活——假使必要的話，爲了牠而死——的事，是使別人更爲幸福，更爲有用的機會。

黑人和黑人新聞紙，對於我的阿特蘭塔演講，和這演講的受人歡迎，最初似乎是很欣慰的。但是第一陣熱心過了之後，他們再讀我的演講詞，其中有些人便似乎覺得他們受到催眠了。他們似乎覺得我對南方白人的話，太自由了，我沒有爲他們所稱的黑人「權利」作強硬的言論。就我黑人同胞中某一部分人而論，曾有一時，發生了反動，但是後來，這些反動分子似乎又趨向了我，贊同着我的信念和活動。

講到公衆心情的改變，我記得大約在塔斯基基立校後的十年，我有着一個永不會忘記的經驗。那時普利馬斯 (Plymouth) 教會的牧師，曠觀報 (Outlook) 那時稱爲 Christian Union) 的主筆阿善

特 (Lyman Abbott) 博士，請我爲他的報紙寫一封信，根據着我的觀察，述說南方黑人牧師們在心理和道德上的正確狀況。我寫了那封信，將我所看到的正確事實，說了出來。我所描寫的，不免是黑色方面的

或者爲了我是黑人，我應該說是「白色方面的」罷？一個種族，脫離奴隸地位還只有幾年，一個種族，還沒有時間和機會來產生健全的牧師界，當然不能對牠說什麼別的話了。

我所說的話，立刻就達到了國內每一個黑人牧師的地方，我從他們地方接到的斥責信，不在少數。我發表了那封信之後的一年中，任何黑人宗教團體的每種敍會，在閉會之前，總要通過一個議決案，斥責我，或者叫我取消或修正我所說的話。這些團體中有許多團體，甚至在他們的議決案中，規定要勸告黑人父母，不要將他們的兒女送到塔斯歧基來。某次敍會，更甚至派出一個「宣教師」叫他專門警告人們，不要將他們的兒女送到塔斯歧基來。這位「宣教師」恰正有一個兒子在本校，我注意着，不論這位「宣教師」對別人如何說，如何作，他總很審慎，不將他的兒子領出本校。許多黑人報紙，尤其是那些宗教團體的機關報，也一致附和着斥責我，或者要求我取消前言。

人家憤激儘管憤激，批評儘管批評，我一概不管，不說一句解釋或取消的話。我知道我是對的，過了幾時，他們再想想，就會明白我了。沒有多久，主教們和其他教會領袖，就開始仔細調查牧師界的情形，他們才覺得我是對的。真的，在美以美會某支會中，有一位最年長而最有勢力的主教，還說我的話太客氣了。很快的，輿情方面也自己覺悟了，要求着牧師界的澄清。這事還沒有用什麼方法辦理完全的時候，我想我可以不帶一些自私的說，而且也有許多最有力量的牧師對我說，我的話很可以引起大家的要求，使講經臺上

有更好的牧師。這許多人本來是斥責我的，現在居然爲了我的坦白言詞來謝我了，我覺得很滿意。

黑人牧師界態度的改變，就我自己看來，現在是可以說很完全的了，所以我在教士界中所有的朋友，比了任何階級中更爲熱烈。黑人牧師在人格與生活上的改進，是黑種進步上最可感謝的事實之一。我和他們的經驗，以及我學生中的其他事項，都使我相信，一個人覺得他的言行是對的，而爲人斥責的時候，最好的辦法就是堅持不讓，並且不作一言。如果他是對的，時間就會將牠顯示出來。

關於我在阿特蘭塔所作的演講，大家還在討論得很熱烈時，我接到了約翰·荷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校長岐爾曼 (Gilman) 博士的一封信；該信就在下面。岐爾曼博士是當過阿特蘭塔博覽會給獎評判會的主席的——

一八九五年九月三十日，

包爾提摩爾 (Baltimore) 約翰·荷普金斯大學校長室。

親愛的華盛頓先生：你肯不肯作阿特蘭塔教育處給獎評判會的一個評判員？如果肯的，我就將你的名字放在評判員名單中。請來電通知。

岐爾曼謹啓。

我想我接到這個請帖，比了接到請我在博覽會開幕時演講的請帖，覺得還要出於意外。我要是做了

評判員，那末我的責任不但要去檢查黑人學校的展覽，就連白人學校的展覽，也要去檢查了。我接受了這個位置，就在阿特蘭塔費了一個月的工夫，執行着我的職務。評判員的全體，人數很多，有六十人，平均分配着，一半是南方白人，一半是北方白人。其中有大學校校長，著名科學家和文學家，和許多專家。我所共事的各評判員敝會組織的時候，其中一個會員培治 (Thomas Nelson Page) 君，提議舉我為那一部分的書記，這提議一致通過了。那一部分中，南方的白人差不多佔了一半。在我執行職務，檢查白人學校的展覽時，我在各方面都受到尊敬，在工作完畢時，我和我的同工者分別，頗有悵然之感。

常常有人要我對於我們自族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前途，自由發表意見。我在阿特蘭塔的種種經驗，使我有機會簡單的發表出來。雖然我從來沒有用這許多話來這樣說過，我自己的信仰是，總有一天，南方的黑人會獲得一切政權的，只要他們的能力、人格、和物質的所有，都能使他們作如此的獲得。我想，自由運用這些政權的機會，雖然不會藉着外來的或人為的迫促，而大量的發生，但是南方白人自己，總是肯給與黑人的，總是肯在這些政權的運用上，保護他們的。南方人本來有一種感覺，以為他們是在受着「外國人」或「外來人」的壓迫，以為在做着他們所不願意做的事情，我相信只要他們肯將這個舊感覺一取消，我上面所說的改變，馬上就會開始的。的確，已經有許多徵示，可見改變已在輕微地開始了。

待我解釋明白我的意思。假定在阿特蘭塔博覽會開幕前幾個月，南方以外的新聞界和輿論方面，都

要求在開幕秩序上，給黑人一個地位，也要求黑人作一個給獎委員。這樣，就可以算是看重黑人麼？我不以為然。阿特蘭塔官吏所做的也不如此，因為他們覺得他們既看見了黑人的長處而給以獎勵，既是愉快之事，也是應為之事。可見人類的天性中，總有着我們不能抹殺的東西在裏面，這東西總能使一個人到底對於別一個人的長處，不論其人是什麼種色，總要加以承認和獎勵的。

我相信黑人的本分——本族中大部分人所已在做的——乃是對於政治的要求，要倚賴着那些遲緩而確實可靠的影響，審慎自處，以便獲得他們政權的完全承認，那些影響是從握有財產、智力和高尚的人格而來的。我想政權的完全運用，將要是自然而逐漸發生的事情，不是短期間暴發的事情。我不相信黑人應該停止投票選舉，因為一個人不能藉停止投票而學會自治的運用，正如一個孩子不能避開了水而學會游泳一樣，我只相信在他的投票中，他就會受到他鄰居在智力和人格上的影響。

我知道有些黑人，藉着南方白人的鼓勵、幫助和勸導，已經積聚到值數千元的財產，但是他們同時卻總沒有想到，往白人地方去，對於投票選舉的事情，請教一下。這事照我看來是不聰明而不合理的，應該不再會發生。我這樣說，我卻並不以為黑人應該諂媚白人，或不照主義投票，因為他要是不照主義投票，他立刻就會喪失南方白人的信任和尊敬。

我不相信，任何一州，竟會制定法令，許一個無知識而又貧苦的白人有選舉權，卻不許這樣的黑人有

選舉權。這樣的法令，不但不公平，一定會像其他不公平的法令一樣，將來總有反動之一日；因為這樣法令的結果，無異鼓勵黑人去獲得教育和財產，而同時卻鼓勵白人，一直無知而貧困。我相信將來，藉着聰明種族友誼的合作，南方一切投票選舉的欺騙方法，總就會停止。因為事實很顯然，白人使一個黑人在選舉時受了欺，他立刻就會用同樣的方法來欺騙其他的白人。這樣一來，這位慣作欺騙的白人，自然會弄到盜竊他人的財物，或者犯同樣的大罪，來斷送他的前途了。據我的意見，將來總有一天，南方會鼓勵牠的全體國民，都有選舉權。將來從各種觀點上也一定可以看出，有着健全而有力的生活，總要比有着政治的沈滯，來得值得些，這些沈滯是由於一半的人口，沒有權參加政治而發生的。

我當然相信普及的自由選舉權，但是我相信，我們在南方至少有一時期，用着教育試驗，或財產試驗，或兩者的聯合試驗，有着一些特殊情形，在許多州中來保護着投票；不過不論要用什麼試驗，這些試驗對於兩個種族，都應該相同而十分公平。

第十五章 公眾演講的成功祕訣

至於我在阿特蘭塔的演講，怎樣受博覽會會場中的聽衆歡迎，我想我還是讓著名的戰事記者克利

爾曼

(James Creelman)

君來說出罷。他是在場的，有下列的電報打給紐約世界報 (World) ——

九月十八日，阿特蘭塔

克利夫蘭德總統今天在格累·加布爾斯 (Gray Gables) 等着，以便放出電氣火花來爲阿特蘭塔博覽會開幕的時候，有一個黑種摩西 (Moses) 站在大羣白人聽衆之前，發出了一篇足以在南方歷史上劃一新時代的演說；還有一隊黑人兵，和佐基亞與盧伊西安那 (Louisiana) 的國民軍，一同排隊而進。全城爲了這兩件空前大事的實現，今夜興奮非凡。自從格累提 (Henry Grady) 在紐約的紐·英倫會中，大足以表示新南方精神的不朽演講以來，或者可以說，除了博覽會本身的開幕以外，就沒有別的事情發生過。

阿拉巴馬塔斯歧基黑人實業學校校長華盛頓教授，立在演講廳的講臺上，太陽由聽衆的頭上照進了他的眼睛，他的全面發着預言之火的光輝，這時，格累提的後繼者豪挨爾 (Clark Howell) 對我說，「那個人的演講詞，是美國道德革命的開始。」

一個黑人，在任何重要的時機，能在南方白種男女聽衆之前，作一回演講的，這還是第一次。這演講使聽衆有如觸電，他的話好像是從旋風的咽喉中發出的。

大衆的眼睛轉到坐在講臺前列一個長而黃褐的黑人身上時，湯卜遜 (Thompson) 夫人剛剛坐上了座位。這是華盛頓教授，阿拉巴馬塔斯歧基師範實業學校的校長，從此以後，他必須算作美國黑

人的傑出人物了。岐爾摩 (Gilmore) 的軍樂隊奏着『星光燦爛之大旗』 (Star-Spangled Banner) 聽衆歡呼着。樂調轉到了提克西 (Dixie) 聽衆高叫着『Hi-yis!』音樂又變了，這時是『揚基多特』 (Yankee Doodle) 鬧聲才低了下去。

這時數千聽衆的眼睛，一直直視着這位黑人演說家。奇事發生了一個黑人爲了他的同胞講話，誰也不去攔阻他。華盛頓教授跨步走向臺邊，低而下降的太陽，射出火焰般的光線，由窗間達到了他的面上。一陣大聲呼喊歡迎着他。他轉過頭來，以避眩目的亮光，並在臺上移動一下，以求安適。然後他將他那奇妙的面容，轉向太陽，眼臉不再閃爍，然後開始說話。

身材極爲出衆，長，骨格粗大，挺直如索族 (Sioux) 酋長，高額角，直鼻，厚頸，堅決的嘴，大而白的牙齒，炯炯的目光，以及指揮一切的態度。筋腱在他那青銅色的頸項上突了出來，他那肌肉豐富的右臂高揮在空中，勾曲着的褐手拳頭中，緊握着一枝鉛筆，他的巨足平平的放着，腳跟緊靠，腳趾外向。他的聲音清楚而實在，每講一點就動人地停頓一下。十分鐘之內，羣衆一直在熱烈奮發中——手巾揮着，杖擺着，帽子在空中拋着。這好像那位演說家已經使他們入魔了。

那時，他將那黢黑的手，手指大大地的分開了，放在頭上，向南方白人，代表他的種族說，『在純粹社會的事情上，我們可以像手指那樣的分開來，但在促進互相進步的各種主要事件上，我們便只是一隻

手，」聲音的大浪，直撞上四壁，全堂聽衆就立刻發狂般的喝起采來，那時我就想起了格累提，那天晚上，他在得爾蒙尼哥（Delmonico）大宴廳中的烟氣迷漫裏說，「我是圓頭黨（Roundheads）的騎士。」

我會聽過許多國大演說家的演說，但是即使格蘭斯頓（Gladstone）自己，也不能比了這位精強的黑人，發出更有力量的言論來，他站在太陽光輪中，四週的人，都是本來用盡方法要束縛他的種族的。吼聲也許會發得非常高，但他熱切的面容則永不變更。

一個衣衫襤褸，肌膚黑色的巨人，蹲在堂中側道的地板上，用發火的眼睛和震恐的面孔，注視着那位演說家，等到喝采的聲音，突然爆發，然後有眼淚從他的面上落了下來。聽衆中大多數黑人是哭泣着，也許正不知道爲什麼。

演講完畢以後，部羅克州長衝過講臺，握着演講者的手。另外一陣歡呼，來歡迎這種表示，這兩個人面對面，手握手的立了幾分鐘。

阿特蘭塔演講之後，只要我在塔斯岐基的緊要工作，可以給我一些時間，我總接受一些出去作公衆演講的邀請，尤其是那些進入內地的邀請，我想到那些地方去爲我們同胞演講，總是值得的，但是我去演講的時候，我總自己當心，不談我的終身工作，和我同胞的需要。我也自己知道，我不可以用職業演講家或

僅僅爲了商業的利益而演講。

我在公衆演講的努力中，我從來還沒有懂得別人來聽我演講的理由。這個問題，一直橫梗在我心內；不能排去。屢次，我在什麼街上某某房子前立定，看着許多男女女人等，走進我將往演講的大廳中去，我總覺得慚愧，我竟作了——我覺得似乎如此——耗費人家寶貴光陰的主動者。數年之前，我在威斯康星州馬提松城的一個文學會中演講。在我規定作演講的時間之前一小時，猛烈的暴風雪開始了，而且繼續了數小時。我以為聽衆總是不會有的了，我就此可以不演講的了，但爲了盡本分起見，我仍舊往禮拜堂去，那裏知道堂中竟是擠滿了人。這個意外，給了我一個打擊，竟至我全夜爲之不安。

人們時常問我，在演講之前，會不會神經不安，也有些人竟以為我既常常演講，我總已習慣如常了。老實說，我在演講之前，我總是因神經不安，而感到極度的痛苦的。不止一次，正在我要作重要演講之前，我的神經便大大的緊張起來，以致我灰心不再作公衆演講。我不但在演講之前覺得神經不安，並且在演講既畢之後，我總有悔恨之感，因爲我好像忘記了我本來要說的主要的或最佳的事項。

不過這種初步的神經痛苦，在我演講到十分鐘之後，就可以有極大的補償了，我那時就可以覺得，我的確控制了我的聽衆，我們彼此已經達到十分圓滿的同情地步了。照我看來，要說到心理上和身體上的共同愉快，似乎難以比得上一個公衆演說家所享受的，那時他覺得很大的聽衆，竟在他的完全控制之下。

聯絡公衆演說家和他的聽衆的，的確有着一條同情而合一的線索，這線索的強有力，正好像牠是什麼可以觸知和看見的東西。如果一千個聽衆中，有一個人不和我的意見表同情，或者有些懷疑、冷淡，或批評的意思，我就能夠找出他來。我一找出他，我總是直接注意着他，看着他的態度漸漸溶解的，確是令人大大爲滿意之事。我覺得對付這些人的最有效的方法，乃是先講一些故事，但不可以僅僅爲講故事而講故事。我以爲爲講故事而講故事，是空虛的事情，聽衆立刻會發覺的。

我相信，一個人只爲了演說而演說，對於他的聽衆和他自己，總是不應該的事情。一個人假使不是在他的心底裏，覺得的確有所欲言，我不相信這種人就可以冒昧發言。等到一個人覺得自頂至踵的確有所欲言，以便幫助什麼人或什麼事情時，那末就讓他說出來；在他說話的時候，我也不相信許多人造的演說法規條，在這些情形之下，會給他多少幫助。雖然有幾種事情，例如停頓、呼吸、音調高下，都很重要，但是都不能將一篇演講中的「靈魂」取而代之。我要演講的時候，我願意忘卻正當運用英語的一切規條，一切修詞等類規條，我也願意使聽衆忘卻這些東西。

我在演說時，覺得最窘的，便是有人離開講室。爲了要防止這個，我總是打定主義，要使我的演講非常有趣，並且要挨次說明許多事情，以便誰也不會中途走開。我已知道，普通聽衆需要事實，比了需要梗概或說教爲甚。我以爲大多數人，只要用有趣的方式，給他們事實，他們就會作成適當的結論。

至於我最喜歡對之演講的聽衆，我可以先舉出那種強有力，目光遠大的商人團體來，例如在波士頓、紐約、芝加哥和巴法羅（Buffalo）諸城所有的。我沒有看見別的聽衆會那樣迅速地了解，並且發生反應的。最近數年之內，我一直在美國的大城市裏，爲大多數這些主要的團體演講。切實把握牢一個商人團體的最佳時間，乃是在吃了一頓好飯之後，不過我總以爲人生最苦的事，便是一個演說家一定要坐着吃十四道的菜，每分鐘都擔心着他的演講，恐怕要成爲大大的失敗和失望。

我難得去參加這些大宴，因爲我恐怕忘了我自己的出身，我是住在小木屋中的奴隸兒童，我總不會忘記每星期一次吃着那由「大房子」取來的糖漿。我們在南方鄉間的食物，平常就只是玉蜀黍麵包和豬皮，只有在星期日早上，我的母親才可以得到應許，從「大房子」帶回來一些糖漿，給三個孩子吃，我吃的時候，我是多少希望着，每天都是星期日！我總將我的洋鐵盆高高舉起，等這甜物，但是我總又在糖漿倒入盆中時，閉着我的眼睛，希望我的眼睛一睜開來，可以出於意外的看見許多糖漿。等到我一睜開眼睛，我又要將盆子側來側去，使糖漿塗滿盆底，以便完全相信，糖漿果然加多了，假使這樣塗了開來，可以吃得長久些。我對於這些幼時星期日早上吃糖漿的印象非常深，甚至不論那個對我說，塗滿盆子的糖漿，並不比聚在一隻角上的糖漿來得多些，我總不肯相信。無論如何，我是從來不相信將糖漿聚在一角上的。我所得的糖漿，平常大約只有兩調羹，而這兩調羹糖漿，我卻覺得比那吃了就要去演說的十四道大菜，來得格

外開心。

次於商人團體的，我願意向南方的聽衆演講，不論那一個種族，或共同，或分開，都好。他們的熱誠與反應之速，是不息的愉快。黑人自然然而發出來的「阿們」和「那話很不差」的讚嘆，可以鼓勵任何演說家，作極大的努力。我想再次就要算到大學校的聽衆了。我曾在許多著名大學裏演講過，例如哈佛、耶魯、威廉·阿麥斯特（Amherst）、菲斯克（Fisk）、賓州（Pennsylvania）、韋爾斯利（Wellesley）、密喜干（Michigan）、北卡羅來那（North Carolina）以及其他許多大學。

我演講之後，看着許多人來和我握手，說這是他們的第一次，肯稱「個黑人的「先生」（Mist're）我，總覺得這是可以引起我深切注意的事情。

我直接爲塔斯歧基學校的利益作演講時，我平常總預先在重要的中心地點，安排好若干敘會。這樣一來，我的演講處所便是禮拜堂、主日學校、勉勵會，和男人與女人的各種俱樂部。這樣做的時候，我有時一天之內所作的演講，要有四處之多。

三年之前，爲了紐約哲塞普君和斯雷忒基金團的總代表卡利博士的提議，斯雷忒基金團，就議決撥出一筆錢來，給華盛頓夫人和我兩個人用，請我們在黑人住得很多的中心地點，尤其是從前蓄奴各州的大城市裏，給黑人開許多會。因此在最近三年中，每年我們總要用幾個星期來作這個工作。我們所安排的

計劃是上午由我對牧師、教員和職業家演講，下午由華盛頓夫人專對婦女演講，而在晚上則由我向總集的大會演講。差不多在每次的敍會中，所來的人不但是大隊的黑人，也有不少白人。例如在田納西 (Tennessee) 州的查塔努加 (Chattanooga) 城，出席大會的聽衆大約有三千人，有人告訴我，其中八百人是白人。我這樣做，我最覺得高興，而且也以為真是有成績的。

這些敍會，使華盛頓夫人和我自己，藉着到他們的家裏，他們的禮拜堂裏，他們的主日學裏，和他們工作的處所，以及監牢裏和犯罪的淵藪裏，有機會首先正確地知道黑人的真正狀況。這些敍會，也給我們一個機會，可以看見種族間的關係。開了這些會之後，對於我的本族，我從來沒有覺得這樣有希望過。我知道這些時間我所看見的，有許多是表面上的和騙人的，但是我卻有足夠的經驗，不爲僅僅的徵示或暫時的熱誠所騙。我一定要用盡氣力，帶着冷靜而如作生意的態度，事事尋根究底，獲得事實。

最近曾經有一個人說過，就黑人全體而論，黑種婦女中百分之九十是不真的，說這話的人，自以爲說得很對。這樣來斷定一個種族，這樣不用真的事實來證明，就來妄肆譏評，簡直是荒謬絕倫的妄言。

我曾在南方的腹地住過二十年，和黑人有着接觸，誰也能如我一樣的，便一定會相信，黑人在物質上、教育上、和道德上，在時時作着遲緩而確實的進步。例如在紐約，誰都可以找到一個最壞的人的生活，來證明他對於黑人所要證明的任何事情，但是大家都知道，這不是公平的試驗。

一八九七年的開始，我接到了一封信，邀請我往波士頓去，爲蕭（Robert Gould Shaw）氏紀念碑的落成禮演講。我接受了這個請帖。我很知道，我不必解釋蕭氏是誰，他做過什麼事情。該碑位於波士頓公地（Common）相近，面對着州政府。可以算本國這種藝術中最完美的作品。

落成禮是在波士頓的音樂廳裏舉行的，大廳裏面從上到下，塞滿了本城從未有過的最著名的聽衆。在這些人中，有許多都是素以反對奴制出名的大人物，藉着這個機會，有了後來再也難得的集合。那時馬州長武爾科特（Roger Wolcott）是主席，和他同在臺上的，則是許多其他的官員和數百位大人先生。波士頓的謄寫報，對於此會，會有詳細的記載，比了我的話格外描寫得好，可以錄之於下：

昨天午間在音樂廳紀念那位「人類同胞」的敝會，一切經過的核心，就是塔斯岐黑人校長的宏壯演講。武爾科特州長說，「漢各爾·華盛頓在去年六月，獲得哈佛大學的碩士學位，爲他本族中由這個最老的大學獲得這種榮譽學位的第一人，這是爲了他對他的同胞作着智慧的領導而獲得的。」華盛頓君在音樂廳中懸滿旌旗，熱烈鼓舞，愛國的，如火如荼的氛圍裏立起來的時候，大家都清楚地覺得，這裏有着馬省原來釋奴精神的極好證明；在他的本身上，有着馬省歷來不可遏制的信仰的見證；在他的健全思想和豐富詞采上，有着從前受苦與努力的王冠與榮耀。全盤景象，充滿着歷史的美麗和深切的意義。「寒冷的」波士頓爲了在牠心中因正義與真理而時常滾熱的火燄，活起來了。任何公衆敏

會看不見的人全家一定在放假日出城的人現在都成羣結隊在這地方擠都擠不下數千百個最後看見的市民他們的姓名和生命都可以代表着種種美德都可以將可貴的尊榮給與全城的現在都出來了因此全城簡直達到了大節期。

戰樂充滿了空氣一陣一陣的嗚采一片一片的歡呼來歡迎着那位雕刻家牆上校的軍官們和朋
友們聖·高頓斯 (St. Gaudens) 紀念委員會州長和他的僚屬以及走上講臺或步入大廳的黑人兵士這些兵士是屬於馬州軍第五十四隊的。李 (Henry Lee) 上校本來是安得烈 (Andrew) 州長的舊屬爲紀念委員會作了高尙的簡單的介紹詞歸功於他所代表的佛白司 (John M. Forbes) 先在武羅科特州長也作了簡短而令人不忘的演說「發格納 (Wagner) 職臺在人種歷史上劃定了一個時代將這時代歸入了人類。」崑齊 (Quincy) 市長代表波士頓城接受了這紀念碑。牆上校和他那黑人營的故事用動聽的言詞講述完了之後又唱過了

我的眼睛已看見

上主來到的光榮

然後漢各爾·華盛頓立了起來當然這正是他出現的時間羣衆平常有的雜聲立刻安靜了下來大家有着從未有過的興奮而顫抖着羣衆有十多次好像只是一個人那樣立起來歡呼而揮舞。

有文化、有美聲、有力量，而皮膚黝黑的人開始演講，說出斯騰斯 (Stearns) 和安得烈 的名字時，大家便感情衝動起來。你可以在兵士和市民的眼睛裏，看見眼淚在閃耀着。這位演說家又轉身對着講臺上的黑人兵，對着發格納礮臺的旗手，該旗手在受傷時從沒有放下的軍旗，現在還微笑着握在他手裏，說：「對於你們，對於你們這些五十四隊百孔千瘡的殘部，你們的司令並沒有死，你們這樣斷手缺足的來此出席，增加了此次大會的光榮。雖然波士頓不建立紀念碑，歷史不作記載，在你們當中，並且在你們所代表的忠誠種族中，蕭氏將。有時間不能磨滅的紀念碑。」說到這裏，當天當時羣衆情感的頂點，就此達到了。武爾科特一方面，是人民同情心的個人代表，馬州州長一方面，是主要地方官，他就第一個立起來，大喊着：「給漢各爾·華盛頓三個歡呼！」

在講臺上的諸人中，有一個是卡內 (William H. Carney) 軍曹，他是馬州紐·培德福 (New Bedford) 人，勇敢的黑人軍官，發格納礮臺的旗手，掌握美國國旗的人。雖然事實上他本營的人大半都戰死，他卻逃了出來，等到那一仗打過之後，他喊着說：「這面老旗從來沒有觸到地上過。」

卡內軍曹坐在講臺上時，這面旗還在他的手裏，我轉身向到場的黑人營的殘部致詞，並提到卡內軍曹時，他似乎出於天性地立了起來，舉起了那面旗。我真幸運，可以看見許多令人滿意而熱鬧的表示，和我的公衆演講有關，但是在戲劇似的效果上說起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或經驗過能夠和這次同樣的事

情有好幾分鐘，聽衆似乎完全失卻了自制的力量。

西班牙與美國戰事結束之後，全國都很高興，許多大城市中，都有和平的祝典。芝加哥大學校長哈爾柏（William R. Harper）那時是芝加哥慶祝會邀請委員會的主席，邀請我去作慶祝演講。我接受了這邀請，在那一星期的佳節中，我作了兩次演講。第一次也就是主要的一次，是於十月十六日星期日晚上，在演講廳裏演講的。這次到場的聽衆，人數之多，超出了我在國內任何地方所遇到的聚會；除了在這主要的演講廳演講之外，我那晚又對城中其他地方滿坑滿谷的聽衆，作了兩次演講。

據說，在大演講廳裏的，有一萬六千人，在我看來，好像門外還有許多人，要想進去。誰要是沒有警察的幫忙，簡直不能走到門口。到場的人物，除了馬金利（William McKinley）總統以外，還有國務院諸人，許多外國公使，大部分海陸軍軍官，其中有許多是在停止不久的戰爭中負有盛名的。星期日晚上的演講員，除了我之外，還有希爾什（Emil G. Hirsch）博士，荷德內得（Thomas P. Hodnett）神父，和巴羅斯（John H. Barrows）博士等。

芝加哥時代先驅報（Times-Herald）描寫該會，說到我的演講時，曾謂：

他描摹黑人寧願作奴隸，而不肯滅亡；提起阿塔克司（Crispus Attucks）在美國革命初起時流出他的血，以便美國人獲得自由，而黑色美國人則仍作着奴隸；重新話及和查克松（Jackson）在紐

門內軍人在爲着維持無教制而作戰的時候，他們保護着，維持着他們的宗教，並保護着黑人軍隊的英雄氣概。

（三）巴比倫、波斯和羅馬的歷史與教義（Roman）歐塞的勇敢，並稱讚那些黑人軍隊的英雄氣概。

（四）自由、平等和正義（Freedom, Equality and Justice）濟自由給予古時作奴隸的人，而忘卻了

他們的苦人，這就是在他們自己，他們是法律和習慣的奴隸，與着他們。

（五）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六）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七）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八）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九）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十）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十一）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十二）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十三）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十四）奴隸和自由的歷史（Slavery and Freedom）奴隸和自由的歷史，這一部分，然後他們向白種美國人的地位。

我在芝加哥的演講的某一部分，似乎受到了南方新聞界的誤會，有些南方報紙，乘機就苛刻地批評我。這些批評繼續了好幾星期，最後，我從阿拉巴馬州柏明罕（Birmingham）城年代前驅報（Age-Herald）的主筆那裏，接到了一封信，問我肯不肯說出我那一部分演講的用意來。我寫信回答他的說話，似乎滿足了這位批評家。在這封信裏，我說我已成功一定的習慣，凡是我願意在南方聽衆之前說的話，也不願意在北方聽衆之前說出來。我說我想這用不到我再作進一步的解釋；假使我在南方內地十七年的工作，還不足以作爲解釋，那末我就是再說些話，又怎能解釋得了呢。我說我這次演講的用意，是和在阿特蘭塔的演講相同的，要在「商業的和普通的關係上」消滅種族的偏見。我說所謂社會的承認是一個我從未討論過的問題，然後我又從我在阿特蘭塔關於那個题目的演講中，引證了一段。

在公衆集合的地方，會見種種擁擠的人，有一種人是我所怕的。我的意思是指有奇癖的人。現在我已經很熟悉他們了，遠遠地，正當他們在人羣中擠向前來時，我就能夠指出他們來。平常的奇癖家，有一把長而亂的鬍子，瘦而狹的面孔，穿着一件黑色外衣。衣服的前面塗着油脂，袴腳管在膝間長得如燈籠。

在芝加哥，我在每一次總會演講過後，我就遇到了這樣一位朋友。他們平常總有一些方法，可以一下子將世界上的一切壞處醫治好。這位芝加哥的寶貝，也有着一種特有的方法，他說，藉着這方法，可以使玉蜀黍保存到三四年之久，他的確覺得，假使南方黑種，能夠大家採用他的方法，就可以解決全部的種族問題。

題。我很想使他明白，我們現在的問題是教導黑人怎樣生產保存一年的足量玉蜀黍，可是任我聶焦舌敝，也是勞而無功。另外一個芝加哥癖家，也有着一種計劃，就是說，他要我和他共同努力，將全國的國立銀行都停閉起來。假使辦到這個地步，他覺得一定可以使黑人發達起來。

準備浪費別人的光陰，使之歸於無用，這樣的人，多得數不清。有一個晚上，我在波士頓對很多的聽衆演講。明天早上，有人將一張名片拿到我的房裏來，我被驚醒了，說有人急於要見我。我想這一定是什麼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急急忙忙穿起衣服，走下樓來。我走到旅館辦公室的時候，就看見一個發着呆，狀態天真的人在等着我，他冷然說：「昨夜我在一個會裏聽見了你的談話。我有些喜歡你的談話，所以今天早上我再來多聽一些你的談話。」

時常有人問我，一方面我要監督着塔斯歧基的工作，同時又時常要離開學校，我是怎樣辦法的。對於這個問題的一部分回答，我可以說，我想我至少已經學會不聽這一句古話了：「不要叫別人做你自己所不能做的事情。」我的格言卻適得其反，乃是「不要做別人也能夠做的事情。」

關於塔斯歧基學校最足以令人興奮的事情之一，乃是牠的組織非常完善，學校每天的工作，並不倚賴任何個人的到不到，全部執行機關，連教員與書記等在內，現在是八十六人。這些人都有一定的組織和

分配，所以學校的機構，每天就像鐘件那樣的進行着。大多數教員和本校都已有過多年的關係，都和我一樣關心着本校，我不在的時候，會計羅干（Warren Logan）君是執行者，他在本校也已經有十七年了。爲他臂助的，有華盛頓夫人和我那位忠心的秘書斯科特（Emmett J. Scott）君，斯科特君擔負着我的通信的全責，使我每天會和本校的生活接觸，他並且一直告訴着我，關於黑人的事情，南方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真形容不出，我何等感激他的機敏、智慧和艱苦的工作。

本校主要的執行工作，不問我是否在塔斯歧基，都集中在那我們所稱呼的執行會議。這會議每星期開會兩次，由本校九部主任組織而成。例如：女校長布盧斯（R. K. Bruce）夫人，前參議員布盧斯先生的未亡人，是該會議的會員之一，在會中代表着一切關於本校女生生活的事情。這個執行會議之外，還有一個六人組織的財務委員會，每星期開會議決本星期的費用。每月一次，有時還多些，開全體教員大會一次。在這些會之外，還有許多較小的敝會，例如腓爾普斯堂（Phelps Hall）聖經訓練學校的教員會，或農業部的教員會等。

爲了我可以時常和本校的生活接觸，我又安排好一種報告制度，一年中每天必須有本校的工作報告寄給我，不問我在國內那一處地方。藉着這些報告，我甚至知道校中已開除那幾個學生，爲了什麼原故開除的——爲了不健康或者爲了其他事情。藉着這些報告作媒介，每天我知道本校所收進的錢是少

我知道牛奶棚裏送來多少加侖牛奶，和多少磅奶油；教員和學生的膳費是多少；某種肉食究竟是煮的還是燻的，在膳堂裏吃的某種蔬菜究竟是店裏買來的，還是自己田地上生產的。我覺得人類的天性，全世界都是一樣的，有時是很容易接受誘惑，用那從店裏取來的一袋米——米粒收拾得很精潔，立刻可以下鍋——不肯費工夫和氣力，到田裏去挖洗他自己的甜薯，這甜薯只須略加收拾，也就可以替代米的。

時常有人問我，我的工作那樣多，一大部分便是對公衆演講，我怎樣會找得一些休息或娛樂的時間，而我所喜歡的娛樂或運動，又是什麼。這也可以算得一些難於回答的問題。我有着一個堅強的感覺，也是每一個人對於他自己和對於他所服務的事業所應該有的感覺，就是要保持身體的有力而健康，神智的穩定而充實，爲極大的努力準備着，也爲失望與困苦的地位準備着。我極盡我的力量，按着常例，計劃每天的工作——不但要辦好每天同樣的例行公事，並且還要將這例行公事在這一天中盡量從早結束，然後從事什麼新的或進一步的工作。我使這事成爲常例，就是在我每天離開辦公室之前，清除我寫字桌上的。一切通信和備忘錄，以便到了明天早上，我能夠開始「新的」一天工作。我也使這事成爲常例，就是從來不讓我的工作督促着我，只是我把握着我的工作，並且完全控制牠，總一直趕在牠的前面，我作主人，而不作僕人。等到你一覺得你自己已成爲你工作的絕對主人，你就會有着身體上心理上和精神上整整的享樂，覺得很可滿意而因之奮發起來。我的經驗教導我，假使一個人學會遵守他的計劃，他就可以從那悠遠

的工作中，獲得身體上的新力量和心智上的勇氣，使他強健。我相信一個人能夠發展到他愛他的工作那個地步，這樣就會給他一種最可寶貴的力量。

我上午開始工作的時候，我準備着有一個成功而愉快的日子，但是同時我也準備着自己來對付不愉快和意外的艱難。我準備我自己去聽知我們某一座校舍在失火，或已經燒完，或什麼不開心事情已經發生，或有什麼人在公衆演講或印刷品中已經斥罵了我，爲了我做過或承認過什麼事，或者爲了他聽見過我說過的什麼事——也許竟是我從未想到要說的什麼事。

在十九年繼續不息的工作中，我只休假了一次。即是在兩年之前，那時有幾個朋友，將錢放在我的手裏，強迫華盛頓夫人和我自己到歐洲去住上三個月。我已說過，我相信每一個人使他的身體健康，乃是他的本分。我留心着小病痛，以爲我留心了小病痛，大病痛就不會發生了。我一覺得我不能安睡時，我就知道有什麼事情不對。假使我覺得身體上任何一部分有一些不舒服，不能執行牠的工作，我就去向良好的醫師就診。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方可以安睡的能力，我覺得大有好處。我已經訓練好自己，能夠躺下來小睡十五或二十分鐘，然後身心清健的走進來。

我已說過，我使這事成爲常例，就是在離開每天的工作之前，要結束牠。也許對於這常例，有一個例外。我遇到一個非常難於解決的問題時——極能激動情緒的問題時——我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睡了一

夜再說，或者等我有機會和我的妻子與朋友談過了這事再說。

至於我的閱讀，我閱讀得最多的時間，是我坐車的時候。新聞紙對於我是愉快與娛樂的不息之源。惟一的困難，是我閱讀新聞紙太多。我不大注意小說。時常我必須強迫我自己，去閱讀一篇掛在人口頭的小說。我最喜愛的讀物是傳記。我喜歡確實知道我在讀着一個真的人或真的事物。我想我不能說是言過其實罷，凡是關於林肯的任何書籍或雜誌論文，我差不多都完全讀過。在文學上，他是我的保護聖徒。

一年十二個月裏面，我想平均算來，我要離開塔斯岐基六個月。我離開學校這樣久，當然有其不利的所在，可是同時卻也有其補償的地方。工作的變化，的確就是某種休息。我享受着長途乘汽車的快樂，一有乘汽車的機會，就覺得很舒服。我在車上得到休息，除非有時在火車上會遇到人，他走近來，用着人人慣用的話說：「這是濮各爾·華盛頓麼？我要介紹我自己給你。」離開學校，使我可以看不見工作中不重要的事情，而用那比就地研究更爲廣博的方式，來研究工作。這樣的離開，也使我和教育界最佳的工作接觸，並國內最佳的教育界接觸。

但是除了我上面所說的以外，我能夠獲得切實的休息與娛樂的時候，乃是在我回到了塔斯岐基，吃過了晚飯，按着習慣，和我的妻子以及波爾喜阿，濮各爾和得維德松這三個孩子，一同坐下來，讀一篇故事，或是每人挨次講一個故事。在我看來，世界上沒有什麼能夠比得上這個的，至於和這個相差無幾的，那就

是和他們出去走上一小時或者多些，如我們在星期日下午所喜歡做的那樣，往樹林中，在那裏我們能夠接近着大自然的心臟，住上若干時，在那裏誰也不能夠來擾亂或煩惱我們，四週被純潔的空氣、樹木、灌木、花卉和各種植物所發出來的香氣包圍着，享受着唧唧的蟲聲和歌曲般的鳥聲。這是切實的休息。

只要我有一些能夠在塔斯岐基的時間，我的花園也是休息與享樂的另一個泉源。我所喜歡的，只要能愈多愈好，便是接觸着大自然，不是什麼人爲的或仿造的，乃是真的東西。我只要能夠離開我的辦公室，以便我能夠用上三四十分鐘去掘掘地，撒撒種，挖挖草木，我就覺得我在和什麼東西接觸着，牠在給我力量，來對付那在外面大千世界中等着我的許多職務和困難。有些人從來不知道享受大自然，並且從牠那裏獲得力量和興感，我真可憐這些人。

除了本校所畜的大量家禽和家畜以外，我還獨自養着許多最佳的豬和家禽，我在飼養牠們這事上也取到了不少快樂。我想豬是我的愛畜。能夠比了一匹高等的巴克那 (Berkshire) 或波蘭·支那 (Poland China) 豬使我滿意的東西，簡直很少。

我不大留心遊戲。我從來沒有去看過足球遊戲。在紙牌上我也認不出這張牌與那張牌有什麼區別。和我兩個男孩子玩玩舊式的玻璃彈子，乃是我在這方面所惟一留心的事情。我想假使我年輕時有一些工夫可以作遊戲的，我現在也許會留心牠們了，可是那時這事我究竟沒有辦到。

第十六章 歐洲

一八九三年，我和麥累（Margaret James Murray）女士結婚。他是密士失必州人，田納西州那什維爾（Nashville）菲斯克（Fisk）大學的畢業生，數年之前，她到塔斯歧基來當教員的，在我們結婚時，她正繼任着女校長。華盛頓夫人不但在直接和本校有關的工作上，完全是一個工作人員，減輕我許多重擔和困惑，並且在她的學校工作以外，還在塔斯歧基城裏主持着母親們的鼓會，並在離塔斯歧基約八哩的一個大田莊上的男女老幼中，主持着田莊工作。母親們的鼓會和田莊工作，所以主持着的原故，不但想要幫助那些直接有關的人，並且要想在這兩種工作上，作實物教授，使我們的學生，在他們入世之後，可以學着作為終身工作。

華盛頓夫人除了上述兩件事情以外，還要為本校的婦女俱樂部，負着大部分的責任，這俱樂部每日鼓會兩次，到會的是住在本校內和校外相近處的婦女，討論着一些重要的事題。她也是「南方黑種婦女俱樂部同盟」的會長，和「黑種婦女俱樂部全國同盟」的主席。

我的最長的孩子波爾喜阿，已經學會製衣。她在器樂上有着非常的能力。她在塔斯歧基讀書以外，早已開始教書了。

濮各爾·塔利阿斐羅是我第二個孩子。他還年輕，卻已經差不多學會了磚瓦行業。他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從事於這個行業，將他的時間分用在這事和課堂上；他現在已經在這個行業上，學到極大的技巧，並且很喜愛這事。他說他將來要作一個建築家和磚瓦工。去年夏天，我從濮各爾那裏接到了一封我最滿意的信。我離家避暑的時候，我告訴他，每天必須用半天作這個行業，其餘半天則聽他的喜歡。我離家兩星期時，我從他的地方接到下面的信：

阿拉巴馬，塔斯岐基。

我親愛的爸爸：在你離家之前，你告訴我每天用半天作我的行業。我很喜歡我的工作，因此我要全天作我的行業。此外，我要盡力賺一切的錢，以使我到別的學校去的時候，可以有錢付我的費用。

你的兒子濮各爾。

我那最小的孩子得維德松說，他將來要做一個醫師。他除了照常上學讀書和作勞力訓練以外，一定總要用一些工夫在校醫的辦公室中，並且已經學會作許多有關醫師辦公室的事情。

我畢生覺得最是可惜的事，就是我那與公衆事務有關係的工作，使我有許多時間，不能和我的家庭同在一起。家庭是世界上我最喜歡住的地方。有些人的終身工作安排得很好，能夠每晚在家庭中過着，我時常就羨慕着這種人。我有時要想，人們有了這樣的特權，卻不照他們所應該的，來重視這特權。離開擁擠

着的人握手、旅行等事，而回到家裏去，甚至極短的片刻，也總是極大的休息和安慰。

在塔斯岐基另外使我獲得許多快樂與滿意的事情，便是每晚八點半鐘，在禮拜堂中和我們的學生教員，以及他們的家屬，作祈禱禮拜，這是就寢之前的最後一件事。一個人站在講臺上，看着他面前一千二百個年輕男女，真是一個動人的景象；一個人到了此刻，就只覺得幫着去指導他們達到一個較高而更有用的生活，乃是一種特權。

一八九九年春，有一件差不多我可以稱之爲我畢生最大的意外，臨到了我的身上。在波士頓，有幾位好太太，爲塔斯岐基的利益，安排了一個公衆敍會，在荷利斯（Holls）街的戲院中舉行。到會的人，有許多是波士頓最優秀的人物，黑白人都有。主席是勞楞斯（Lawrence）主教。除了我自己演講之外，還有巴（Dunbar）先生讀他的詩，丟霸（W. E. B. Du Bois）博士讀一篇尙未發表的原稿。

到會的諸人中，有些人注意到，我似乎非常的疲勞，在閉會片時之後，有一位參加開會的太太，用偶然的態度，問我有未到過歐洲。我回答說我從未去過。她問我，有否想去過，我告訴她說沒有，這完全是與我無關的事情。這次談話，不久我就忘記了，可是過了幾天，有人告訴我，波士頓的幾個朋友，連加利松（Francis J. Garrison）先生也在內，已經募得一筆款子，足以供給華盛頓夫人和我自己，往歐洲去作三四個月的旅行。並且還有一句話，就是說我「必須」去。一年之前，加利松先生早就想要我答應往歐洲去休息一個

暑假，說明他將負責在他的朋友中間，募集旅行的用費。那時，這樣一個旅行似乎是我完全所辦不到的事情，所以我承認我對於這事，並沒有與以大鄭重的注意；可是後來加利松先生和我方才提起的諸位太太，一同努力了，等到我知道他們的計劃時，加利松先生不但將路程都已劃出，並且我相信，已經選定了我們乘之出發的輪船。

全盤事情，來得非常突兀而出於意外，弄得我完全沒有辦法。我爲塔斯岐孜孜不息地已經工作了十八年，我從來沒有想到別的事情過，只想就此了結我的餘生。每天，本校似乎更多的倚賴着我，要我爲牠設法日常的費用，我一方面爲了這些波士頓朋友的有思想與大量，誠懇地謝謝他們，一方面我告訴他們，我不能到歐洲去，因爲我一離開，本校在財務上就過不來日子。他們於是再告訴我，希金松（Henry L. Higginson）先生和其他若干我知道他們不願公開其姓名的好朋友，那時還在另外募集一筆款子，以求夠我離開本校時維持工作之用。在這一點上，我只好被逼而屈服。每一條逃遁的路，都已經關閉起來了。

在我的心的深處，全部事情好像一個夢，而不像是事實，好久好久，難於使我自己相信，我果然在向歐洲去。我是在最低的奴隸，愚昧，和貧窮的地位上生出來，長起來的。在我童年，我苦得連睡眠之處都沒有，衣食住什麼都沒有。在我完全長大之前，我就從來沒有正式坐過餐桌。奢侈的事情，在我看來，似乎只是白人的，不是我們黑人的。我心自中的歐洲和倫敦和巴黎，正如我心自中的天堂。現在，我真正要往歐洲去了，這是

可能的麼？這樣的思想，一直在我心裏反覆不止。

其他兩個思想，也使我發生了許多困難。我怕人們一聽見華盛頓夫人和我在向歐洲去，卻不曉得一切實際情形，不免要想，我們已經如有些人所說，「發財了，」要去「出風頭了。」我記得我從小就時常聽見人家說過，我們黑人一達到任何成功的地步，就喜歡過甚地誇張他們自己；要想嘗試着，模仿着闊人的生活，這樣一來，弄得狼狽不堪。我就怕人家想我們這樣，所以我心裏老是放不下。此外，則我在良心上說來，也簡直沒有離開了我的工作，還可以快樂的理由。別人在工作，要我作的事又那樣多，而我卻出去消遣假期，似乎有些卑鄙與自私罷。從我能夠記憶的時期起，我是一直工作着的，我不知道我怎能一些不做什麼，來消遣這三四個月的光陰。事實是我不知道消遣假期的方法。

華盛頓夫人也有着同樣的困難來走開，但是她很希望去，因為她想我需要這個休息。那時還有許多關於黑種生活的全國大問題，正在激蕩之中，更使我們難於決定就去。不過最後，我們終於答應了我們的波士頓朋友，說我們願意去，他們於是竭力主張我們出發之期，愈早愈好。這樣，我們就決定五月十日動身。我的好友加利松先生，負着全責，作着這次旅行在成功上的必要事情，他和其他許多朋友，給了我們許多介紹與英法人士的信函，並為我們在國外的舒適和便利起見，作了其他的安排。辭別了塔斯歧基，我們於五月九日到了紐約，準備明天放洋。我們的女兒波爾喜阿，那時正在馬薩諸塞州南夫累姆林加姆 (South)

(Fringham) 讀書，到了紐約，來送我們的行。我的秘書斯科特先生和我同到了紐約，以便我在動身之前，可以辦完最後一些事情。其他朋友也到紐約來送行。正在我上船之前，另外一件愉快的意外事，臨到了我們，原來有兩個慷慨的太太，寫來一封信，說她們已決定給我們錢，去建築一座新房子，以便供給塔斯歧基女生的一切實業之用。

我們所乘的是紅星公司的夫利斯蘭德 (Friesland) 號，這是一條美麗的船。我們正在午前啓碇之前上了船。我以前從來沒有乘過一條大的洋船，我上了船之後所發生的感覺，真有些難於形容。我想這是敬畏與愉快混合的感覺。我們意外開心地發見船長和其他若干船員，不但知道我們是誰，並且正在期待着我們，給我們快適的歡迎。船上還有若干我們認得的旅客，其中有紐·澤西 (New Jersey) 的修韋爾 (Gewell) 參議員，和新聞通信員 馬沙爾 (Edward Marshall)。我正有一些畏懼，恐怕有些旅客要待我們不客氣。這個畏懼的根據是我們同胞所說的話，我曾聽他們說過，他們乘着美國船出洋，得到了不愉快的經驗。但是我們的情形，卻大不相同，自船長以至最下級的侍役，都用最大的禮貌待我們。而且這種禮貌，不但限於船員；所有的旅客，都有這種表示。在船上的南方男女為數不少，他們都和從國內其他地方來的人一樣懇切。

最後的再會一說過，輪船一離開碼頭，我十八年來提心弔膽，以及種種責任的重擔，就從我的肩頭上

卸了下來，其卸下的速率，似乎是每分鐘一磅。這是我許多年來，第一次覺得不用操心，我的爽適之感，簡直難於在紙上形容出來。此外，又加上了即刻就可以到歐洲的快樂的預想。一切真像一個夢，又像是一件事實。

加利松先生很有思想地爲我們在船上安排好了一個最舒服的房間。過了兩三天，我開始睡覺了，我想我在其餘十天的旅程中，每天的睡率是十五小時。這樣一來，我才知道我真是何等的疲勞。這些長睡，在我們渡登彼岸之後，還繼續了一個月。早上醒來，總是一個非常的感覺，那時發見我並沒有什麼要辦的事情；並不要有一定的鐘點去乘火車，並沒有什麼任務，要在一定的時候去見什麼人，或作演講。這一切事情，比了我從前旅行時的經驗，何等的不同，那時我在一夜之中，有時竟要換三張牀！

星期日到了，船長請我去領禮拜，但是我不是牧師，所以我謝絕了。然而旅客們卻開始作着要求，要我在航程中不論何時，爲他們在膳室中演講一次，這個我就答應了。修韋爾參議員在這會中作了主席。在船上十天工夫，天氣都很好，我一天都沒有暈過船，這樣的十天之後，我們就在比利時有趣的古城安特渥普（Antwerp）上了岸。

我們上岸後的第二天，剛遇着是許多假日之一，這些假日是那些國家的人民，素來看得很重的。這是一個光明美麗的日子。我們旅館中的房間，正對着主要公衆曠場，那裏的景象——鄉下來的人，帶着各種

的花在出售，女人領着她們的狗，狗拖着大而油漆漂亮的罐頭，裏面注滿了牛奶，人們都在擁進大禮拜寺裏去——將一個新的，我從來沒有經驗到的感覺，塞滿了我。

在安特渥普過了些時之後，有人請我們和五六個人一淘由荷蘭出發去旅行。這一淘中，馬沙爾和若干和我們同船來的藝術家，我們接受了這個邀請，將這個旅行大大地享受了一下。我想這是更有趣更有意義的一次旅行，因為我們大部分的路，都是乘着一條遲緩而舊式的小船走的。這樣，就給了我們機會，可以看覽並研究鄉區人民的真實生活。我們這樣的走着，一直走到羅忒達姆（Rotterdam），後來又走到海牙，那時「和平會議」正在開會，美國的代表很客氣地接待了我們。

在荷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農業的完美，和荷爾斯泰恩（Holstein）牲口的卓越。在遊歷荷蘭之前，我從來沒有知道，從這樣一小片土地上，人們究竟能夠種出多少東西來。在我看來，他們似乎絕對沒有荒廢什麼土地。到荷蘭去看三四百頭純良的荷爾斯泰恩牛，在一個密茂的綠草地上嚼着，也就可以說是不虛此行了。

由荷蘭我們再往比利時去，匆匆地穿過了這國家，在布魯塞爾（Brussels）停了一下，參觀了滑鐵盧戰場。由比利時我們直接往巴黎去，在那裏我們才知道斯坦吞（Elizabeth Cady Stanton）夫人，的兒子斯坦吞（Theodore Stanton）先生，已經很客氣地為我們安排了宿處。我們剛剛在巴黎一住下

來，巴黎的大學俱樂部就有一個請帖來，請我去赴那就要舉行的宴會。其他所請的客人是前總統哈利松（Benjamin Harrison）和愛爾蘭（Ireland）大主教，他們那時也正在巴黎。美國大使波爾忒（Horace Porter）在這宴會中作主席。我這時所作的演說，聽見的人似乎都滿意的。哈利松將軍很客氣地特為在進餐時用許多話來說到我和我在塔斯歧基的工作，在美國種族問題上的影響。我在這次宴會中演講之後，其他的邀請都來了，但是我大多數都謝絕了，因為我知道假使完全接受了牠們，我的旅行目的就要失敗了。然而我卻願意在隨後的星期日上午，在那美國教堂中作一會演講，在這會中，哈利松將軍、波爾忒將軍，以及其他著名的美國人，都到場的。

後來我們受到了美國大使的正式拜訪，並且由他邀請我們去赴他家裏的歡迎會。在這次歡迎會中，我們會見了許多美國人，其中有美國最高法院的法官孚勒（Fuller）和哈蘭（Harlan），我們在巴黎的一個月時光中，美國大使和他的夫人，以及若干其他美國人，都對我們很客氣。

在巴黎的時候，我們看見現在美國著名的黑人畫家坦納（Henry O. Tanner）先生的次數很多，我們在美國時就認識他了。坦納先生在藝術界的著名，各階級所給他的高尚地位，看了都叫人滿意。我們告訴若干美國人，說我們要往盧森堡宮去看一個美國黑人所作的畫時，他們簡直不相信，一個黑人會受到這樣的榮譽。我想他們一直要等到親自看見了那幅畫，才會真正的相信罷。我和坦納先生的相識，使我

心裏以爲真理的事實，更爲有力，原來我一直在想叫我們在塔斯歧基的學生相信——只要我的聲音能夠及到他們，也想叫全國我們的同胞相信——任何人，不論他是什麼種色，只要他會作得好事情——會比別人作得更好些——不問所作的事情何等卑微，就一定會按照他所作的成績，受到別人的承認與獎勵。我已經說過，我相信我們黑種會用不平常的態度來作平常的事情時，會作一件事情，完美到別人再也不能加以改進時，會將所作的事的功効，成爲必要的價值時，則作得多少，我們黑種就會成功多少。這是使我初次在哈姆普吞爲努力的精神，那時我所有的機會，只是灑掃課室罷了。但我那時就覺得我將來的全部生活，要看我收拾課室的完美程度而定，所以我決意要作得很好，以致誰也找不到那事情的錯處。我發見那些看見了坦納先生的畫，居然想問問他是黑人畫家，法國畫家，或德國畫家的人，爲數很少。他們只知道他能產生世界上所需要的什麼東西——偉大的畫——他的種色這件事情，是絲毫不在他們心中。一個黑種女童學會烹飪、洗碟、縫紉、著書，或一個黑種男童學會養馬、種甜薯、製奶油、造屋、能夠用藥，並且各事作得和別人一樣或較好時，他們就可以不因種色而受到獎勵。到底世界是在需求着最佳的事物，在種族、宗教，或從前歷史上的任何差別，總不會一直拉牢世界，叫牠不能獲得牠所需要的東西。

我想我們黑種的全部將來，完全要看這個問題的解決而定，就是我們黑種究竟能否使牠自己成爲必要的價值，使我們現在所住的城市國家，都覺得我們的存在，對於人羣的快樂與幸福，是必要的。誰在他

所住的地方，能在物質的、智力的、道德的幸福上，加增什麼東西的，決不會長被人們遺忘，而不給以適當的獎勵。這是偉大的人類定律，決不會永遠被人視作無效。

我深覺得法國人大都喜歡娛樂與刺激。我想他們在這方面，比了我自己的種族為尤甚。關於道德性和道德的熱誠，我不相信法國人就比美國我自己的種族前進些。嚴重的競爭和生活的極大壓力，已經使他們會將事情作得更加完美些，會運用更大的經濟；但我想時間總會使我的種族，達到同樣的地步。在真實與高尚榮譽這些事上，我不相信普通法國人便勝過美國黑人；至於對牲畜的仁慈與和愛，則我相信我的種族便遠超在前面的。的確，我離開法國時，對於美國黑人的前途，我有着比從前更多的信心。

我們由巴黎往倫敦，在七月上旬到達那裏，正在倫敦社交季節的高潮。國會在開會，娛樂之事很多。加利松先生和其他朋友，為我們準備好了一大批的介紹信，他們還寫信給這聯合王國的各部分，告知着我們的來到。我們一到倫敦，請帖便如雪片的飛來，請我們去參加各式各樣的社交集會，更有許多邀請書來，請求我去作公開演講。這樣的邀請，大都我謝絕了，因為我需要休息。另外的邀請，我們也只能接受極小的一部分。赫福德 (Brooke Herford) 博士和夫人，我在波士頓早就認識的，現在他們和美國大使緯特 (Joseph Choate) 先生相商，為我安排好，在埃克塞忒 (Exeter) 堂作公開的演講。緯特先生很客氣地擔任了主席。到會的人很多，著名人物也不少，其中有若干國會議員，例如布賴斯 (James Bryce) 先生，

他也在會中演講了。美國大使的介紹詞，和我的演講詞的節略，在那時的英美報紙上，都大大地登載着。赫福德博士和夫人，又爲華盛頓夫人和我開歡迎會，我們在那裏僥倖會到了若干倫敦的最優秀人物。我們在倫敦的全部時期中，綽特大使對我們最客氣，最照顧。在大使的歡迎會上，我第一次會見了馬克·吐溫 (Mark Twain)。

我們好幾次，作了英國政治家科布頓 (Richard Cobden) 的女兒翁文 (T. Fisher Unwin) 夫人的客人。翁文先生和夫人，對於我們的舒適和快樂，似乎總覺得沒有做得週到。以後，近乎一星期，我們是布賴特 (John Bright) 先生的女兒的客人，她就是現在的克拉克 (Clark) 夫人，他們是英格蘭特利特 (Dreot) 人。克拉克先生和夫人，以及他們的女兒，明年都到塔斯歧基來探望過我們。在英格蘭的柏明罕，我們作了斯武治 (Joseph Sturge) 先生的客人好幾天，他的父親是一位偉大的廢止奴制論者，也是惠提厄 (Whittier) 和加利松的朋友。在英格蘭能夠會見這些人，真是幸運，他們都認得並且都尊敬威廉·加利松 (William Garrison) 和達格拉斯 (Frederick Douglass) 以及其他的廢奴論者。我們所遇見的英國的廢奴論者，似乎總要談到這兩個美國人。在往英國之前，我對於英國廢奴論者，爲自由而表示的深切注意，並沒有適當的概念，並且我也不知道他們曾作過多少實際上的幫助。

在英格蘭的布里斯托爾 (Bristol) 華盛頓夫人和我，都在婦女自由俱樂部演講過。我也是拉阿爾

(Royal) 盲人專門學校畢業式的主要演講員。這畢業式是在水晶宮舉行的，主席是去世不久的韋斯特明斯式 (Westminster) 公爵，我相信別人會說他，如果不是世界上最富的人，一定是英國最富的人。公爵和他的夫人以及他們的女兒，似乎很喜歡我的演講，很誠懇地謝了我。藉着阿柏丁 (Aberdeen) 貴婦的優待，我的妻子和我，得以和一羣在倫敦開着「國際婦女代表大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Women) 的人，同往文左 (Windsor) 堡去朝見維多利亞女王，後來在那裏，我們就成了女王陛下茶會上的來賓。在我們的一羣中，有安托尼 (Susan B. Anthony) 女士，因此我受的印象很深，因為誰也不會時常獲得機會，在同一時間內，可以看見這兩位不同的女名人如安托尼女士與維多利亞女王。我們參觀了好幾次下議院，在這裏面，我們遇見了斯坦利 (Henry M. Stanley) 爵士。我和他談到非洲，和非洲對於美洲黑人的關係。在我和他這樣晤談之後，我比了從前更加相信，要想將美洲黑人移住非洲，以改進他們的狀況，是毫無希望的。

有好幾次，華盛頓夫人和我都是住在鄉間的英國人的客人，我想在這裏，誰都可以看見英國人的最出色處。至少有一件事，我的確覺得是對的，就是英國人走在美國人的前面，那就是說，他們已經知道更加多享受人生的方法。英國人的家庭生活，照我看來，似乎已經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地步。每一樣事物，都像鐘件運動着。我對於那些僕人向他們的「男主人」 (Masters) 和「女主人」 (Mistresses) ——我想

這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稱呼——所表示的敬意，也受到了很深的印象。按之常例，英國的僕人除了作一個僕人之外，就不想作別的，所以他將他自己，在技藝上弄得非常完美，爲美國任何階級的僕人所不能及。在我們國裏，僕人總希望在數年之內，他自己也可以成爲一個「男主人」。那一種制度較爲可取些呢？我不敢回答。

另外一件給我印象的英國事情，便是各階級都絕對遵守法律與秩序，都從容不迫，仔細週到地作着事。我發見英國人用許多工夫在吃的事上，有如用在其他的事上一樣。到底他們是否比了匆忙而神經不安的美國人，沒有成就得一般多，或更加多些，我有些說不定。

我到英國的遊歷，使我對於貴族有了比從前更深的注意。我並不是說，他們是那樣的，大爲民衆所愛所尊敬，而他們在慈善工作上究竟用過多少時間和金錢，以及他們究竟有多少真心放在這種工作上，我也一些沒有正確的概念。我的印象是，他們不過自由用錢，並且有着「好時光」。

要我習慣向英國聽衆作演講，是艱難的。普通英國人都很嚴肅，對於每一樣事物，都非常篤實，要是我講一個故事，會使美國人大聲哭喊起來的，英國人只直望着我的面孔，甚至一絲的笑容都沒有。

英國人將你放進他的心裏和友誼中時，他就像用了鋼絲束縛你在那裏一樣，我不相信此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友誼，也會這樣永久，這樣令人滿意。也許我最好述說下列一件事，來說明這一點。斯忒蘭德

(Sutherland) 公爵和夫人，請華盛頓夫人和我去參加一個歡迎會，地點是在斯塔福德 (Stafford) 大廈，據說這是倫敦最美好的房子；我應該再加一句，我相信公爵夫人是人家所說英國最美麗的婦人。到這歡迎會的，至少有三百個人。這晚上公爵夫人特為來找我們談話，共有兩次，她要我回去之後，寫信給她，再將塔斯岐基的工作，多告訴些給她聽。我做了這事。耶穌聖誕來的時候，我們出於意外地，並且很高興地，接到了她的照片，上面還有她的親筆簽字。現在通信還是繼續着，我們覺得在斯忒蘭德公爵夫人身上，獲得了一個最熱烈的朋友。

在歐洲住了三個月，我們再由騷薩姆普吞 (Southampton) 乘聖·路易 (St. Louis) 號出發。在這船上，有一個很好的圖書室，是由密蘇利 (Missouri) 州聖·路易市的市民捐給這船的。在這圖書室中，我找到了達格拉斯的傳記，我就開始閱讀起來。我尤其注意他描寫第一或第二次到英國來時，在船上所受到的待遇。在他的描寫中，他述說着怎樣他不許進入船艙，只好逗遛在甲板上。我讀完這段文字後幾分鐘，就有幾位先生和太太組成的一個委員會，來請求我在音樂會中作一場演講，該會將在明天晚上舉行。不過還有些人敢於說，美國的種族意識，並不在改少其緊張！在這一個音樂會中，紐約州現任的州長俄得爾 (Benjamin B. Odell, Jr.) 先生作主席。我別的地方，從未遇到過更為熱誠聽我演講的人。旅客中一部分是美國南方人。音樂會過了之後，有幾個旅客就提議募捐幫助塔斯岐基的工作，結果募到了好幾個

獎學金。

我們還在巴黎的時候，我很高興意外接到了下面這個邀請信，這是從西弗基尼阿 (West Virginia) 即和我童年住過的地方相近的城市的市民寄來的：

一八九九年五月十六日，西弗基尼阿州查爾茲吞城。

法國巴黎華盛頓教授：

親愛的先生：西弗基尼阿許多優秀的市民，一致對於你的價值和工作，表示尊崇和讚美，期望你由歐洲回來之後，惠然肯來，用你的言詞，賜以啓迪。我們很誠懇地贊同這個主張，所以代表查爾茲吞的市民，向你致出我們最誠懇的邀請，請你到我們地方來，以便我們向你致敬你一生和你的工作已作了許多事，使我們光榮了。

我們是

你的最忠實的人，查爾茲吞市議會

市長斯密斯 (W. Herman Smith)

和這封邀請信同來的，還有下面一封信：

法國巴黎華盛頓教授：

親愛的先生：我們，查爾茲吞和西弗尼基阿的市民，對於你和你到現在所已成就的大事業，願意表示我們的尊重，請求允許我們用一個切實的方法，來表示我們的尊重和注意。

你最近探訪你那在我們中間的老家，喚起了我們很難過的悔恨，就是我們未曾能夠聽你演講，也未能在你動身赴歐洲之前，對於你的工作，給一些實際的援助。

爲了前述的理由，我們熱誠邀請你，等你由歐洲回來後，來享受我們的款待，也給我們機會可以聽你的演講，使我們自己會和你的工作接觸，以便我們向你致其感激之忱，並可以從你的言詞和出現，獲得與感。

如承早日作答，說明你能到我們地方的時間，不勝感謝之至。

最尊敬你的人，

The Charleston Daily Gazette; The Daily Mail Tribune; 州長 G. W. Atkinson; 州長秘書 E. L. Boggs; 州務主任 Wm. M. O. Dawson; 參事官 L. M. La Follette; 學校監督 J. R. Trotter; 前州長 E. W. Wilson; 前州長 W. A. MacCorkle; 卡那瓦谷國立銀行行長 John Q. Dickinson; 查爾斯登國立銀行行長 L. Pritchard; 卡那瓦國立銀行行長 Geo. S. Couch;

卡那瓦國立銀行出納員 Ed. Reid; 市立學校監督 Gen. S. Laidley; 教育會會長 L. E. McWhorter; 批發商 Chas. K. Payne; 以及其他多人。

這封邀請書是從那地方的市議會，州行政官吏，以及社會上兩個種族的要人方面來的，那地方我會度過我的童年，不多年以前，我曾從那地方，不爲人知，窮苦而愚蠢，爲着尋求教育，走了出來，因此這封邀請書，不但出於我的意外，差不多使我目瞪口呆。我不懂我做過了什麼，值得人家對我如此。

我接受了這邀請書，在約定的日子，到查爾茲吞火車站來接我的，是一個前州長馬科爾克爾（W. A. MacOrkle）所率領的委員會，該會的委員，兩個種族的人都有。公衆歡迎會是在查爾茲吞的歌劇院舉行的。州長阿特金松（George W. Atkinson）先生主席，前州長馬科爾克爾先生致歡迎詞。會中重要的部分，則由黑種市民所主持。歌劇院中充滿了兩個種族的市民，在白人裏面，有許多就是我童年爲他們作過工的人。第二天，阿特金松州長和夫人，又在州政府爲我舉行了一個公開的歡迎會，到會的有各階級的人。

在此以後不久，佐基亞州阿特蘭塔城的黑人，也給我開了一個歡迎會，由州長爲主席，紐奧雷安斯城也有同樣的會，主席是該城的市長。其他許多地方也有邀請書來，我不能一一接受。

第十七章 最後的話

在我往歐洲去之前，有些對於我是極大意外的事情，進入了我的一生中的確，我的一生中，大部分是充滿意外的。我相信任何人的一生，都可以充滿着這種不息的、意料之外的鼓勵的，只要他打定主意，在他一生中，每天都想向上——那就是說，每天都想竭力接近那純潔的、不自私的、有用的生活的最高點。我可憐那些人，不論是黑人或白人，從未經驗到那種由努力幫助別人，使別人更爲有用更爲快樂而得來的喜悅與滿足。

在阿姆斯特隆將軍逝世前六個月，就是在他得到瘋癱病之後差不多一年的時光，他表示在他去世之前，再來探望塔斯岐基一次。不管他的肢體已經不能運用，達到實在無法可想的地步，他的願望終於滿足了，他被送到了塔斯岐基。塔斯岐基鐵道的所有者，住在本城的白人，願意不取一錢，開出一部專車，到車站——五哩之外的契豪（Chelaw）——去迎接他。他在晚上大約九點鐘的時候，到了本校的境地。有人早已提議，由我們給這位將軍一個「松節火炬歡迎會」。這個計劃實行了，他的車子一進學校的境地，他就在兩行光明閃耀的「肥松」木節之間，走了過來，舉着這火炬的，是一千個以上的學生和教員。全部事情都充滿着新奇動人之感，以致這位將軍不勝之喜。他在我家作客，近乎兩個月，雖然他差不多已完全不能用着聲音和肢體，卻幾乎每小時都在想盡方法，幫助南方。在這次探訪中，他屢次對我說，國家的責任，不但要幫着提高南方的黑人，也應該連白人一併在內。在他探訪將畢時，我重新決意，比了從前更爲熱切。

地供獻我自己，要爲那接近他的心的事業而努力。我說過的，如果一個人願意思想、工作、並活動，我總願意用盡各種可能的方法，來促進他心裏的願望。

阿姆斯特隆將軍在數星期之後的死亡，使我認識了我第一次接觸到的一個最優美、最不自私、最可愛的人。我是指的夫利塞博士，現在是哈姆普吞學院的校長，阿姆斯特隆將軍的後繼者。在夫利塞博士清楚、強幹、幾乎完善的領導之下，哈姆普吞有着了那位將軍所能希望到的繁榮與有用的前途。夫利塞博士似乎一直只想將他自己偉大的人格，掩藏在阿姆斯特隆將軍之後——爲了事業的原故，使他自己「無名譽。」

所謂第一次臨到我的最大的意外，究竟是什麼，我已經好幾次被人問過了。我有一些遲疑，來回答這個問題。這就是下面的一封信，是一個星期日的上午寄到我的地方的，那時我正坐在塔斯歧基我家裏的露臺上，有我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圍繞着——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劍橋 (Cambridge) 哈佛大學。

華盛頓校長，

我的親愛的先生：哈佛大學願意在即將舉行的畢業式中，贈給你一個榮譽的學位；但我們的習慣

只將學位贈給能夠到校的人。我們今年的畢業式將在六月二十四日舉行，希望你能在近午至下午五時左右到校。你能夠在那天到劍橋來麼？

相信我，並此問候。

你的極忠實的人，

埃利俄特 (Charles W. Eliot)

這事可以說我從來沒有想到，我簡直難於自信，那個在美國最老而最著名的大學，居然會贈我一個學位。我坐在露臺上，手裏拿了這封信，眼淚滿了我的眼睛。我那全部的從前生活——我在田莊上的奴隸生活，我在煤礦中的工作，我無衣無食的時期，我在人行道下睡覺的時期，我力求教育的奮鬥，我在塔斯岐基的困難日子，我不知道往何處去設法一塊錢來繼續其他工作的日子，對於我的種族的放逐和有時壓迫——這一切都在我的面前過去了，差不多壓倒了我。

我對於世人所稱的名聲，從來沒有尋求過或留心過。我時常以為名聲只是用以成就善事的什麼東西。我會時常對我的朋友說過，假使我能利用任何給我的優勢，作為成就善事的工具，我是願意有這個東西的。我只當牠是用以作善事的手段，有如財富可以應用的那樣。我愈和富人接觸，我愈相信，他們的所以有錢，不過是上帝要將錢這個工具，放在他們的手裏，以便作成善事。羅開腓勒 (John D. Rockefeller)

先生對於塔斯岐基的大量，不至一次，我到他的辦公室去時，總要提起這句話。爲了要的確知道他所施捨的每一塊錢會作成最多的善事，他總要先作着密切、審慎而仔細的調查——那種調查的不厭求詳，正如他在投資給商業的企業一樣——使我深信富人們如此用錢的前途，實在大有希望。

六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在大學裏指定的地方，我會見了埃利俄特校長，哈佛大學的董事會和其他來賓，以便由人來陪往桑得爾斯 (Sanders) 戲院，這裏就是舉行畢業式和頒給學位的地方。這時在被請來接受學位的諸人中，有邁爾斯 (Nelson A. Miles) 將軍，發明培爾 (Bell) 電話的培爾博士，文孫特 (Vincent) 主教，和薩末治 (Minot J. Savage) 牧師。我們都立刻在校長和董事會的背後排了隊，不久，騎槍兵所護送着的馬薩諸塞州州長也到了，也在校長埃利俄特的旁邊，加入了行進的隊伍。在隊伍中還有許多其他的官員和教授，都戴着帽，穿着大袍。按着這樣的順序，我們行進到桑得爾斯戲院，在那裏等平常的畢業式完了之後，舉行頒給名譽學位式。這事似乎一直被入當作哈佛最有趣的事情。名譽學位頒給誰，在受學位的人出現之前，別人是不知道的，而受這些學位的人，則由學生和其他的人，按着他們的聲名高下，而與以相當的歡呼。在頒給學位時，奮興和熱烈，都達到了最高點。

點到我的名字的時候，我立了起來，埃利俄特校長用美麗而有力的英語，頒給我文學碩士的學位。這些儀式過了之後，凡接受名譽學位的人，都被邀去和校長吃點心。點心之後，我們再排隊，由當時的指導員，

陪伴着走過校內各地，那年的指導員是勞楞斯主教，校內各地都有人喊着那些受學位的人的名字，與以哈佛的歡呼。這樣的行進，終止於紀念堂，在這裏舉行着畢業生宴會。看着一千個強壯的人，代表着國家、教會、商業和教育各界的優秀人物，都有着如火如荼的學校忠誠和學校尊榮——我想這是哈佛特有的風味。這真是一個不容易忘記的景象。

宴會之後的演講員中，有挨利俄特校長，武爾科特州長，邁爾斯將軍，薩未治博士，羅治 (Henry Cabot Lodge) 先生，和我自己。輪到我的時候，在所說的其他的事情中，有下列的話：

如果我能夠，甚至在極微的程度上，覺得我自己是值得你們今天給我的重大榮譽的，這也許可以多少解除些我的困惑了。爲什麼你們從南方的黑帶，從我的卑微同胞中，叫我出來，享受這次的榮譽，不是我所要解釋的；但是我可以說，最重要而接觸着我們美國人生活的問題之一，就是怎樣使那些強壯、富足、有學問的人，會和那些最貧苦、最愚蠢、最卑微的人，發生有幫助的接觸，同時也使這個人會重視另一個人與人生氣，增人氣力的力量。我們怎樣才會使俾空街 (Beacon Street) 那邊的高樓大廈，覺得並看見在阿拉巴馬棉花田中，或盧伊西安那甘蔗林下，最低矮的小屋裏精神的需要呢？這個問題，哈佛大學卻在用那不使牠自己降低而使羣衆升高的方法，解決着。

如果我從前的生活，在提高我同胞，和促進你我兩個種族的事上，有過一些意義的，我可以向你們

保證，從今天起，牠的意義將加倍起來。在上帝的法度上，一個人要想成功，只能藉着一種標準——一個種族也只有一个標準。本國要求每一個種族，用美國的標準來測量牠自己。按照這個標準，一個種族不是升便是降，不是成功便是失敗，在最後的分析上，僅僅的感情作用，是沒有多大關係的。以後五六十年中，我們的種族必須繼續經受嚴格的美國熔爐。我們所要受試驗的，是我們的忍耐。我們的寬容，我們那些經得起錯誤，抵得住引誘，會經濟，會獲取並運用技巧，這樣的力量；也是我們會競爭，會在商業上成功，會去假存真，這樣的能力和，和那會把握實際，能大能小，多智而簡樸，高尚而為衆人服務，這樣的顯耀於世。這事既然是一所紐·英倫大學第一次頒榮譽的學位給一個黑人，所以這事就成了全國報紙評論的機會。一家紐約報紙的通信員說：

漢各爾·華盛頓的名字一叫着，他立起來接受學位的時候，喝采之聲，如春雷貫耳，除了著名的愛國軍人邁爾斯將軍以外，誰也比不上他。喝采並不是故意的、勉強的、同情似的、或安慰式的；這就是熱誠與敬崇。聽衆中每一部分，由樓下至樓上，都加入了，我四週諸人的面上，都發出了光彩，證明他們對於這位前任奴隸的奮鬥而起，和他為他本種族所成就的工作，有着誠實的珍重。

某波士頓報紙的社評說——

哈佛大學將文學碩士的榮譽學位，頒給塔斯岐基學校的校長，同時榮耀了牠自己和接受這學位

的人。讓各爾·華盛頓教授在南方他所選定以爲努力的區域中，爲教育良好市民資格和普及的啓迪運動，所已成就的工作，足可以使他和我們其他造福國家的人，列於同等地位。該校將他列入門牆，不問爲了平常的原故或爲了名譽的原故，都足以自傲。

固然，大家都知道華盛頓君是他的種族中由紐·英倫的大學中，第一個受到榮譽學位的人。固然這事本身就是一個特點。可是這學位的頒給，並不因爲華盛頓君是一個黑人，或者因爲他出身於奴隸，乃是因爲他在提高南方黑帶人民的工作上，已顯出他的天才和博大的人格，爲任何人，不問他的膚色是白或黑，所以成爲偉大的原因。

另一家波士頓報紙說：——

紐·英倫諸大學中，第一個頒榮譽學位給一個黑人的，乃是哈佛。誰看看塔斯歧基的歷史和他的工作，誰一定總要崇敬讓各爾·華盛頓的勇敢、堅持和卓越的常識的。哈佛這次顯揚這位前任奴隸，極爲得宜，他對於他的種族和國家所作的服務，只有將來才能估計出來。

紐約時報的通信員說：

一切演講，都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是那位黑人卻獨佔了演說的光榮，他講畢後所發出來的喝采是熱鬧的、長久的。

在我開始塔斯基基的工作後不久，在我的深處，立了一個決定，一定要使我的學校，對國家尤有幫助，以便有一天美國的總統會來參觀。我承認這有些是一個大膽的決心，若干年來，我都隱藏在心裏，不敢對任何一個人說出來。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我在這方面作了初步的進行，那就是設法招致馬金利總統的國務員之一，農部部長威爾遜 (James Wilson) 先生來參觀。他在斯雷忒·阿姆斯特隆農學館正式開幕時，來作了一會演說，這農學館是我們在農業和有關各業上，用以訓練我們學生的第一座大房子。

一八九八年下半年，我聽說馬金利總統說不定要到佐基亞州阿特蘭塔城來，目的是來參加其他舉行的和平紀念節，慶祝西美戰爭的成功結果。這時我已和我的教職員要想造成一個足以報效國家的學校，已經努力過十八年了；於是我決意再作直接的努力，以便致總統和他的內閣，前來參觀。我往華盛頓城去，不久，我就找到了往白宮去的路。我到那裏，才看見等候室裏，坐滿了人，我的心不覺向下沈了下去，因為我怕那天我終於不會有多少機會，可以看見總統。不過無論如何，我終於獲得一個機會，會見了總統的秘書波爾忒 (Addison Porter) 先生，將我的使命解釋給他聽。波爾忒先生很客氣地將我的名片直接送給了總統，在數分鐘之內，馬金利先生有話出來，他要會見我。

一個人怎樣會見各式各樣，挾有各種使命的許多人，作那樣多的艱苦工作，而對每一個來賓始終能維持其安靜、忍耐和活潑，能夠像馬金利總統那樣的，我真有些不懂。我見到這位總統時，他爲了我們現在在塔斯歧基爲國家的利益所作的工作，向我殷勤致謝。然後我簡略地將我此來的目的告訴他。我使他明白，國家行政首領的光臨，不但可以鼓勵我們的學生和教職員，也可以幫助我們的全種族。他似乎是很注意的，但是他並沒有就答應往塔斯歧基去，因爲他往阿特蘭塔之行，那時還沒有完全決定；不過他要我在數星期之後，向他再提起這事。

到了下月中旬，總統已確定往阿特蘭塔去參加和平紀念會了。我就再到華盛頓去見他，希望他會延長他的旅行到塔斯歧基。在這第二次的晉謁上，塔斯歧基著名白人黑爾 (Charles W. Hare) 先生，自願陪我同去，代表塔斯歧基及其相近處的白人，作同樣的邀請。

正在我第二次往華盛頓去之前，全國都受了激動，黑人大爲沮喪，因爲在南方，發生了好幾處關於種族的擾亂。我一會見總統，就覺得他的心上，爲了這些種族的不安，大大地壓着重擔。雖然有許多人在等着見他，他留了我一會，討論着我們種族的狀況和前途。他好幾次說，他決意不但要用言詞，並且要用行動，來表示他對於我們的注意與忠信。我對他說，據我想來，這時要給我們黑種人希望與鼓勵，除了國家的總統願意多走一百四十哩路，在黑人的機關裏耽擱一天，其他似乎難得有更好的辦法，我說這話時，他似乎受

到很深的印象。

我正和總統在一處時，一個阿特蘭塔的白人，也是一個民主黨員和從前的奴隸所有者，走進了這房間，總統就問他的意見，要不要往塔斯岐基去。這位阿特蘭塔人，毫不遲疑地回答說，這是他應該作的事。這一位來促成好事的黑種人的朋友，就是卡利博士。總統於是答應在十二月十六日，來參觀我們的學校。

總統就要來參觀本校的消息一傳出來，塔斯岐基城——離校一哩——的白種市民，都和我們的學生與教職員一樣，歡喜非凡。全城白人，男女在內，都開始設法裝飾本城，並組成各種委員會，與我校的教職員合作，以便那位特出的來賓，可以獲得合式的接待。我想在這次以前，我從來沒有覺得塔斯岐基及其鄰近處的白人，會這樣的照顧我們的。在我們準備招待總統的幾天內，這樣的人都一批一批來對我說，他們並不要出風頭，假使有一些什麼事情，為他們所能親自來做，以幫我的忙，並解除我的困難的，只要我通知他們，他們一定樂於攘臂而起。實在的，感動我的深刻，差不多如總統來參觀這件事一樣深刻的，就是阿拉巴馬州各階級的人，似乎對於我們的工作，都當作深切的尊榮。

十二月十六日的上午，小小的塔斯岐基城，來了從來沒有見過的人羣。和總統同來的有馬金利夫人，全體閣員只有一個人沒有來；並且他們都帶着他們的妻子或其他的家屬。若干著名的將軍也都來到，其中有沙夫忒 (Shafter) 將軍和惠勒 (Joseph Wheeler) 將軍，他們剛從西美戰爭回來。此外還有一大

隊新開通信員。這時，阿拉巴馬州議會正在蒙特哥美利開會。該會也議決休會，以便參觀塔斯歧基。正在總統一行人來到之前，州議會諸人來到，領袖是州長和其他的州中官員。

塔斯歧基的市民，已經將車站至本校，裝飾得典麗燦煌。爲了要節省時間起見，我們打算將全校在總統之前經過，以供檢閱。每一個學生拿一根甘蔗，上端繫着若干已開的棉花果。學生之後，則本校各部分的工作，也裝在用馬、騾和牛拖挽的「臺閣」上，以待逐件檢閱。在這些「臺閣」上，我們不但要陳列學校的現在工作，並且要表示新舊做事情方法的不同。例如我們將舊式取牛奶的方法，耕地的方法，烹飪與收拾房子的方法，都和新的方法作着比較。這些「臺閣」費到一小時半的時光，方才行完。

總統在我們學生造好不久的大禮拜堂中演講時，除了別的話以外，有下列的話說：

在這樣愉快的安排之下會見你們，對於你們的工作，又能夠有親自賞識的機會，的確是最可滿足的事情。塔斯歧基師範實業學校的本身便是理想，在國內已經有着大而日在增長的名譽，外國也不是不曉得的。所有從事這善良工作的人，我都恭賀他們，這善良工作是要教育牠的學生，過着有光榮有實用的生活，以提高牠所從以設立的種族的。

我想，爲這種高尚的教育實驗，所揀選的地點，再沒有比這裏更爲優良的了，這樣實驗則已引起全國各地慈善家，甚至守舊的慈善家的注意，並且贏得了他們的擁護。

談到塔斯歧基而要不向濮各爾·華盛頓的天才和堅毅特別道謝，乃是不可能的。這件高尚事業的發端，是屬於他的，爲了這，他應該承受崇高的榮譽。使這事業能夠著著進步，在這機關中能夠獲得目前的高等成就的，都是他的熱誠與進取心。他已經博得有價值的名譽，成爲他自己種族中偉大領袖之一，在國內外都處處聞名，大受尊敬，當他爲成功的教育家，大演說家，和真正的慈善家。

海軍部長隆格 (John D. Long) 所說的一部分如下——

我今天不能演說。我的心裏太充滿了——充滿着爲我那兩部分和兩種族的同胞所發出來的希望、崇敬與尊榮。我充滿着對於你們工作的感謝與崇敬，從此以後，我將絕對信任你們的進步，和你們對於自己問題的解決。

我說，這問題已經被解決了。今天已經出現一個畫像了，這畫像應該和華盛頓與林肯的畫像，一同畫在畫布上，以傳至將來的世世代代——這畫像全國新聞界應該廣爲傳播，一個最有傳奇意味的畫像，而這個畫像便是這個美國的大總統站在這個講臺上，一邊是阿拉巴馬州的州長，一邊完成了三位一體，是一個種族的代表，這個種族只在數年之前，還受着束縛，而這位代表呢，便是塔斯歧基師範實業學校的黑人校長。

願上帝祝福這位大總統，在他的聲威之下，才有這樣一個景象呈現於美國國民之前。願上帝祝福

阿拉巴馬州，牠在那裏表示着，牠能夠爲牠自己解決這個問題。願上帝祝福這位講家，慈善家，偉大主宰——這位主宰如果在世上，也一定會做同樣的事工——的門徒，濮各爾·華盛頓。

郵政總局長斯密斯將軍用下列的話，來結束他的演講：

我們目睹着最近數天內的許多景象。我們已看見南方大城之一的輝煌宏麗，以及偉大成就。我們已看見戰爭的英雄，列隊而過。我們已看見花一般的遊行。但是我確信我的同僚會和我同意的說，我們所目睹的一切景象，總沒有比今天上午在這裏所目睹的，更有感動力，更有鼓勵力，更足以引起人的興趣的。

總統回到華盛頓之後幾天，我接到了下面的一封信：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華盛頓行政官邸。

親愛的先生：另郵奉上大總統參觀貴處的紀念品若干分。這些紙上有大總統和陪他來的諸閣員的親筆。在你的率領之下，在我們參觀塔斯歧基之行中，布置週到，招待妥貼，我乘這個機會來誠心誠意的賀賀你。每一個節目，都完美地執行了，都被每一個到場的來賓，用着最誠心的滿足，看見了，參加了。你的學生，在他們的職業上所作的無上展覽，不但是藝術的，並且完全是動人觀感的。大總統及其閣員對你的工作所表示的敬意，並不過高，而且我想正可以爲貴校的將來繁榮，成爲最足以鼓勵的前兆。

我末了還要確實告訴你，你自己在各事中所表示的謙遜，我們同行諸人，都一致讚美着。

願你那最有用最愛國的事業繼續前進，並此問候安好。

你的最誠實的人，

波爾忒。

我第一次在塔斯歧基作着卑微的努力時，住的是破敗的小屋，和古舊的雜舍，沒有值到一塊錢的財產，只有一個教員和三十個學生。一直到現在，已經二十年過去了。現在校中共有地二千三百英畝，其中一千畝每年都在耕種着，完全出於學生的勞力。現在全校有大小房屋六十六座；其中除了四座以外，都差不多完全由我們學生的勞力建築起來的。學生在田地上工作時，或建築房子時，有優良的教師教導他們最新式的農業方法，和與建築有關的各種行業。

本校共有三十種實業，在和完美的學問研究與宗教訓練，一同不息地進行着。這些實業所教的，都可以使我們的男女學生，一離開學校，就可以獲得職業。現在惟一的困難，乃是南方黑人和白人，向我們要求畢業生，非常迫切，以致我們不能供給那些請求者到一半以上的人數。我們也沒有錢和房子，作經常的費用，來容納那些向我們請求入學的男女學生，到一半以上的人數。

在我們的實業教導上，我們記着三件事：第一，一定要教導我們的學生，使他能夠應付南方他所住的

應有的技巧、智力和道德的人格，使他能夠爲他自己和其他的人，求得生活第三。這是一項使他們都覺得並且知道，勞動是神聖的、美麗的——使每一個人都愛勞動而不會想逃避。這使他們給與年輕男子農業訓練，和年輕女子平常家務訓練之外，我們現在每年還在農業上訓練許多女子。我們所教她們的是園藝、產果、取奶、養蜂，和畜家禽。

一方面本校在宗教上是不分宗派的，一方面我們有着一個部分，稱爲「腓爾普斯堂聖經訓練學校」。裏面有許多學生，準備當牧師和其他基督教工作，尤其是在鄉區的工作。同樣重要的，是這些學生中，有一個，每天一定要用半天工作，作一些實業，以便獲得技巧並且喜愛工作，等到他離校之後，他有一個準備，可以在實業方面，親自勞動，爲其他的人作一個正當的榜樣。

我們財產的價值現在在七十萬元以上。假使我們再在這個數目之上加上我們現在所有的基本金一百萬元，那末全部財產的價值是一百七十萬元。除了需要更多的房屋和供經常費用的金錢以外，基本金應該至少增加到三百萬元。每年常年經費，現在大約是十五萬元。這數目中，大半都是我每年一家一家，一戶一戶去捐集攏來的。我們全部的財產，都沒有出抵過，由一個不分宗派，管理本校的董事會，所有着。

學生數目，由三十人達到了一千四百人，來處是美國的二十七州和其屬地，以及非洲、古巴、波托利科。

(Porto Rico) 牙買加 (Jamaica) 和其他外國地方。在我們各部中，有教職員二百十人；假使我們將教職員的家屬加在裏面，那末全校的人口，平常總近乎一千七百人。

時常有人問我，我們怎樣來使這樣大的一個人羣住在一處，而同時又使他們不發生禍害。這有兩個回答：到我們地方來的男男女女，都迫切地需要教育；每一個人都忙得很。下列我們日常的工作大綱，可以證明這一點——

上午五時，起身鐘；五時五十分，預備早餐鐘；六時，早餐鐘；六時二十分，早餐畢；六時二十分至六時五十分，整潔各室；六時五十分，工作鐘；七時三十分，上午誦習時間；八時二十分，上午上課鐘；八時二十五分，排隊檢查男學生的衣裝；八時四十分，禮拜堂禮拜；八時五十五分，每天閱報五分鐘；九時，教室功課開始；十二時，教室功課完畢；下午十二時十五分，午餐；一時，工作鐘；一時三十分，教室功課開始；三時三十分，教室功課完畢；五時三十分，「停止」工作鐘；六時，晚餐；七時十分，晚禱；七時三十分，晚間誦習時間；八時四十五分，晚間誦習時間終止；九時二十分，預備就寢鐘；九時三十分，就寢鐘。

我們時常記在心中，學校的價值，以牠的畢業生為判斷。將那些讀畢全部功課的人，以及那些已獲得足夠的訓練，巴能夠從事合理的好工作的人，一併計算在內，我們可以放心的說，現在從塔斯基基出身，而在南方各地工作的男男女女，至少有六千人；這些人藉着他們自己的榜樣，或藉着直接的努力，都在給我

們的同胞看，怎樣可以改良他們的物質的、教育的、和道德的。這種程度的常識和自制，在引起種族間較好的關係，並引起南方白人會相信教育。此外，還有一種影響，就是藉着華盛頓夫人所主持的母親會和田莊工作，時常所努力出來的。凡是我們畢業生所到的地方，立即在購買土地、改進家庭、儲蓄錢財、教育、高尚人格，這些事上所發生的變化，都很顯著。全社會都爲了這些男男女女的活動，起着很快的革命的。

十年之前，我在塔斯歧基組織了第一次的「黑人大會」。這是每年的敍會現在到本校來敍會的黑人代表，約有八九百人，他們來住上一天，看看我們同胞在實業上、心理上，以及道德上實際的情形，以便制或改良的方法。由塔斯歧基的中央黑人大會，產生了許多各州各城的大會，現在牠們都在做着同樣的工作。在最近一次常年大會中，有一位代表報告，在他的社會中，已有十個家庭，購買了住宅，可見這些敍會所發生的影響，有這樣的結果。在那次常年黑人大會後的一天，又開了「工作人員」大會。這是由南方各大機關中從事教育工作的教職員所組織的。黑人大會使這些工作人員，獲得希有的機會，可以研究我們同胞的實際情形。

一九〇〇年夏，我又藉着許多優秀的黑人，例如時常在各種事上扶持我的福爾丟恩 (T. Thomas Fortune) 先生，他們的幫助，組織了「全國黑人商業同盟」，第一次在波士頓開會，到會的黑人人數很

多，他們都是在美國各地從事各種職業和商業的。在我們這第一次聚會中，出席的代表有三十州。由這個全國敎會，又產生了各州各城的商業同盟。

除了要照顧塔斯歧基工作的執行方面，並且要募集大部分的款項，以便維持本校以外，我還免不了要回答至少一部分的請求，牠們要我去向南方白人與我們同胞的聽衆，以及北方時有的敎會作演講。至於我的時間，在這事上要拿去多少，可以看看下面從紐約州巴法羅城一家報上所剪下的一段話。這時我正在那城裏舉行的一「全國教育會」中演講。

漢各爾·華盛頓，世界黑人中傑出的教育家，是一個最忙的人，自從他前夜由西方出發，到了本城，住到伊羅夸（Iroquois）旅館之後，便一直忙着吃晚餐的時候，他在路上所受的風塵，還沒有弄清爽。然後在伊羅夸旅館的會客室裏開着一個公衆的集會，一直到八點鐘。在這時間內，他受着美國各地來的二百個以上的著名教授和教育家的歡迎。八點鐘之後，他連忙又坐着車子往音樂廳去，在一小時半以內，他向五千人作了兩場發聳振聳的演講，講到黑人教育。然後華盛頓先生又被一羣由窩特金（Watkins）牧師爲首的黑人代表所包圍着，一擁而去出席一個小而正式的歡迎會，這是由這位來賓的同胞所安排了來歡迎他的。

除了作這些演講以外，我也不能避免我的責任，不去藉着新聞紙的媒介，喚起南方以及全國的注意，

注意那有關兩個種族的利益的種種事情。例如對於私刑黑人的惡習，我就會做過這事。『盧伊西安那州憲法會議』開會時，我就向那個團體寫過一封公開的信，爲我們本種族籲求公道。在這些努力上，我由南方的新聞界，以及全國其他各地的新聞界，受到了熱烈而誠懇的擁護。

雖然表面上或暫時的徵示，也許要使人想到相反的意見上去，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時期，使我比現在更覺得我的種族有希望的。人類的大定律，就是說善有善報的，永不會磨滅，而到處通行着。南方的白人和他們從前的奴隸，兩方面的心中都在不息地發生着一種奮鬥，要想將他們自己，不爲種族偏見所束縛，這種奮鬥是外面世界所不知道，也是不能加以重視的；而兩個種族如此奮鬥時，牠們就應該有着同情扶持，以及對於其餘世人的容忍。

我寫這本自傳的結束的話時，我自己是——並非預定——在弗基尼阿州的利赤蒙德 (Richmond) 城。這城不過在數十年之前，還是『南方同盟國』的首都，並且大約在二十五年以前，我因爲貧苦，曾在牠的一個人行道下，睡過數夜。

這時我在利赤蒙德，是作該城黑人的客人；應他們的邀請而來，昨夜在音樂院裏，對兩個種族作了一會演講，這音樂院確是該城最大而最美的演奏廳。這是黑人可以用這廳的第一次。在我到的前一天，市議

會通過了一個議案，就是全體出席，聽我演講。州議會，連參眾議院在內，也通過一個一致的議案，全體出席。在幾百個黑人，許多著名白種市民，市議會，州議會，州中諸官吏之前，我發出我的言論，那是有希望與快樂的言論；爲了他們這樣的歡迎我回到生我的本州來，我從我心的底處，感謝着這兩個種族。